



●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主 编：陈晋 副主编：元莉

毛泽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情毛泽东 /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05-05835-X

. 温... . 中... . 毛泽东 (1893 ~ 1976) -
生平事迹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8890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辽宁印刷集团美术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 × 230mm

印 张: 18

字 数: 240千字

印 数: 1- 10 000

印刷时间: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时间: 2005年1月第1版

责任编辑: 张 放 姜 瓠

特邀编辑: 孟繁科

封面设计: 陶 洁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刘再升

定 价: 28.00元

销售热线: 024-23284300 23284296

目 录

访问 李敏	001
-------------	-----

后来岸英哥哥指着伊万诺沃儿童院礼堂里的许多画像中的一张，对我说：这是我们的爸爸……

访问 李讷	008
-------------	-----

父亲大手的温暖，怎么说呢，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么幸福……

访问 刘松林	027
--------------	-----

毛泽东在刘松林有了心理准备后，找机会把毛岸英牺牲的实情告诉了刘松林。听到这个噩耗，刘松林悲痛欲绝，毛泽东泪光闪闪……

访问 邵华	036
-------------	-----

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姻，这不仅因为邵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更因为有了这个婚姻，两家再次亲上加亲……

访问 张耀祠	049
--------------	-----

第一班站岗，班长分配我站在毛主席门口。毛主席的门口

对我太有意义了……

访问 刘长明 065

转战陕北，既艰苦也危险，但只要毛泽东和战士们在一起，就会鼓舞群众和战士的人心、士气。我们也会苦中作乐，在一起合个影……

访问 王鹤滨 075

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

访问 高智 090

对于 1945 年在一次工作之余，高智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记忆依然清晰。

访问 韩桂馨 106

1962 年 4 月，我们要调走了，主席叫我们在办公室坐一坐，让孩子也一起过来。分别时，留下了一张我们一家与主席的珍贵的合影。

访问 侯波 徐肖冰 119

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 月 26 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

访问 马武义 135

刻，除了我，又有谁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旧毛衣裤登上了张灯结彩的城楼？

访问 张木奇	143
--------------	-----

我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既幸运又幸福，尽管那时候工作很紧张，纪律也很严，也不能说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感觉这是值得的……。为主席服务，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访问 张仙朋	157
--------------	-----

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的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孩子……

访问 沈同	174
-------------	-----

毛泽东晚婚晚育的观点，在沈同身上起到了作用。到了后来，沈同偷偷交了女朋友，但没有告诉毛泽东，也没有结婚……，在知道这件事的第二天，毛泽东就主动提出来要做他们的主婚人……

访问 陈长江	189
--------------	-----

如果有那么十几二十天看不到我，再次见到我时，他就会问我，长江你到哪儿去了？主席见了我就叫“长江”两个字，让我感觉特别亲切……

访问 曾文	200
-------------	-----

有一天，主席来看李敏和李讷，正好从我们哨位前面过。

影上看过,现在真的看见主席了,心里面是说不出的滋味……

访问 田云玉 210

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我们合得来。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么平等地对待你,你能不感动吗,你能不怀念他吗?

访问 周福明 226

我接触主席以后,主席觉得我这个人还合得来。主席再次到杭州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小周啊,你愿不愿意到我身边去工作?我十分高兴,当场就一口答应下来……

访问 吴连登 236

我是毛主席家里的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我管的范围……。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毛主席称我为他身边的一盏不灭的灯……

访问 熊向晖 253

熊向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1936年加入的是共产党,却一直在国民党阵营从事秘密工作……

访问 章含之 265

我刚刚到外交部,能进中美会谈的班子,在外交部这样论资排辈比较严重的单位,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我能进班子是难以想象的……

后 记 280

访问 李敏



1949年7月，毛泽东与李敏在北平香山

后来岸英哥哥指着伊万诺沃儿童院礼堂里的许多画像中的一张，对我说：这是我们的爸爸……

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1936年冬天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看她又瘦又小，说了一句真是个小娇娇，毛泽东就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娇娇。不久，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阶段。1937年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治病，不想这一去便造成了她与毛泽东的终生分离。1940年，李敏被送往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她得以和母亲贺子珍，还有两个哥哥：毛岸英、毛岸青团聚。在苏联时，年幼的李敏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便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

国际儿童院里边有一个礼堂，挂着好多个国家的伟人像，其中有朱德的，还有我爸爸的像，我哥哥指着我爸爸的像说这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我认为他在那里骗我，就说是伟人是自己的父亲，我



李敏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

那时候都不相信。

1947年，贺子珍带着李敏回到中国，住在东北的哈尔滨，一年多以后，李敏对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儿还是将信将疑，在母亲的鼓动下，李敏给父亲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问毛泽东，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毛泽东很快用电报发来一封信，电报说：“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爹爹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

那时候我想想，想起来也挺高兴的，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我爸爸。我哥哥说的是对的，那时候爸爸给我来电报，承认是我爸爸。

1949年初夏，李敏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毛泽东还要给他的女儿娇娇取一个正式的名字。

爸爸就说娇娇名字是小名，不好这么叫了，要有个学名，就取名叫李敏，爸爸拿字典给我看，字典里边有那个注解。

毛泽东借用《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给他的女儿们取名为李敏、李讷。希望她们成为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人。毛泽东要求他的子女决不能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有任何的特殊化，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从苏联回国的李敏，从前主食习惯是吃面包，和毛泽东一起生活后，刚开始吃米饭有些不习惯，炊事员有时候会给她做些面包，因为这个还受



毛泽东和两个女儿在一起

到了父亲的批评。

炊事员那时候也做面包，他想改善我们的伙食，不是平常吃，就是早饭的时候吃面包。后来爸爸发现以后，不是批评我一个人，批评江青，批评江青的姐姐，批评我和李讷。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爸爸就说生活费都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超过那个标准，再加上吃中国饭也是挺好的，不要吃外国饭了。

李敏在中学时，许多同学都开始申请入党，她也跃跃欲试。当她把想入党的想法告诉父亲时，毛泽东却给了她一个意外的答复。

我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想征求爸爸的意见，看看能不能申请入党，后来我跟爸爸提的时候，爸爸反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说人家都是说鼓励的话，你倒问我。后来爸爸说，我是党的主席，所以就要这么问，这也就是关心嘛。我就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后来就答不出来了。以后爸爸让我去听他的报告，在七千人的党代表大会

上,让我去听他的报告。那时候我说我不是党员,爸爸说我叫你去,后来我就去了。

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方面,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对子女的婚事,却主张恋爱自由,李敏上大学后,遇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孔令华,不久两个人便产生了感情。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是解放军炮兵的副司令员。而当时对有关孔令华家里的情况,李敏却不太了解。毛泽东知道后向李敏详细询问了这些情况。

爸爸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父亲是谁,做什么的。我答不上来,爸爸就批评我。他说你谈恋爱,都不知道人家的父亲是谁,你怎么谈恋爱。我就说,我又不是跟他父亲谈恋爱,我们都是八一小学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我想他爸爸也是个干部,所以我就没打听他爸爸做什么。爸爸就说,你得问清楚以后再谈。后来我就问了孔令华,问他父亲的情况,孔令华把他父亲介绍了。我就跟爸爸讲了,爸爸说,那我认识,挺好的。

1959年8月,
在毛泽东的亲自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时的合影

主持下，孔令华和李敏举行了婚礼。那一天，毛泽东非常高兴，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在婚宴上与来宾频频举杯，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李敏和孔令华结婚后，就住在中南海毛泽东的身边。贺子珍一直住在上海，毛泽东经常让李敏代自己去看望贺子珍，对于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的贺子珍，毛泽东始终难以释怀。

有时候提到离婚的事，爸爸也承认自己有百分之五十的错。妈妈不讲，妈妈从不提这些离婚的事啊什么的，感情的事她很少提。爸爸送过她一个手绢，绸子手绢，妈妈就给爸爸捎了一些南方菜，蔬菜，说我爸爸喜欢吃菜。妈妈老是每一年弄一个蒲包，就是芦苇编的那种包，这么大一包的蔬菜，爸爸看了以后，就点点头，问我妈妈身体怎么样，问我舅舅，问妈妈家里的亲戚。

1963年，李敏和孔令华搬出了中南海，过上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离开中南海之后，李敏见父亲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头两年的时候还能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就不让我进去了。有一次我到门口也不让进去，我通过汪东兴进去了。看见爸爸，爸爸说你怎么不常来看我，我说门槛高了，不好进了。他就叹气。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李敏去中南海看望过父亲两次。最后的一次，毛泽东身体已经极其衰弱，一般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语言了。

爸爸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39岁了，他说不对，你38岁。后来他就做了一个手势（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做了个圆圈），我不

懂就问张玉凤，我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张玉凤没有给我解释，我就没回答，我没听懂。

对于这个手势的意思，后来人们有种种猜测，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圆圈表示桂圆，而贺子珍当年的小名就叫桂圆，那就是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还在惦念着贺子珍。至于这个手势的真正含义，也许永远是个谜了。

爸爸刚去世那些年，我每个月去一次，以后就半年一次。再后来我就一年去一次，去两次，以后我把脚崴了，发高烧，我就没去了。一直到这几年，又去了，每年去两次。现在好一点了，不像刚开始，刚开始做梦都梦见。

访问 李讷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与小女儿李讷合影

父亲大手的温暖，怎么说呢，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么幸福……

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人们常说父母最疼是小儿，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也充满常人的情怀，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老姑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李讷是唯一一位在父母身边度过完整童年的孩子。延安的保育院、儿童院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可为了李讷能陪在父母身边，毛泽东没有把她送进去。1947年10月，李讷7岁，到了上学的年龄。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到了西柏坡，由于战争的影响，小学很不正规，高小毕业的韩桂馨，作为家庭保育员来到了毛泽东身边，主要负责李讷的读书识字。

韩桂馨来的那天，李讷向父亲保证：“好好学习，不淘气……”毛泽东笑着说：“好好学习是对的，这个不淘气还可以商量。乱淘气不行，有点小淘气还是可以的。孩子淘气是聪明健康的一种表现……”

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我不到入学年龄。再说呢，我父亲身边也需要有一个孩子。我的哥哥姐姐都在苏联，他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孩子在身边，活跃家庭的气氛。所以我没有进过保育院，托儿所都没有进过。1947年初，我才6岁多嘛，也没有到入学年龄，就跟着一起撤出延安行军。开始还跟着嘛，还跟着我父亲，过封锁线我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战士背着我，都很紧急的，把那个马鞍子，就是马的前后弄一个铁架子，把我拿绳子捆在那个铁架子上。小孩不会骑马，就这样撤出的延安。开始还跟着，后来因为转战陕北，战争环境很艰苦呀，我们不能再跟着去，就都撤到陕西河东，原来的120师的

兴县吧，就是邓妈妈，叶帅，中央直属大队，由他们负责，我们都搬到那去了，走了一段，实在不行，所有的家属都撤回去了。

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重，常常废寝忘食。如何能让他多休息，是让身边工作人员犯愁的一道难题。活泼的小李讷，常常会成为工作人员动员毛泽东休息的一个法宝。毛泽东一见李讷，往往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逗李讷玩一会儿或者出门散步。两人常常像玩游戏似的，父亲叫女儿大娃娃，女儿叫父亲小爸爸。

说实在的，这个发言权应该可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那时候小，记不得很多了，只记得父亲很忙，让他休息，他也放不下手中的工作。很小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休息，他太累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把我推进去，我倒成了工作人员动员爸爸休息的一个法宝。爸爸一见我，往往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逗我玩一会儿或者出门一起散步。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有一句话就是“爸爸散步去”。我父亲进城的时候还说呢，你小的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小秘密，父亲常常叫我大娃娃，我则叫父亲小爸爸。我很小啊，就是一两岁，两三岁，就只能拽着他的一个手指头，拉着他散步，就有这个印象，别的那些工作什么的，不太记得了。

十月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蜿蜒的山岭上，重重叠叠地披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实，漫山遍野的金黄色；村旁和路边的果树，喷散着一股股清香；一片接一片的梯田，从低垂的河谷铺向高峻的山顶；微风过处，茂密的谷子掀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

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一座用土墙围成的小院里，有几棵柿子树，几个幸存的大柿子高高地挂在枝头上，在阳光

的照射下越发显得诱人。李讷和她的小伙伴们正眼巴巴地望着树上那几个幸存的柿子。

她们四处寻找着“武器”。

李讷拾起一块碎瓦片，瞄准那个最大的，猛地投了上去。燕燕和二娃（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女儿）也跟着，用碎瓦片和土坷垃向柿子树投去。一时间柿子树哗哗作响，有的瓦片落在平顶房上，三个孩子开心地笑着，投得更起劲了。

“哎哎！快回来！”韩桂馨用温和的声音制止着三个顽皮的孩子。她轻手轻脚地将三个孩子领出院子，小声责备道：“你们哪，真是无法无天，毛主席正在睡觉呢！”

像这类淘气的事可能会有，七八岁的年纪玩起来有时候很疯。在别人看来好玩，可能有印象，在自己根本记不住。但她一说爸爸正在睡觉呢，我们这么做影响爸爸休息，我就能马上改正。

毛泽东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不仅是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其他领导同志都关心他



李讷就是这样拉着父亲的手，一天天地长大

的健康。大人们对毛泽东的关心，使小李讷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人也劝，让我过去，让他休息。以后小孩慢慢也懂了，就让爸爸休息，就是到一定的时间，让父亲转移转移吧。我要一去了，他喜欢孩子嘛，他就不由自主地跟孩子玩儿什么的。这样他就可以转移转移，这样我就可以说“爸爸散步去”。我就拉着他的手，很小的时候，我这样拉着他的一个手指头。以后我逐渐长大了，然后拉着他的两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的三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的整个手，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

父亲大手的温暖，怎么说呢，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么幸福。散步的时候，父亲的微笑很慈祥，而且非常慈祥。我很想念他，他是我的好爸爸。

虽然那时的战争环境很严酷，但从延安、西柏坡到香山，父女手拉手散步的情景，还是无比温馨。

回想起来，和父亲一起散步真是享受。他有时候散步的时候就教我念诗，我稍微大一些嘛。他都教我读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天上下小雨了，鱼儿都出来了，就说这是细雨鱼儿出。这不是杜甫的诗嘛。然后风刮过来了，燕子在飞，然后就是微风燕子斜。就慢慢地教小孩，潜移默化的吧，在一边玩的过程中教我读些。我在十岁以前没上过学，都是在家里父母和工作人员教的。

工作累了，毛泽东也会主动出来活动活动。看到李讷和她的小伙伴们在玩，毛泽东会袒露出他尚未泯灭的童心。

父亲对小孩的事情很感兴趣。我们在这里自己盖个小房子什么

的，他进来帮着我一起盖，这少一个窗户，他又帮我们搞一个窗户，说这家人还没有水呢，他就把那积了一潭水，用沟把水引进来，也是玩得两手都是泥。他很投入的，因为有小孩嘛！

毛泽东所说的休息多半是指漫步 是否还有别的活动方式呢？

具体我说不出来，就是他有时候扭腰啊，背着手走啊。反正我们小孩淘气嘛，就在他后面跟一串，不是我一个人，叶艳呀，叶丽亚，一嘟噜地在他后面跟着学样。他对孩子非常慈祥，不在乎这些。

毛泽东还有一种休息脑子的方式，或者说娱乐方式，那就是听京剧。李讷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听京剧。

因为我父亲喜欢听京剧，有一个留声机，有唱片，家里头就经常放这个唱片。在京剧院，那个时候常演戏嘛，就是延安平剧团。我可能刚能抱出去的时候，就抱着去看戏。我也不懂，反正就在京剧的锣鼓声音里，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一两岁吧，爸爸抱我去看戏。小孩本来晚上应该睡觉，她不睡，她就非要问，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如果要是好人，她就放心了，她就睡觉了。如果要是坏人，她不睡，她要等着看，把这个坏人制服了，这才放心。所以父亲说，你看连这么小的孩子她都要分清好坏。这都是以后进城，我们大了以后父亲说起的。

在京剧的锣鼓声中长大的李讷也开始学唱京剧。

说让小孩你唱一段，那可能有的。我常哼哼京剧，因为母亲她是专门搞这个的，所以这方面的气氛还是比较浓的。

毛泽东也能唱，但主要以哼唱板眼为主。他喜欢哪些唱段呢？

那我就记不太清了，恐怕是空城计吧，他比较喜欢谭派。

在延安的时候，因为受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很艰苦，大家常常吃不上米和面。很长一段时间，干部战士的主食只有黑豆。李讷也不例外，总是和大人一样在大食堂吃黑豆。

我也没觉得很艰苦，就觉得特别高兴，能跟大人一块打饭，吃黑豆什么的。因为当时的情绪是很高涨的，一点也没有说黑豆不好吃啊，胃受委屈，一点没有那个感觉。自己拿着小碗，排着队去打饭，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说不出有什么不好的，有的小孩可能是不理解，说牙齿会变黑。我好像跟父亲说过这个，他说了绝对不会的，吃黑豆对身体好。父亲这么说，我就高兴，还把这话告诉了小朋友。

因为在延安的时候也没有吃过什么特别不好的，也就是小米饭、山药蛋，我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个时候大家的情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愉快。能够为前方多分担一些困难，自己多吃一些苦，我觉得我很高兴，因为大人高兴小孩也一样啊，没有觉得特别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李讷在北京正式开始上学。可为什么一段时间，她在家长一栏中，没有填写毛泽东的名字呢？

最开始填，家长是填的工作人员的名字。但这个事情也不能长，逐渐地就改了。我是谁的孩子，育英小学可能是知道的，因为育英本来就是中直的小学，所以不可能不知道，最早的校长是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是我填的籍贯，还是填的延安。我本来应该是湖南嘛，应该是湘潭嘛。但是我填的



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

是延安，我自己认为我是延安出生的。但是大了，到了高中了，就比较正规了，该怎么填就怎么填。

李讷刚上小学时，因为学校离中南海比较远，工作人员就用小轿车接送她。毛泽东知道后，同不同意这样做呢？

我们上小学住校，就是育英小学，一个礼拜能回一次家。跟大家一样，开始用小车接，后来爸爸不同意，说不能搞这样的特殊化，后来就派大一点的面包车，能装十几二十来个小孩的，就一次接送中南海的小孩。中南海的小孩都坐这一辆车回来，不用小车接送了。

1960年前后，李讷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出现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加上要还苏联的债务，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毛泽东忧心如焚，他带头减少了自己的粮食定量。而

且很长时间不吃肉，不吃鸡蛋。只有李讷放假回家的时候，毛泽东才让厨房弄点好吃的，给她打打牙祭。

我们小学中学一直是在家里吃的，到大学以后，父亲就让我到食堂大灶去吃饭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家里的饭了，都在食堂吃。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自己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就是吃青菜，有好长时间腿肿得按下去都是很深的坑。因为我们住校，不是很清楚，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所以我回到家里偶尔吃一顿饭就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以为他们吃得挺好的，不了解。有的工作人员还伤心地抹泪。所以，后来我非常难过，我当时太不懂事，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应该体贴老人嘛，结果我自己狼吞虎咽的。我不了解情况，他也一直不说，一直只吃青菜，自己的定量很低。我想他内心也是很难过的，只是他不说不说，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只是做，不说。子女也是慢慢才知道，慢慢才明白。

毛泽东虽然当时不说，但事后他还是从侧面了解学生的粮食供应情况。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子女，毛泽东希望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情况。

他问哪，这是他最好的调查方法，我就如实向他汇报了，因为大家都要替国家分担嘛，我说定量二十一斤，他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我说组织上决定，因为我们是学生，我们还在长身体，决定还是二十七斤，每天不到一斤。他听了以后，点点头，嗯，这个定量差不多，在井冈山的时候还吃不到这个定量呢，也一样打仗。二十七斤的定量比较合适。后来我们就是按二十七斤来的。实际上，我吃得比这要多，因为我是运动员，我是学校游泳队的运动员，运动员的定量要保证呀，每天都要练习，5月份就要下水，9月1日上水，你想想，每天几千米地游，没有定量能行吗？我们就一般

都是三十斤，三十一斤，三十二斤，我觉得还挺好的。

李讷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毛泽东一起游泳。可毛泽东怎么会要求她不用救生圈呢？

因为他自己就不用救生圈。落潮的时候，在北戴河一游就游出去好远，他游得比较慢，但是他不用救生圈。你可以仰游啊，比如说你累了，你就可以仰游休息。他这样做，一个是他对自己孩子的水性还是了解的，再一个他也是有意识锻炼我们。坚持还是能坚持下来的。他自己就是那么做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比如说来了台风了，白浪滔天，他让我们都跳下去，首先他自己第一个跳下去，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当然了，坚决跳下去。那浪根本下不去，浪打到人身上，总是把人打到岸上，进不去，费好半天才能钻进去，他自己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觉得这种言传身教，主要是身教很重要。

毛主席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游泳，并把游泳当作锻炼意志的好方法。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像他那样勇敢地与大自然相搏斗，跟得上他的身影。

我们理解他的心情，跟得上也得跟，跟不上也得跟。你只要努力，一定跟得上。他不让用救生圈，他也是有道理。他不是蛮干，他一定是对你的水性有了解，而且他对北戴河的水情也了解，这样的话，他自己带头，而且还有战士，这没有问题的。那个浪你不过去，你不知道，你看着它，白浪滔天，很厉害，但是你不进去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穿过这两个浪之间，正好是一个谷底，你就正好可以出来呼吸。第二个浪来了，你就又可以钻进去，然后又是一个谷底，又可以出来呼吸。它是可以掌握的，是有规律的。如果你不过去的话，你看着白浪滔天，可怕得不得了，进去以后，你摸到它的规律，你还是可以生

存，可以存在的，有一定的自由。

李讷从小就有和父亲进行思想交流的习惯。上大学后，李讷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呢？

父亲对子女还是很关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学业上都能健康成长。我1959年入大学，1960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我病了，病得挺厉害的，也是不得不休学。就是缺少营养，浮肿，闭经，很长时间，完全不能睡觉，就休学一年，又复学，复学以后身体还是不是太好，有一段因为有病，精神不是很好。三年自然灾害也很快过去了，国家的经济又开始恢复，虽然说是困难，但是大家的精神头还是挺足的，很愉快的。我自己在大学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以前在实验中学，是个女校，而且干部子弟很集中，就是我的同学，可以说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面，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工人、农民子弟特别多，干部子弟很少，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父亲再严格要求，再要求你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但毕竟身上还是有这些东西。你一碰到这么多的群众，说实在的，对自己的触动是很大的，从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化，就是我要改变，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老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高明，很看不起人，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思想经过很剧烈的变化，特别是学雷锋，对我触动很大，我就觉得一定要改变自己，一定要变成一个普通的，跟大家一样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健康的一个人，和大家打成一片，真正在政治上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成绩能够好，在各方面能够全面发展的。我觉得思想上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我在这期间有一段信跟他写得少一点，自己在那想事呢，觉得自己不行；比别的同学差，觉得自己的那些弱点，反正觉得自己要改。

《庄子》一书中，有一篇著名的寓言叫《秋水》。记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和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河伯

在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李讷在读了《庄子·秋水篇》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给父亲写信都写了什么呢？

《庄子·秋水篇》实际上是我们大学的课程。学了这个我一想，我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觉得应该改变，彻底地改变这一切，跟上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后来就想通了，就给他写了信。他很高兴，他给我回信，叫我要读“浅近书”，我以前就是那么大的厚本子，一本子一本子地读，他说你应该由浅到深，慢慢积累，而且是应该合群，要跟大家打成一片，要开朗。经过这个以后，我开始在思想上觉得父亲说得真是对，我要按他的教导做，精神上也比较开朗了，和大家还处得很好。我觉得父亲对我的鼓励是最好的鞭策，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但是真正触动我是在大学这一段。从小他严格要求我们，以及到了最后，到了大学给我反复来信。后来我们写了几次信，交流，父亲觉得比较欣慰，我也感到很高兴，能够得到父亲的鼓励那太高兴了。

毛泽东在写给女儿的信中，鼓励她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一个是身体情况不是太好，再一个就是想这些事情，觉得要好好地改变自己，就是世界观要根本地改变。真正触及我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前后可能有十来封信吧，现在都在档案馆了，我这没有，他都是鼓励我的。特别是我身体不好，几乎每个学期都要生病，在我生病期间，他给我写信鼓励是最多的。他鼓励我，要有意志，要有毅力，他对我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为人一定要立志，要有志气，要有毅力。他在信中还写了一些古人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好多这方面的，比如曹操的很多诗：“盈缩之期，不但在

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像这些很多的诗词，我觉得是他对我的严加管教吧，我很感谢他。

毛泽东的教育方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李讷有着深刻的记忆。

他是很平易，也很民主，你可以随便地讲，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但是真正的大方针你必须听他的。你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是顶撞，就是孩子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

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没有那样的教育，没有那样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今天这样的心态。不可能。

随意的日常生活，也有让李讷不随意的地方，她必须小心翼翼。

反正我们在家里很随便，并不像人们讲的那样，主席也是父亲，我们也是子女，就跟你们家里的父母一样的，在家里很随便，很随意。只是有一点不随意，就是他一睡觉我们都得踮着脚尖走路，我们都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能出一点声音，都是小心翼翼的，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别的。

在中南海，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安静，讨厌人家打扰。

他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去打扰，这哪能去？而且也不要喧哗，但是实在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会去给他捣点乱，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但这种情况，比在延安、西柏坡时，要少。我不是小

时候喜欢画画嘛，我非缠着他让他给我画画。他好像是画了一个大白菜，我现在不太记得了，那个画现在也没有了。就是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去打扰打扰他。

毛泽东并不喜欢过生日，李讷会给父亲送生日礼物吗？

父亲过生日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不怎么过生日，他经常外出，生日经常不在家里。我们只能是在他的生日的时候表示一点自己的心意呀，画点画呀，做个什么小工艺品呀，表示一下心意。好像没有大家在一起吃饭什么的，这种情况记忆不深，基本上好像很少，有我也想不起来了。

记得我十五岁时给他做过生日贺卡，就像现在的小孩叠纸星星、小纸鹤什么的，那个时候时兴那样做。我们那时都有手工课，学刺绣，不是都有丝线嘛，我就拿丝线把纸缠上，然后写几句自己心里的话，很简单，中学生也没钱，就表示这个心意，他就很高兴了，不需要太多的什么了，就是表达心情，我爱他，我希望他好。他过生日了，我作为他的女儿，把自己要表达的心意表达出来。东西虽小，但是个心意，自己亲手做的。我还画了画，写了一个寿字，附了一封信给他，我不是当面交给他的，因为当时他在睡觉，我好像是请卫士放到他办公桌上的。

1960年生日那一天，毛主席为什么给李讷讲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故事呢？

苏秦张仪的故事他经常讲，特别是苏秦那时已经佩六国相了嘛，他佩了六国的宰相印，他那时候已经很得意了。张仪就去投奔他，苏秦就让他大摆宴席，可张仪去了以后，他却让张仪在堂下坐着，然后给他“妾仆之食”。张仪立时就气了，你佩六国相，我跟你都是老同学了，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嘛，大家在堂上大摆宴席，让我一个人在堂下

吃“妾仆之食”。他气坏了，就非要跟他作对，他就是合纵嘛，他就投奔了秦国，其实苏秦就是为了让让他立志气，让他有点志气。我当众羞辱你，你想想，你要是有一点志气的话，就要努力，而且张仪出走了以后，旁边就有人跟着。当时张仪还不明白，你老跟着我干什么，那个人也不说话。他就一路上帮他，比如说要用钱的时候给他出钱，过什么关的时候帮他出关。后来张仪就问了他一句说，你是谁呀，你为什么这么帮助我呀，他就说，是苏秦叫我来帮你的。张仪就明白了，当时让他吃“妾仆之食”就是为了让让他立志，做一番事业。以后张仪不是做了秦国的宰相吗？秦国终于打败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你说苏秦他是对张仪好还是不好呢？不能简单地看让他吃什么。至于1960年这次我不记得了，好像没什么印象。不过，你们可以查一下有没有记录。（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我们查了，有，1960年毛泽东生日那天，他同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苏秦张仪的故事。）

李讷的姐姐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后，毛泽东想念李敏的时候，就让李讷代他前去看望。

姐姐搬出去自己住，爸爸起初不知道，姐姐以为爸爸知道，心里面结着疙瘩。爸爸想起姐姐，就让我代他前去看望。姐姐在大学，我去看过她，她那个时候做实验，她学化学的嘛，硫酸烧得腿上裤子上都是洞。当时，我去看过她，以后又看过她几次。我们姐妹是挺好的。她住在兵马司，后来又搬到景山后街。至少有两到三次是父亲正式叫我去看她。我就执行嘛，坚决执行，就按父亲的意思去看。

毛泽东不仅注重培养儿女间的亲情，而且利用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渊博学识，并针对孩子的心理特点，亲自为他们选择必读书目。李讷后来选择读北大历史系，与毛泽东的熏陶不无关系。毛泽东当年编的教材是什么样子，如果能留下来说不定会畅销呢。

他让我们先读《水浒》，因为《水浒》好读，故事也比较引人入胜，然后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诗词，反正都是他给我们选的，从各种诗词集里选的，订成好几本。打印成册，每个孩子一套。包括我的表哥，我的堂弟，人手一份。这个可能别人不保存了，反正我是没有了。经过了这么多的折腾，你看现在我的信也没有，照片也没有，都没有了。那个很珍贵的，铅印的。但是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一般，喜欢的就背，就感兴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和图书馆的老师最好，到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关系更好了，因为我喜欢看书，所以看得多一点，背得也多，他一看你感兴趣，背得也多，他本人就喜欢了。喜欢就谈的多一点，逐渐逐渐地给你的也就多一点，我也去问，还有什么，他就都给你，这样逐渐逐渐就开始吃偏饭了。因为他喜欢文史，周围又没有人跟他交流。我喜欢，所以他就给我讲。比如说大观楼的那个对联，他说，你明天就给我背出来。结果到第二天，一直到下午我要回学校了，他还没起来，等下个礼拜我就问他，你还记得让我背吗？他说，哦，那你就背吧，我就背了一遍。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越喜欢他就越给你，就越有共同语言。

我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文科，但一开始的时候，母亲叫我学理科。我喜欢文史，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别选文了，我已经填了理科的表。他问我怎么想，我说我不愿意，我还是不能学理工科。父亲说，那你自己定，可以嘛，我又转过来学文科。然后就考试了。

毛泽东在生活上对子女的要求很严，但在学习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格。这主要是考虑李讷的身体情况，他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更重要的，是把学到的东西用在为人民服务上。

总的来说，他应该是希望我们学习好。好好学习这是他很早就

提出来的。学生嘛，就是要好好学习，学好知识，将来为国家工作。但是你要做得太过了他也有些想法，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考六门，我全部都是五分，考试完回来就生病住院，父亲就有些看法，他说你不一定都是要五分嘛，你也可以有几个四分嘛，三分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是总的功课是好的也就行了嘛。你像考察，你得了四分有什么关系呢，那又不是考试。他不喜欢你做得太过了，按他的说法就是过犹不及。你非要全优不可，像这种情况下，他就说，你可以得点四分。得三分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是主课得五分就行了。别搞得太累就行了。

但是这里也有别的，比如他不喜欢那种死记硬背呀，读死书呀，这些他不喜欢，他就是要实践一点。我们一去参加劳动，参加“四清”，他特别高兴。你老读，死读，他不是也说过这话吗，越读越蠢。

他的原则就是你只要接触劳动人民，跟他们一起生活，共同劳动，你就是接触社会，你就会了解社会，这就是好，我参加了三期半“四清”。我是学文的，这个算我的基本课。

即使在学校，他也要我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合群。具体说，就是不要搞特殊化，要和普通人一样，学生也是群众。你要到那去联系群众，你的周围都是群众，你跟他们打成一片，合群，这也是联系群众啊。你不搞特殊化，这就是联系群众。学生的条件有限，我不能单独跑到哪个地方去单独联系群众去，是不是？

毛泽东到了晚年，孩子们大多不在身边，父女间的亲情是怎样体现的呢？

这个我就很难说了，他的境界，不是我们能揣测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人的心灵就像那高山之巅，那里终年狂风大作，云雾满天，可是呼吸却是异常的顺畅。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比较好。人都是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有痛苦，有欢乐，这都是很正常的。



李讷和父亲、哥哥、刘松林在香山双清别墅

说实在的，他严格要求我们，就是他对我们感情的表现。他若不是真正地爱我们，希望我们真正走上社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不会那么严格要求我们的。这就是爱，我觉得这个严就是爱。他也像普通父亲一样的，跟我们在一起时很随意，很愉快，他也很喜欢孩子们的随意。没有什么拘束，就跟你家一样，你家什么样，在父母面前什么样子，一样的。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毛泽东对子女的一贯要求。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是毛泽东的最大希望。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李讷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如今她的生活宁静而又淡泊。身为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呢？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对我们的希望也是很大的，他不希

望我们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不是的。他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他的意思就是干部子弟有先天的缺点，你要克服它，不要纵容它，不要骄娇二气，自以为是。他自己就是很简朴的，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的卫生间里的洗涤用品就是一块肥皂，就是固本牌的老肥皂，就那一个，别的什么都没有。他衣服上的补丁那么多，他不用说，你自己自然而然就那样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就是要勤俭，朴素，要求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靠自己的能力学习，为国家做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和大家一样的。他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没有对我那样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这样的今天。他的那种严格，他的那种言传身教，他不是说教，他就是那么做的，我非常感谢他。

毛泽东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遗产，李讷心里有没有委屈和遗憾呢？

我觉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比什么都可贵。我觉得我学得还太少，只是皮毛。我的孩子自己就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自己单过，他也心理不平衡，但是应该走上社会，自己挣饭吃，这个也做不到的话，你就是不合格。

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做，除了这个我别的不想。我只要努力做到这一点，父亲说过，只要你们做到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就满意了。

访问 刘松林



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松林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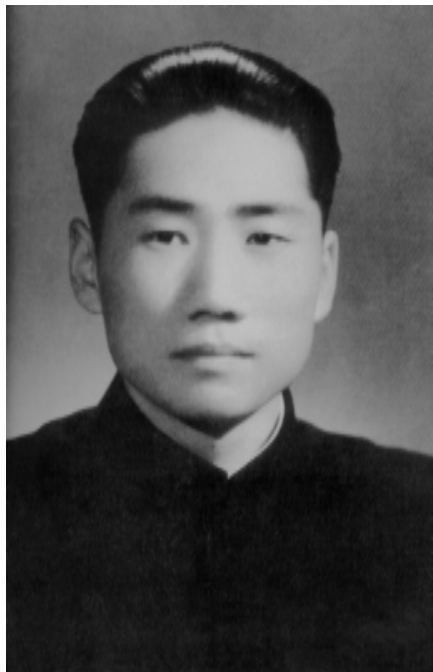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刘松林有了心理准备后，找机会把毛岸英牺牲的实情告诉了刘松林。听到这个噩耗，刘松林悲痛欲绝，毛泽东泪光闪闪……

刘松林原名叫刘思齐，是革命烈士刘谦初与革命老人张文秋的女儿，也是毛主席的干女儿。1948年在西柏坡，二十六岁的毛岸英与十七岁的刘松林开始交往，并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毛泽东得知了他们的恋情。毛泽东很高兴自己的儿子能与干女儿结合，于是正式地和张文秋谈了儿女婚事，但在毛岸英提出要和刘松林马上结婚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同意。

毛泽东的理由是刘松林不满十八岁，不到规定的结婚年龄。毛岸英对父亲说，其实也差不了几个月。毛泽东严厉地回答：“差一天也不行。”直到1949年的10月，刘松林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毛泽东才允许他们结婚。在刘松林的记忆中，毛泽东是一位慈父，张文秋是一位严母，毛泽东给他们更多的是慈爱。

结婚的那天，那个晚饭，我们很简单的，就两桌饭。当时因为主席要开常委会，晚上，就把几个常委请来了，吃一顿饭，然后还有他们的夫人一块吃了一顿饭，常委他们就去开会了，所以这顿饭呢，实际上都是毛岸英安排的，海参什么的都没有，就是腊肉啊，腊鱼啊，就是主席家乡的那些。现在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顿家常便饭，这个是毛岸英安排的，所以主席在宴会上特别高兴，就说这都是岸英自己安排的。吃完饭了，大家都去开会，常委开会，我和岸英就准备离开。我们的新房不在中南海，在岸英工作的那个院子里面。岸英就害怕回去以后他们同事闹新房什么的，他就怕那个，他就带着我，他说我们去到

那个，当时叫紫光阁的地方，我们到那里看电影去，我说好。我们俩就跑去那儿看电影。那是个星期六，星期六晚上都有电影。我们俩去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回来以后，这边的会已经开完了。然后，我们就向主席告辞。告辞的时候，主席就在他的房间里拿出一件大衣来，黑色的大衣，旧的。他说，这件大衣就送给岸英当结婚礼物。看我站在旁边，没有礼物给我，想了想说，哎，晚上，你们两个盖，思齐也有份了嘛。就这样，这就是主席送给我们的礼物。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尽管很简单，我总觉得好像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间，他一个手抓着主席，一个手抓着我，所以我们通过岸英这一条（线），通过他的身体，通过他的心，我和主席是连在一起了，是永远的一家人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亲自把自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战斗前线。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为新中国献出了二十八岁的年轻生命。毛泽东失去了他的大儿子，而结婚刚刚一年的刘松林也永远失去了她的丈夫。毛泽东怕刘松林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没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松林。因为毛岸英去朝鲜的时候，刘松林正在病中，他担心刘松林的身体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刘松林每次到

中南海来看毛泽东都要问岸英有没有来信，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次感情的煎熬。毛泽东在刘松林有了心理准备之后，找机会把毛岸英牺牲的实情告诉了刘松林。听到这个噩耗，刘松林悲痛欲绝。毛泽东泪光闪闪，强忍悲痛安慰她说：“岸英去了，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岸英牺牲以后，他多了一份心事。他觉得直接和我谈，特费事。他要照顾我，又不知道我心里都想的什么，情绪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他很想了解我的思想动态。有一次在中南海院子里的大树下，是夏天，很热，我拿着大蒲扇给他扇，后来，他又拿了一把蒲扇。那一次谈了四个小时，把家里五个牺牲的烈士从头到尾细数了一遍。并说了岸英许多童年趣事，有时还哈哈大笑。看到主席那么平静，我怎么也不相信岸英会出什么事。后来，我想这是他在做铺垫，为告诉我岸英牺牲的消息做铺垫。

毛主席告诉我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我要求回到我自己的母亲那里去，毛主席同意了。但是在我临离开的时候，他给了我他平时用的那种绿色的安眠药，给了我三粒安眠药，让我拿回家，说睡觉以前你吃一颗，你这一晚上就可以比较安静地睡一个觉。

但是我拿回去以后，我母亲她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吃了安眠药对人脑子是不好的，它的副作用就是会伤害大脑的记忆这些东西，所以到后来我睡觉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三颗药了，我记得我回去以后躺在床上，就把三颗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但是后来就没了这三颗药，没了那三颗药，我怎么翻天覆地地找都找不到，所以我那一夜根本就没睡着，就是通宵的，通宵失眠。

所以后来我问母亲，我说那三颗药是不是你拿了？她说是她拿了。所以我觉得最能体谅到我的感情的还是毛泽东，因为我母亲她只是想不要让我脑子受到损害，但是她没想到感情的压力比脑子的损害要大十万八千倍。

刘松林难以承受失去毛岸英的沉重打击，一度神经衰弱，她提出要到苏联去留学，毛泽东同意让她出去换换环境，这样可以缓解她的悲痛情绪。

1955年，刘松林前往莫斯科大学留学，俄罗斯的异国风情和学习生活的紧张暂时缓解了她的忧伤，毛泽东还经常给她写信询问她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情况。毛泽东一生酷爱学习，他对子女关心最多的也是学习，常常因势利导给他们一些启示。

刘松林到苏联留学时选择的数理专业学起来很吃力，而且兴趣也不大，她喜欢的是文学。

我想征求一下主席的意见，看自己能不能转到文科上来。当时给主席写了封信征求意见，他支持我，说转吧。当时我还有顾虑，我想这么一转，可能有很多闲言碎语的。你譬如说当时江青什么的，可能她们都得有有一些什么话说。主席当时说：“其他的流言蜚语不用管它，自己愿意做什么，只要做得对，就下决心做下去。”基本上这样，我就提出来回国去了。

1957年，刘松林从苏联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大学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不久，她感觉这个专业和自己的兴趣还是有距离，她想请毛泽东再给她拿拿主意。

因为我转到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以后呢，上课的时候也学中国文学史，我发现我更喜欢中国文学，中国的古典文学。有一次，跟主席谈话的时候，我就流露出来了，就觉得自己转专业又转错了，就说在文科方面还应该有一个更大的选择，我就有遗憾的感觉，主席说，那你已经都读下来了嘛，你不是太迫切的话，我来给你当中文老师。我来教你，他说中国文学也要懂历史。然后，他就让我先看历史书籍。就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子，我现在都记不得了，我只记



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松林、李讷在香山

得第一套是《史记》。然后就让我读《三国志》，还有《汉书》。剩下的我就不记得了。我记得当时书单上有，我一看，当时我就开玩笑说，我说读完这个我都老了。他说老了也一样

学嘛，这个是你课外的喜好嘛。他说人活一辈子就要看一辈子书。他说你就知道你这一辈子看不完这几本书吗，下面还有呢。从那以后，在谈话的时候，他就经常谈一些中国的古典文学，像对《红楼梦》的看法了，对《水浒》的看法，对《西游记》的看法，对《聊斋》的看法。经常跟我说，真当老师了。

他真的比老师讲得精彩，吸引人，听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觉得有这么长的时间，结果一看时间，哦，一个来小时都过去了。

一转眼毛岸英牺牲快十个年头了，刘松林却还是孑然一身，毛岸英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看到二十好几的刘松林总是孤单一人，毛泽东不断地给她做思想工作，劝她早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

大概是1958年，因为我是1957年从苏联回来的，一年多以后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一直希望我能有新的生活，但我当时确实

没有那种心情，就觉得毛岸英一直在我心里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就想不了别的。主席就跟我做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他就说人总不能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嘛。成家立业，有家庭、有孩子，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就总动员我，总做工作，他还是传统的观念。一个女孩子应该在三十岁之前成家立业，他也希望我能在三十岁之前再结婚，快点更好。一直到1959年的春节前后吧，后来我就提出了，我要去给岸英扫一次墓。我就说，因为他生不见人，死不见魂。我总得看见埋他的地方，我的心才能塌实下来。他就同意我去扫墓去。那个时候岸英已经牺牲十个年头了。

岸英是1950年牺牲的，到1959年，十个年头了。主席就说，你还得有一个人陪着去，让你妹妹陪你去，这时候主席就派邵华陪着去的，又安排中南海警卫处的沈同带着我和邵华两个人去的。去的时候主席给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个，来回的路费和开销全部由他的稿费里出；第二个，就是到了朝鲜以后不要惊动朝鲜官方；第三个，就是这些活动不要见报。

去了以后扫了扫墓我们就回来了，从平壤到桧仓还是挺远的，要走好几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来回一整天。后来朝方根据我送的花圈，他看出来是毛岸英的家属来了，所以他们问大使馆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后来朝方就说要招待，还是都谢绝了。后来，朝方说这样吧，我们用民间组织行不行，用民间组织的形式招待的，后来就派了朝方妇联的一个负责人。说不是官方，还是官方。

刘松林在毛岸英的墓前泪如雨下，十年来堆积的忧伤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悲伤过度的刘松林病倒了，毛泽东很快获悉了刘松林的病情，就给她写信，嘱咐她打起精神，早日战胜病魔。

我们扫完墓到三八线去，我觉得可能也是人的情绪太波动了，

免疫力就低下了。我感觉就是嗓子疼，因为原来经常闹咽炎嘛，我就没在意，我以为就是咽炎发作了呢，烧个一天半天就会好的，结果没好。大概有一个月，我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整个人的情绪特别不好，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让李银桥送到医院去的。

抬头写的是“思齐儿”还是“娃”我记不得了，其中就是让我养病什么的，但是有八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意志为主，医药为辅。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主要就是人的精神有点崩溃了。回北京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回家，直接从火车上下来就上医院了。我记得好像一直住到过了五一才出院。出院以后才见到主席。

从朝鲜扫墓归来，刘松林对毛岸英的感情依旧难以释怀，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始终犹豫不决。毛泽东给她写信，敦促她早日找个爱人成个家。在1961年6月13日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的屡次开导使刘松林开始重新面对生活。不久，她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的教员杨茂之相识并相爱。1962年初，刘松林与杨茂之结了婚。

结婚之前，主席知道有杨茂之这么一位同志以后，他曾经去了解过，通过组织系统了解过。然后告诉我这个人不错的，很好的，意思我要交往的话可以放心地交往。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告诉他，我们是1962年的2月中旬结婚的。1961年的年底，我去告诉主席这个消息，我准备明年2月份结婚。他当时非常高兴，就把他刚刚新做的一首诗写给我了，就是《咏梅》，另一幅字是《三打白骨精》，这两幅字我一直留到现在。还有就是，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当时好像叫叶子龙还是叫谁，给我送来三百块钱，还说他也不知道送我什么好，就给我拿点钱，让我自己买我需要的东西，就

作为他送给我的礼品。

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几乎是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父爱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而且我也切身感觉到了，主席对我的照顾已经超出了一个公公对我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关爱。不仅仅是亲生父亲的，而且是一种非常慈祥的，想得非常周到的这么一种爱护。

即使毛主席哪怕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老工人，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担子那么重，年岁又那么大了，他对我的一分爱，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十分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我的爱我觉得一分就是十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忘记他。

我活了七十多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最爱护我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对我的关爱甚至超过我的母亲。

访问 邵华



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在一起

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姻，这不仅因为邵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更因为有了这个婚姻，两家再次亲上加亲……

2003年9月6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之前三天，诞辰110周年前夕，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将军，举办了自己的一个摄影展。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邵华，举办一次摄影展，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就这次展览选择的时间和摄影主题来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摄影展寄托了后辈对一位慈父的无限缅怀之情。

虽然名称是我的舞台摄影艺术展，但副标题是，献给敬爱的父亲，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我要把它放在这儿。

邵华和刘松林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她在1938年10月出生在延安。是张文秋与陈振亚这两位八路军指挥员的孩子。1939年春天，不满周岁的邵华与姐姐刘松林一起，跟随父母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目的是治疗陈振亚残缺的伤腿。可在迪化等待去苏联的时候，陈振亚遭遇意外事故死亡。两个孩子先后失去了生父，又一同在新疆随母亲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活。

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切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原来在新疆帮助盛世才的共产党人，如陈潭秋、毛泽民，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的一些同志，以及从延安经新疆去苏联的同志，全部在1943年被盛世才抓进了监狱。

我的童年就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一直到1946年7月份，张治中到新疆，国共重新谈判以后，我们这一批一百三十多人集体被保送回延安。

回到延安以后，我们就感觉回到了老家，感到无比兴奋。当我们走到离延安十里铺、二十里铺，先是二十里铺，后来是十里铺的时候，看到延安城里这些群众人山人海的，都在山上，在路边迎接我们，我们确实十分感动。像我们有一些孩子都是被这些叔叔阿姨们手递手传进了延安城。后来，大家排着队，主席从头跟我们握手握到尾。像我和另外几个男孩儿，我们就感到和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毛主席跟我们握完了之后，我们赶快又跑到队尾，又再站队，争取第二次再和毛主席握手。

当时党中央对我们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关爱，让我们检查身体，用当时延安最好的饭菜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拍下了一张我们永远难忘的照片。当时有从新疆回来的全体同志的一张照片，还专门为我们孩子们，这二十多个孩子拍了一张照



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

片，照片上给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做“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

1949年10月15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为夫妇之后，邵华有了更多机会跟随姐姐、姐夫一同去看望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关心，邵华才走进了育英小学的大门。

1950年的时候，岸英哥哥还没有去抗美援朝之前，周六、周日的时候，他和我姐姐经常利用节假日，周六、周日回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有这个机会，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见毛主席，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有时也开玩笑，叫我小跟屁虫，拖尾巴虫，就带我去去了。每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亲切，有时候毛主席就问岸英哥哥的情况，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我总是在旁边听着。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我当时听了以后，很羡慕，因为那时候北京刚刚解放不久，我一直是跟着母亲南北转战，几乎就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听见毛主席对我姐姐的学习是那么关怀，后来我有一次就忍不住在旁边说了一句，我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主席当时很吃惊，问，孩子，你怎么还没有上学呀，我就简单地给他讲了一下。主席听了以后就对我说，好，你放心，孩子你放心，这件事情我替你来办。我当时听了心里头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替我办，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交给了我一封信，叶子龙同志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直育英小学报到，找韩校长，你就可以上学了。后来就让我当了育英的插班生。

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邵华备加珍惜。她要以优良的学习成绩报答毛泽东。当邵华满心欢喜地给毛泽东看考试成绩单时，毛泽东的一番话为现在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当时，我们在学校都要争当三好生。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在学习上采用的是苏联的5分制，3分是及格，4分是良，5分是优秀，得了5分以后，就会在你的计分册上用红笔写一个5。有一次我的期中考试成绩，看上去几乎是满篇红，满堂红，唯独体育是一个3分。我很高兴地拿去给主席看，好像沾沾自喜，因为我拿了个满堂红嘛。毛主席看了之后，对我说在体育方面要加强，要增强体质，要进行锻炼。另外，他还教导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把精力平均地用在每一门功课上，说你应该钻一门你最喜欢的，你认为是最

值得学习的东西，在这一门学科上，你要去有所突破，有所理解，更深一点，不一定认为满堂红就是好的。

我听了主席的这番教导，我就觉得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门门都想得5分。但是从主席教导我以后，后来我就注意在学习上有所侧重了。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比较喜欢的文学上。



毛泽东和邵华的合影

最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邵华上了中文系之后，和毛泽东之间就有了更多
的话题。毛泽东有关曹操的话，引起了邵华的思考。

我在上北大期间，还是有很多机会和他沟通。比方说主席就问过我：你喜欢曹操还是喜欢曹丕、曹植？我当时顺口就出来了，我说我喜欢曹植的诗，尤其喜欢他的七步诗，我说你看他哥哥曹丕逼得他没有办法了，七步之内要做不出诗来就要杀掉他。所以我说曹植才华横溢，当时我的印象很深。后来主席说，我更喜欢曹操的诗，从这以后我就比较注意去读曹操的诗了，我觉得他的一些东西的含义、境界确实比曹植、曹丕要高。

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说烂熟于心，似乎对于外国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邵华的感受则不同。

我当时正在学西方文学，我很痴迷地在读一本书，名字叫《简·爱》。后来，我就告诉主席说我在读《简·爱》，主席说这本书怎么样，我就把我当时的心情讲得很多，对女主人翁，对男主人翁，我是多么喜欢，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好像是平等的，是纯真的，反正就是根据我当时的感想胡吹了一通。后来主席让我把书和作者写下来，我当时还不明白，就写在一张纸上。过了不多久，我又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桌子案头上放了一本《简·爱》，我看到他已经看了五分之四了。

通过这件事情，说明主席对子女的读书、学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也是非常关注的，也看我们喜欢一些什么书，应该怎样来引导我们，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主席不像别人说的，不看外国小说，这就是一个实例。我还记得这件事是我姐姐刘松林告诉我的。那还是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有一次主席

告诉她，你去给我借一本《茶花女》来，后来我姐姐想办法到她认识的同学那儿借到了一本《茶花女》，给主席送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又把这本书还给我姐姐，说你还给人家吧，我已经看完了。我姐姐拿到这本书以后顺手翻开一看，里头圈圈点点，甚至还有眉批，把我姐姐吓坏了，她就觉得我从人家那儿借来的几乎是一本新的书，现在被主席都看成这样，我怎么还给人家，人家要问我，我怎么回答，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后来我姐姐给我讲，她把这本书后来还人家的时候，赶快合上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还给你，然后扭头就跑了。后来大家都说你真傻，如果你要是告诉那位同学这本书是主席圈点过的，那将是珍宝，可是我姐姐吓得没敢说，就跑了。那位同志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主席看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我觉得非常遗憾。

1957年10月，毛岸青在苏联修完学业后，从北京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开始与毛岸青通信，甚至在闲暇的时候陪姐姐一同到大连去看望他。毛泽东知道他们交往的消息后，便写信给毛岸青问他的想法。

岸青后来身体不好，从苏联回来就在大连休养。休养的时候我们经常通信，我和姐姐也去看望过他。我并不知道主席怎么知道的，可能是通过岸青那边了解到我们之间在通信，后来父亲也问过我，是不是你们常写信，是不是互相在鼓励，互相在安慰，我也说是的。所以直到最后，主席后来给岸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谈到听说你们俩经常通信，对我还进行了一个评价，说邵华是个好孩子，你们是不是有做朋友的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也是有进一步感情升华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作为主席来讲，作为父亲来讲，他对自己的孩子，不光是学习，另外，生活、感情世界他还都是给予关怀和指导的。

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

虽然没有参加婚礼，毕竟生活条件比刚建国的时候要好，不再像毛岸英结婚时，只送了件旧大衣。毛泽东送给邵华一块手表，还为儿子的小家送了个大件，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姻，这不仅因为邵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更因为有了这个婚姻，两家再次亲上加亲。

1960年，我们是在大连结婚的，是由大连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主持的婚礼。父亲送给我的一块表，直到走不动了，我才收藏起来。送给我们的还有一台国产的、南京出的熊猫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摆着，虽然不能用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珍贵的。

邵华和岸青在大连度过了一段新婚岁月之后，于1962年回到北京看望父亲毛泽东。毛泽东嘱咐他们，不要忘了去看一下已故的妈妈杨开慧。

到1962年，岸青和我就从大连回到北京了，我就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我们结婚后，第一次见父亲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新媳妇应该回去，回韶山去见见韶山的父老乡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婆也还健在，说你们应该回去看望外婆，应该去给你们的妈妈杨开慧扫墓。所以，后来我就和岸青遵照父亲的指示，我第一次到了板仓看望了外婆，就到了韶山。所以我当时回去以后，看到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很多乡亲的辈分我还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的确实也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护，也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所以那一趟湖南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湖南之行，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去给开慧妈妈扫墓，也照了照片，现在这些照片我都珍藏着，这次用在杨开慧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之中了。也去看望了外婆、舅舅，也都照了相片，包括韶山。现在翻开这些照片看看，都



毛岸青和邵华在杨开慧烈士墓前

感到确实是非常珍贵的。

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母亲格外尊敬和关怀。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寄去五百元钱作为丧葬费，并致信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让杨老太太和我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在主席年轻的时候，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外祖母给了毛主席很大的支持，她帮着开慧妈妈一起带着和抚养毛岸英三兄弟，在主席最困难的时候，在开慧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外祖母能够把亲友们送给杨昌济先生的奠仪都拿出来，给毛主席搞革命活动，这一点不是一般的女性能够做到的。外祖母为毛家、为革命做了很多贡献，所以到她晚年的时候，当毛主席知道她还健在的时候，是非常

高兴的，每年到她生日的时候，主席总会给她寄一点钱去，或者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同志给她带去衣物，给她送去一点祝贺生日的礼物，有的时候给她写一封贺信，主席对杨开慧的母亲是非常敬重的。

后来当他知道杨开慧的母亲去世以后，主席是非常悲痛的，所以他当时给舅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道，“让杨老太太和我亲爱的夫人杨开慧同穴”，让她们母女俩安葬在一个墓葬里。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深深地表达出主席对杨开慧的怀念，对杨老夫人的一份敬意。

毛泽东对夫妻之情和战友之爱，有着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杨开慧是李淑一的中学同学，而毛泽东则是柳直荀的早年战友，20世纪30年代初，在战争中杨开慧和柳直荀先后牺牲。《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便寄托了毛泽东对爱妻和好友的深刻缅怀之情。1962年9月1日，当毛岸青和邵华再次请求父亲抄录这首词以作留念时，毛泽东又把诗句里的“骄杨”改写为“杨花”，以此来寄托他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

有一次，我和岸青一块回去看望父亲，那天父亲工作也比较轻松，情绪也很饱满。在谈到开慧妈妈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写的《答李淑一》，给我和岸青写一份。爸爸当时说可以，他就坐在案头前把纸铺开了，然后他提笔就写了“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当时一看就有点误会，我说不是骄杨吗，怎么这个地方写成了杨花了呢？父亲提了一句，称杨花也很贴切。后来我回到家里去领悟父亲的这句话，他给李淑一同志写信，给柳直荀烈士和杨开慧烈士一块题这首词，这是战友之情，所以他称之骄杨。他给子女写信，给我们的母亲写信，所以他觉得是很亲切，应该是充分地表达亲情这方面，也表达他对开慧的另一个方面，很亲

切的方面，所以他就提了“杨花”两个字，这是我后来的理解。

毛岸英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部“捷夫”牌相机，邵华开始用这部相机记录下家人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宝贵镜头。毛泽东同意她拍照，不过他给邵华来了个约法三章。



我为主席拍摄的照片

那时的相机不像现在的傻瓜相机，从对焦距，从速度一直到它的曝光，全部都要用手动，那要有经验的摄影师，像侯波老师、徐肖冰老师、吕厚民老师，他们有经验，可以得心应手地来用。可是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摸过相机的孩子，也从来不懂得少年来讲，我觉得操纵起来十分困难，但是我也很想把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宝贵的时光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就开始想为毛主席拍照。看见孩子们老是拿着相机对他照来照去，后来主席给我们规定了三条，你们要给我照相可以，但是第一，你们不许拿到外面去

冲洗；第二，你们不许发表，就是不许给报纸、杂志投稿；第三，还不许送人。

那个时候，我们一切听从他的指示，最后逼得我学暗房技术，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把卫生间、门窗堵起来，用红布把灯光包起来，再到外头买药粉自己调配，尤其配得比例还不对。首先是冲胶卷，然后冲洗照片，最后还要进行映像。对我来说，每一关

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所以照片虽然照了一些,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照片就报废了。所以我现在虽然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我感到很遗憾,没能多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喜欢摄影了,尤其是后来随着新宇出生,他从小,从一个月开始的照片,一直到他成长到今天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给他拍的。

刚学拍照的时候,拍出的照片虽然很幼稚,但这是毛泽东与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

那个时候刚学摄影,我和主席的照片是姐姐给我们拍的,姐姐和主席的照片又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姐姐抓拍的,因为正好我过去和父亲握手,她就按动快门,也顾不上取景了。所以当这张照片洗出来以后一看,正好后面有一个花架上的兰花戴在我的头上



这张我“怒发冲冠”的照片是姐姐抓拍到的

了，好像我的头发竖起来一样，把帽子顶掉了。后来主席说，她的怒发把冠都冲掉了。我也想把这张照片通过电脑修掉，后来一些摄影家告诉我还是要保持原汁原味，不要修，就这样，这张照片到现在还保存着。

对邵华而言，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活跃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无论做什么事，父亲的话语都会始终不断地回响，一直影响着她、激励着她。

毛主席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全党同志的心中是伟大的领袖，确实是世纪伟人，但是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心中，他不光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位慈父，他很体谅、很了解孩子们的心情。只要我们的愿望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能满足我们的愿望，所以我深深感到，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访问 张耀祠



毛泽东在中间游，一中队的警卫战士围在毛泽东四周，保护他的安全（前左一为张耀祠）

第一班站岗，班长分配我站在毛主席门口。毛主席的门口有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在毛主席的门口站第一班岗，这对我太有意义了……

张耀祠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警卫团叫8341部队，那么，8341部队的叫法是怎么来的呢？

8341部队是在1953年5月开始筹建的。原来这个部队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第一支，那个时候属于中央警卫师一团。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以这个团为基础，不合适的就调离了，合适的就留下了，不够的再从外面补充，从各个地方抽调了一些干部。当时成立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千人的建制吧。不到两年，担负的任务加大之后，人员有所增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个部队的任务逐步增加，大会堂的警卫，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加上天安门，后来又加上北戴河，以及林彪的警卫。8341只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代号，并不是正规的番号，番号还是中央警卫团。这个代号是根据总参的编制，按照序列的排列给的代号。这个团原来有一个代号，就是中央警卫师里头团建制的代号，代号也不是8341。8341这个代号是重新给的，由总参谋部给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归总参谋部管，属于总参谋部的编制。这个团名义上叫团，实际上的编制是师的编制，待遇也是按照师的级别给的。

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毛主席曾找过一个老道，老道写了“八三四一”四个字，主席不解，就顺便给了中央警卫团当代号用。这当然是谣传，没有那回事。主席活了八十三年，当我们党的领导人在位是四十一年，放在一起就是8341。可83、41，这两个数目字，分开说是符合事实，合起来说只是巧合，并不符合8341部队

的编号这个事实。

实际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很简单，没有那么神秘。主席逝世以后，人们要那么猜测，主要是不了解事实，我在这里愿意澄清一下。

8341 部队刚建制的时候，它的任务主要是保卫中央五大书记的安全。

那个时候，中央警卫师的任务范围很广，力量不那么集中，所以中央决定，单独成立一个团，专门负责中央五大书记的安全，那时候称呼书记，实际上就是五大常委。

这样一来，任务就有了一个明确分工。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成立这个团，把警卫的目标集中了，对安全保卫比较有保证，安全的系数就大一些。

另外，机关很多事需要部队的帮助。比如说，机关的编制没那么多，首长住处的卫生打扫也要部队来做。那些玻璃、门窗的卫生都要我们去打扫。有了这个部队，他们就方便多了，机关的负担就减轻了不少。

张耀祠第一次见主席是在 1933 年，他的第一班岗就是为毛主席站的。

1933 年，我是十七岁参军的。参军后，就到了毛主席这个警卫连。这个警卫连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从部队选拔出的，当时是在江西的于都县。

我到了这个连以后，一边执勤，一边训练。第一班站岗，班长分配我在毛主席门口。毛主席的门口有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大前年去那里，我还去看了看。当时，我背了一支枪，站在主席门口，心里很高兴。在毛主席的门口站第一班哨，这对我太有意义了。

1935年初，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遵义城。主席进城的时候，有一个即兴讲演。

那是1935年1月，大概是9日进的遵义城。遵义被一条河分成老城新城两个城区。我们当时住在新城，然后穿便衣到老城去检查。敌伪他们跑了以后，我们去查房子，为领导同志找住处。主要调查的对象就是当时城市里头的一些商店、小摊、学生等。调查以后，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问题，要走的都走完了。

主席进城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街道两侧担任警卫。两侧的街道都是群众，站的长长的，远远的。所以，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前进的时候，我们都是跟着群众往前走。

当时，部队排成三路纵队前进，两侧的边上是国家保卫局的开路队，就是我们现在的警卫连、警卫排。这些是学人家的，都是学国民党的，学苏联的。群众就在大街上欢迎，喊口号，敲锣打鼓，场面非常热烈。首长们高兴地频频向群众们点头。

过了一个小桥，现在那个地名我记不起来了。过了那个小桥以后，就到了老城，我就跟着毛主席进了老城。主席可能受到了感染，他要给群众讲演，我就跟着主席，到了一个操场，这个操场不大，可以坐几千人。那没有讲台，看主席要讲话，有同志就把长条板凳放在主席面前，主席就上去了。当时，我就站在主席身后，注意两侧，防止意外。主席讲演中间，有不少学生都不认识毛主席，他们在大街上看到高鼻子，以为高鼻子是毛主席，其实那是共产国际顾问李德。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军委领导人有了很大变化，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被赶下了台，警卫他的工作严格起来。

遵义会议以后，博古和李德都被撤下来了。因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就想不通，有可能自杀或逃跑，所以国家保卫局长邓发就让我们好好保护他。那个保护实际就是限制，要避免他自杀、

逃跑。他的行踪我们就跟得比较紧，特别是夜间，到了宿营地，我们会特别注意，因为在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一路行军，到了宿营地，大家都很疲劳，局面相对混乱。他如果趁那个机会跑，就不容易发现。我们当时是打了保票的，说保证不出事，所以我们就放哨，监视他。后来到了延安，也没出事。

建国之后，张耀祠跟着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毛泽东爱游泳，有江河的地方，他都要试一试，比如长江、珠江、湘江，他都游过。

主席游长江，我就陪他去了两次。一次是1956年5月31日游长江。这次游长江，他是先从广州坐飞机到了长沙，先游了湘江。第二天，再坐飞机到武汉，随他去的有罗瑞卿，还有杨尚昆，汪东兴也在。

到了武汉，下午就游。这一次游泳，我下去了，还带了一个游泳圈，怕自己沉下去。游之前，我先去准备船，除了一条大船，还有三条小船，小船划起来方便。

主席看了这些东西说不要，小划子足够了。

那次的水好凉呀，凉得肚子好难受。我游了一个钟头就上来了，坐到船上，胃受不了。其他来的同志一直跟着他游。我们一中队培养了一批会游泳的人，水性很好，就是要保护他。

通常情况下，游泳技术比较好的都靠近他，万一有情况能及时处理呀。不光是能救人，还要能保护自己。没有这个本事，你下去不管事。那是在江里头，你不走它冲着你走。你要能稳住，你稳不住不行，我下去都稳不住。

游泳是毛泽东非常爱好的运动，爬山也是。

1954年二三月，毛主席在杭州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都

是下午爬山，晚上工作。后来，主席多次去杭州，杭州近郊大大小小三十多座山，主席都爬过了。要爬哪座山，什么时候去，他首先就定好了，直到临走的时候才告诉你，不早告诉你。他反感兴师动众，提前清场警卫。我们只好跟着他走，一说好了方向，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就像打冲锋，部队肯定走在前面，在前面搜索。有的山还有树木，还有草，你得检查一下树林里、草地里有人没有。保障安全的各方面都要想到，他走的路线要检查，要去山顶，我们都跑到上面先去检查。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也很繁重，责任也很重大，丝毫不能马虎。

爬山时，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毛泽东从不走回头路。

这就是主席的特点，他爬山从不走回头路。不管路好走不好走，他都不会回头。他非要走另外一条路，如果从这边爬，必定从那边下山，绝对不再从原路走。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经常拿这个做比喻。

这也反映了他的个性。他这么做也给我们后人一个榜样，也是教育我们。你像游长江，毛主席没去游之前，根本没有人去游过。要是他不去游，恐怕现在也没有人去游长江，现在游长江的人就多了。

主席的这种性格使他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为所动，始终挺立潮头。

1970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张耀祠是跟主席一起上的庐山。

那时候，我一直跟着主席。主席开常委会，开大会，我都参加了，是列席的。

庐山会议的问题，主要出在林彪和陈伯达两个人身上。他们结

成一伙，还有那几位大将，黄、吴、李、邱那几个人，使劲地抱在一起。1970年8月8日，主席还在武汉。9日，主席上山要开全会，要修改宪法。

在山下开预备会时，主席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也不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了。可到了庐山以后，林彪他们就变卦了。

当时主席很不高兴，除了开会，他还找别人谈话，并写了“我的一点建议”。8月30日、31日，“我的一点建议”发给每一个代表，这样就把盖子给揭开了。公开点了陈伯达，并没点林彪的名。主席说，林彪还要保。

但林彪不觉悟，还是坚持他那个观点，要设国家主席。这个会议最后就是这么草草结束了。

毛泽东当时住在庐山的庐林一号。

庐林一号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可以开小会或中型的会。当然主席可以住在那里，其他人一般不住。主席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办公，一般是下午四点多钟去，我们就每天跟着他转。

下午四点多钟去办公，晚上基本上是一两点才会结束。

庐山的8月，雾大雨多，晚上的路根本看不见，黑黢黢的。左边是很深的隘沟，路也不宽，所以车也开不快了。主席告诉我，你多找电筒当路灯，我们试了一下，根本不行。雾浓得电筒光根本照不透，光亮就局限在眼前的地方。

没有办法我们就派了两个人，两个干部，一边提一个马灯，走在前面。你不采取这个办法根本就没法走，看不见路哇。有一个成语“伸手不见五指”，庐山上就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的雾有多大，没去过的人都想象不到。我在那儿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不愿意去了。庐山确实是避暑胜地，就是在夏天晚上还盖棉被，我就受不了这个。

“文化大革命”后期，每年的八九月份，毛泽东常常要到南方去，一般在国庆节之前回到北京。1971年去南方，毛泽东提前回京，林彪仓皇出逃。因此，这一次去南方就有了一些特殊意味。

1971年南巡，主要是要解决庐山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黄、吴、叶、李、邱的检查他们压着没有传达，林彪又拒绝检查。主席去南方到各省市要找那些党政军领导同志打招呼，给重灾区的一些人打个预防针。所以，主席这个时候走到哪里都要讲庐山的问题，讲党的历次路线斗争问题。

庐山会议点了陈伯达的名，去南方点了林彪的名。主席这次去南方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在武汉前前后后住了十来天。8月16日，刚到武汉，就召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第二天，河南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建勋，刘丰也来了。8月25日，主席又召来了已从湖南调到国务院的华国锋。这几次谈话，汪东兴都在。

在长沙，被召来谈话的先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丁盛、刘兴元等人，主席要求广州军区将谈话精神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这一点明显与其他人的谈话不同。后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又来到了长沙。

广州军区传达以后，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详细情况报告了黄永胜、邱会作和叶群。这么一来，叶群告诉林彪别人要动手了，林彪就恐慌起来。

9月12日中午，主席到了北京的丰台。在天津的时候，主席就让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我当时还有一个疑问，主席怎么不到大会堂118室去谈呢？那几年，他一直习惯到118。我当时并不知道主席谈话的内容，因而，猜测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问题。

主席在丰台那里，部署要军队改组，部署调动一些部队，他也是防万一。让北京军区在南口增加了一个师，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主席从北京站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时间，我记得是下午四点，我当时还看了表。

9月12日晚上，各方面的情况相当紧张，张耀祠一直在中南海的游泳池。

这一天下午，林立衡报来了林立果他们在北京西郊机场策划逃跑，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等情况，并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逃跑。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真相，说是挟持。她打电话到警卫团，说我要找团领导报告，接电话的是二大队长姜作寿。姜作寿就说我们的副团长张耀祠在这里，我就接了电话。情况传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总理。总理这个时候也紧张了，他就想办法要空军的总机。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有关安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早有部署，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这边有汪东兴，钓鱼台那边有邬吉成。地面是不容易冲进来，就是怕飞机，所以我们劝主席离开中南海，到了大会堂的118那边。后来，主席在大会堂住了半个多月。

那么，周恩来是在什么时候将林彪逃跑的消息告诉毛泽东的呢？

总理就是在林彪坐的三叉机起飞以后，报告给主席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也做不了主了，就报告了主席。总理到游泳池报告了主席。总理说林彪逃跑了，飞机还在射程之内，要不要打？主席当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要他去吧，就让他去。

不久，传来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飞机往北走了，那是直升机。机场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总理，总理接完回来，就问主席怎么办？主席问又是哪一个，总理说那是周宇驰，驾了一架直升机跑了。主席

说把他劫回来，他不听就打下来，这个不留情了。到最后还是给他拦回来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张耀祠写了一个检查，交给了毛泽东。

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错误，就是跟林彪有点钱粮上的工作关系，我接触两次也算有接触。另外，林彪手下那些单位的头头，有一点钱粮，问题不大，都是小问题，主席并没有把那个问题看成什么了不得的问题。

他对我说，你算什么问题，比你这样的问题重的人还很多。主席这样说，当然是原谅我们，教育启发我们。他说检查一下就算了，对我们主要是以教育为主。他对其他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以教育为主，他不是惩罚为主。

后来好多受牵连的人，只要跟党中央忠诚坦白，把问题说清楚，该检讨的检讨，主席就不追究。

有一次在中央开会，专门给了一些同志检讨说明问题的机会。会是在大会堂开的，周总理主持的。头一天大概有些同志检讨得比较好，把问题也说清楚了，总理打电话报告在武汉的主席。

主席就说，你们给做了检讨的人鼓了掌没有，没有鼓掌，明天要补，还是要鼓一下。后来，总理就按照主席的指示照办了，也向大家说清楚了。

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的身体就感觉不好了，他让张耀祠跟江青谈了谈他的病情。

林彪这件事对主席的刺激很大，主席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得了肺心病、气管炎，说话口齿不清了，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了，写字都重叠。说话有的人听不懂，张玉凤还听得懂。外交

部那两个翻译小姐也听得懂。

他写的字由于重叠，我们就得猜，认不出来。我还存了几份主席写的东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重叠起来了，分不清是什么字。主席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叫我和医生对江青说一说他的病情。我们两个就去了。

我们两个到了钓鱼台，江青有好长时间一直住在钓鱼台。医生先向江青介绍主席的病情，说主席得了肺心病，主要是由支气管炎发展引起的。现在不能睡觉，每天只能坐在沙发上，困了的时候靠一靠，不能躺在床上睡。

可江青不同意医生的意见，她说不可能。主席的体质好，不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她一直坚持这一条。医生怎么讲她也不听，所以我当时就讲，我说江青同志，主席现在年纪大了，不像以前了，以前有一点病，他可以抵抗，不吃药，不打针可以，现在不行了。

我说，比如说主席心脏不好，老咳嗽，咳嗽就震动心脏，就影响心脏。就像一个人跑步，你跑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你要跑一天，能行吗？我打了这个比方给她。以后她就转过弯了，就不说医生的判断错误了。她说以后有什么情况你就报告我。

可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又不让张耀祠他们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江青了呢？

那个时候，主席的病情变化很快，我们一时也难以说清。可江青来到游泳池，见到每一个人，她都要问主席的病情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有时医生也说不清，又不敢乱说。因为医生只知道他现在有什么病，但病的发展，医生也看不出来。

她要问你，你也没办法。她就要考验你，这个人太可恶，我从来没有见到这种人。我跟她斗过几次。那是那一年的2月6日吧，晚上她来了，主席说的不告诉她病情的话，护士长传达了。

我正在值班，江青来了就问，主席的病情怎么样了，我说主席

讲了，不要说病情，说也说不清。她就进去了，她进去了到了主席那里，主席批评了她，听起来不满意，她就出来了，就训我。

她说你今天有敌对情绪。我说有什么敌对情绪，我是执行主席的指示，主席的指示就是要执行。她说不要无中生有，我说我哪里无中生有？她就怀疑，认为我们告了她什么状，我说我们没有，这是主席的话。我说我们是工作人员，主席每天的病情我们说不清楚，主席说那是对的。她那个时候每天都找点茬子，跟工作人员过不去。

毛泽东把工作人员都看成家庭成员，而江青则相反。

主席说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比他的儿女都要好，他说他的儿女对他没有什么帮助，这是对我们讲的，我们对外没有讲这些事。

1975年1月，不是28日就是29日，我记不得了，主席病重了。医生进去摸他的脉搏，没有摸到，医生脸就变了，赶快跑出来给汪东兴主任打电话，请他到游泳池来，商量一下请周总理来。汪东兴就来了，商量以后，汪东兴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马上就赶过来了，那个时候总理也在病中。医生把情况说了一下，总理想了半天说，主席病得这么厉害，也要告诉家属一下嘛，就打电话，总理自己打的，就告诉江青来。

江青来了以后，还是她以前那个调子，主席身体一直很好，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她就进去看主席。主席那个时候坐在沙发上醒了。她一进去，主席两个眼睛就瞪着她。江青就哇啦哇啦叫起来，医生、护士说你有什么大病，我说你的体质好，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她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还说也不用打针，也不要吃药，打针吃药反而不好，就发表了一通理论，弄得主席生气了，主席针也不打，药也不吃了。

江青一看势头不对就出来了，到工作人员的值班室坐了一会儿，就公开点名批评医生、护士，说医生、护士你们谎报军情，该

当何罪？你们都是特务，你们都是奸细。把政治帽子就给戴上了。

当时我在场，总理在场，汪东兴也在场，他们两个没有吭气，我也没有吭气。因为他们两个都不吭气，我怎么说？

江青闹了半天见没有人理她，她慢慢觉得不好意思就走了。走了，护士长就提出意见了，总理给她们做工作。后来开政治局会议要我参加，我又不是政治局委员，我参加什么。汪东兴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江青不让他去，让我去，她拉拢我，这我知道，她的这一套阴谋我清楚。江青在会议上讲，连着两次发言都是讲主席身体挺好，没有什么大病，医生、护士是谎报军情，他们是特务、反革命。其他政治局委员只是听听，没有人吭气。总理坐在那里也不吭气。我看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很孤立，没有人同意她，她的好多话是出格了，不像共产党员说话，共产党员讲是非，她不讲是非。

我听了以后真是过意不去，但我不好在那儿讲。她要我去，要我去我就听听呗。回来后，我跟汪东兴讲，汪东兴就跟主席报告了。有一次总理去了，江青也去了，汪东兴也在，主席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不是说他们是反革命吗，集团吗？他说，你知道集团的头子是谁呀？就是我。

主席就公开点她，说他们要害我早就害了，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情，我也知道他们，他们都是好同志，主席这样就把她的反革命帽子给否定掉了。

1974年，人称“铁蝴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访华做准备。那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知道毛泽东不能会见她时，她拿出手帕擦眼睛，并伴有轻微的抽泣声。毛泽东得知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马科斯的夫人有两次提出要见主席，开始主席都没有答应。主席没有答应，外交部很为难，就把她送到外地参观，送到哪里？送到西安，到西安参观。之前，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了她。她提出想见

毛主席,李副总理说,并非毛主席不愿意见她,而是确实不在北京,请她谅解。据说,伊梅尔达沉默了几秒钟,随即取出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并伴有轻微的抽泣声。一时间,李副总理不知如何是好。伊梅尔达又把她抹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抛到茶几的李副总理一边,不说话,也不告辞。最后,李副总理说,我会把你的要求告诉主席,看看有没有可能。当时,主席患眼疾正住在武汉,还是答应接见她。飞机把她送到武汉。

到了武汉,马科斯那个夫人也是够大方的,见面先亲了主席。后来接见完了,她从国内运了一些芒果到武汉。菲律宾的芒果好吃,个儿大,但主席不吃。

主席不吃,又不能老放着,我就跟张玉凤讲,那些芒果能不能给北京的那些战士送些去。张玉凤给主席讲了,他说不用送了,分给这边的大师傅,你们工作人员、部队,给他们吃吧。

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汪东兴布置张耀祠去抓江青。

确切说是10月6日下午的三点,汪东兴叫我,还有一个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就我们两个去的。我们去了以后,汪东兴就讲,现在中央准备粉碎“四人帮”,要一网打尽。他说叫你们两个来,你们就负责抓这个江青,还有个毛远新。

他就讲了一下方法,他说你去了以后就跟江青说,中央决定把你们隔离审查,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要打电话,把你的钥匙交出来,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管,对江青就讲这个。

他说另外再把毛远新也办一下,毛远新是保护审查,换一间房子,不要住原来那个,还是这么一个地方,旁边还有房子。他说他由李连庆负责,负责他的安全,负责他的住宿。毛远新写的材料,向中央报告的材料由李连庆转送。汪东兴就交代了这一些。

当时，我去了以后就宣布这个原则。毛远新当时就有一股子气，他说主席刚逝世你们就，你们就……他讲了一个就字就完了，就不说了。

对毛远新就是这个简单的处理，就是隔离保护审查。抓江青的时候，去的时候我就给江青宣布，开始我还加了一句，加了一句什么呢？加了一句，江青你现在还在那里破坏中央，搞阴谋诡计，破坏中央的活动。

我讲完以后，江青就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钥匙装在信封里头，写上国锋同志亲启，她把信封的两头用密笺封好，就交给我，这样她的手续算是交代完了。

文件我们没有清查，她也没带走。然后武建华同志就把她带走了，上了车，走了。

“四人帮”他们几个人不是关在一起，是分开的。

张耀祠一直跟着主席，他也许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感受。

主席很念旧，喜欢用熟悉的人。主席喜欢我，我也喜欢主席，我现在晚上做梦经常梦见主席。我怎么也忘不了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不可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一句话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中国有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前十四年从1921年到1935年这一段，这是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就是从1935年的1月到1949年10月，这一段也是十四年。

前十四年我们经过多少曲折，我们党损失多大啊，换了多少位总书记，都没有干出什么名堂。这就说明这个路线不正确，领导人不正确。毛主席打仗是用兵如神，你要消灭我，你还没那个本事，但我要消灭你，我就能做到。像三大战役，就是这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

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也很赞成小平同志讲的这两句话。有的人现在还不服气，可我服气。我跟着毛主席，虽然不是天天跟着，可我是从江西一直跟着主席走出来的。因此，谁也不能否认我的认识更真切、更有说服力。

访问 刘长明



1947年9月转战陕北，在佳县神泉堡中央前委司令部的几位同志合影（后排右三为刘长明）

转战陕北，既艰苦也危险，但只要毛泽东和战士们在一起，就会鼓舞群众和战士的人心、士气。我们也会苦中作乐，在一起合个影……

刘长明12岁就在老家河北正定参军投身革命。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委从事秘书、参谋工作。1946年，21岁的刘长明被调到中央军委作战部枣园作战室担任参谋，开始近距离地与毛泽东接触。1947年初，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军延安，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随后刘长明便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1947年春节，在枣园，我们像往年春节一样，搞了个春节团拜会，枣园村的老百姓也一起参加，向中央领导拜年。但这年的春节与往年有个不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不仅老百姓，就是部队的同志对为什么撤离延安也存有疑问。见到主席，主席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他很幽默、风趣地给当地群众讲解，为什么我们要撤出延安？主席在理论上的思考，在报刊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主席当时举了个很通俗的例子。他说，如果你遇到强盗了，你一个人背着满身的财宝，金银财宝这么一大包袱。一个强盗或者一群强盗要来抢这个财宝，你怎么办？你是背着一身财宝和强盗拼搏，结果你拼不过他，你被他打死了，或者是打伤了，财宝也丢了。撤离不撤离延安，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背的财宝放下，我轻装和这个强盗来搏斗，就可能把他打跑或打死，打败他我就人财两得。况且，我们现在知道强盗要来，可以先把财宝埋起来，再把强盗关在自己家里打，把握就更大嘛。前边人财两失，这个人财两得，这样的对比很清楚，跟老百姓一讲，老百姓就想通了。此前，延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要撤出延安，马上紧张起来，枣园村

的村长带头来打听情况。哎哟，中央撤离了，谁不担心啊，不愿意部队走啊。当然从中央说，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也不想离开，但是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敌人进攻，这个包袱必须甩给敌人，我们不能因为坚守这么个地方，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机动作战，当时我们的作战思想就是主动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出动几十架飞机，对延安轮番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处境危急，必须紧急撤离，然而形势越是险恶，毛泽东越是从容不迫。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主席住的那个窑洞的玻璃都给震碎了。主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敌人轰炸是个什么情况。一看，捡了个弹片回来。主席说，噢，这个弹片不错，留着它还可以打一把菜刀嘛。主席很快从枣园就转到王家坪去了，最后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是从王家坪走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主席了，因为我留下了嘛。作战部其他人过了黄河到山西去了，我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留在陕北。

主席是最后撤离的，警卫主席的同志一再催主席，走、走，赶紧撤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炮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了。主席还是不走，很沉着，还在那里看地图啊，还在那儿思考问题。越紧张的时候他越放松，情况越紧急他越冷静、越沉着，他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他非要看看这个不行，我们大家都着急。最后，还是彭老总发了脾气，别人谁敢叫他老毛。彭老总说老毛，你走不走，不走，我找个担架抬你走。主席这才走，好，我们听司令的吧。当夜，我们就坐车离开了延安，那是1947年3月18日晚上。

毛泽东率领八百多人的中央机关撤离王家坪，开始了长达一年多转战陕北。行军的途中，毛泽东与中央机关大队，多次和国民党追兵擦肩而过，但每一次，都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安然脱险。

我们离开王家湾一路西行到了小河这个地方。胡宗南的如意算

盘是把我们往东赶过黄河去，可主席决不让胡宗南牵着鼻子走。到了小河，我们在山上，天又下了雨。那时候，我负责宿营，就在前面侦察。我们一看天快黑了，就找了一个向导。半夜里，这个向导却迷路了，一队人马被困在了一个山沟里。人迷路，天下雨，怎么办哪？马也不敢骑，老滑蹄呀，只有走路，主席也下来了。我记得，周副主席的鞋子都陷进泥里去了，硬是把它拽出来，找个绳子捆住这个布鞋才行。后来，我们另外又找了向导，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我们爬上山去，敌人就在山下，彼此都听见声音了。就这样，我们走，敌人也跟着走，就到了天赐湾。到天赐湾以后，就听见枪声响起。主席下了决心，好，敌人再上来，咱们继续向西。如果敌人走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下来。后来，敌人放了一阵枪，在山底下哇啦哇啦叫了一通，没上山就走了。主席说，他们走这是正常现象，他们这下回去就好交代喽。放放枪，管它朝哪儿放了，他回去好交账了嘛。天赐湾正好是胡宗南部队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的结合部。马家军一到那儿，知道胡宗南的部队在，就返回去了。同样，胡宗南的部队到了接近马鸿逵防区的地方就掉头而去了。我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安安静静在天赐湾住了几天。

行军途中的危险，不仅是面临敌人的轰炸和围堵，而且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

过葭芦河，我们碰到山洪暴发，桥给冲坏了，一时间没法过河，叶子龙、汪东兴我们都着急啊。我身上带着个作战地图，雨一直下个不停，怎么看呢，警卫员就拿一块雨布，几个人抻起来，我把地图铺在下面，有人拿着电筒，主席就这样看那个地图。无路可走，只有等着架桥，可后边的敌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已经能听见敌人先头部队的响动了，情况紧急。主席说，党的机密最重要，先把机要人员送过去，不要担心我，我会游泳。那个马，它会游水，带着机要员晃过去了。桥架好了，主席等领导同志都在谦让啊。主席一再

说，我会游泳，你们先过。就这样推来推去，周副主席协调说，主席呀，你不过，大家都不会过的，还是你先走。主席这才先过去。过去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个痕迹消灭掉。任弼时司令，当时的代号叫史林，也布置这么做。可主席知道了却说，就是让敌人知道知道，不仅不要拆桥，还要在这儿插上个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敌人看到这个牌子，怕中埋伏，根本没敢过河。过了白龙庙，我们到了杨家垴子。杨家垴子当时设有沙家店战役的指挥部，我们到了那儿以后，所有人员的被服都不卸下来，马也不离鞍。主席说，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战役，敌人几十万，我们才两万多。几十万人呢，集中在狭窄的几十里路以内。这一仗打好了，我们就住下，打不好，我们马上继续走。

那一天也是特别紧急，也是要过河。前边主席骑着马过河，我就在后边看着。轰隆隆的山洪眼看着要冲下来了，主席还在河里。我急得大喊，阎长林（主席的警卫员），你快呀，快呀，快上岸，快上岸。结果，主席刚一登岸，山洪就下来了。

和群众在一起，和普通战士在一起，是毛泽东最高兴的时候，而毛泽东的出现，又会鼓舞群众和战士的人心、士气。

我们转战陕北，警卫团人员很少，河北省太行山给补充了六百新战士。警卫团的团长、政委，经过汪东兴、叶子龙请示主席，这些新战士都希望见见毛主席，见见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那么，请示到底怎么样，他们也不敢肯定啊。但跟主席一说，主席很高兴，他说当然去啊，见新战士我们一定要去。第二天，我这个做参谋的，就跟主席去了。主席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有一个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心里老不舒服。我不是跟在主席后面吗？我看得清清楚楚，主席穿的那个布鞋，脚后跟都快露袜子了；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新衣服，主席穿的棉衣，后边破了一块，棉花

都露出来了。我心想中国人民的领袖，共产党的主席，就这么个着装。我知道条件艰苦，但那种辛酸的感觉还是涌了上来。我当时在后面跟着，就是这种感觉。

主席到了警卫团，团领导和新战士都非常高兴。吃饭的时候，主席和战士们一起席地而坐。主席边吃饭边问，你们为什么当兵啊，怎么来的啊等等情况。战士们都争着回答，主席很高兴。主席又说，我们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一个连可以顶住敌人几个团。你们新战士来这儿不容易，这么几百里路、上千里路来到陕北，对中央警卫团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生力量。主席特别讲到枪的问题，他说你们手中的枪一定要十分珍惜。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始不懂得这个枪的重要性，后来，我们懂得枪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嘛，才拿起枪来搞武装斗争，才慢慢发展起来。

转战陕北期间，队伍所到之处，都会得到老百姓的帮助，毛泽东时时告诫干部、战士，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我们每住一个地方，借老百姓的锅，老百姓的灶，自己做饭。一做饭，走的时候呢，主席必然到我们机关做饭的灶堂那儿去看一看。第一天，警卫员不知道主席什么意思。第二天，他们明白了就给主席找了一个树棍子。他说，哟，这个不错，有个棍子，行军还起着助力作用。就这样，我们每一次离开行军宿营地的时候，主席总是要用这个棍子，到灶火地上扒拉扒拉，看有没有火星。他担心我们一走，如果这个地方再起火，燃烧起来，烧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就对不起群众了。

在转战陕北的纪录片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毛泽东的镜头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转战陕北，沙家店战役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就过了一段

比较平静的日子。没有了敌军的威胁，我们又可以白天行军了，再也不用夜行军了，可以轻松自如地走了。就在这段时期，延安电影团派来一个电影组，他们带着摄影机。组长是陈默，他带着电影组想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镜头。拍的时候，虽然没有战斗，我们每天仍要走五六十里路。15里路，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叫小休息。走30里路，叫大休息。大休息有半个小时，一休息大家就围着毛主席，围着他闲聊啊，就是很随便地聊天。这个时候，陈默他们就开始拍镜头，拍主席。开始主席不注意，后来一发现有人给他拍镜头，拍电影，他问怎么回事？陈默同志告诉叶子龙，叶子龙管这方面的事，说是想拍点资料留下，可主席不干。他说，现在我们的胶片非常珍贵，你们应该用这些胶片拍那些战士，他们中间可歌可泣的事情多得很，你们拍他们去，不要拍我。可陈默他们总想多拍一些主席的镜头，这怎么办呢？结果，还是叶子龙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以后你拍，找个隐蔽的地方，镜头对着拍就行，你们人不要出来嘛。

多年的并肩战斗，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之间形成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部队到达王家湾时，住房十分紧张，中央前委的五位领导，只有一间窑洞可以容身，然而就在这间小小的窑洞里，却弥散着一种同志间真挚的关怀。

王家湾的老百姓一共十几户，找房子很不容易。好不容易动员出来一户，只有两孔半窑洞。什么叫两孔半呢，就是一个窑洞门进来了，右边开了一个小窑洞，没有门，有个窗子，有过道，旁边是这个窑洞墙上挖了一个洞，人可以钻进去，也可以躺下，可以坐起来，但是站不起来，这叫两孔半窑洞。这样的窑洞，要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胡乔木同志五个人，可怎么住呢？他们互相推让，都想把好地方让给别人。最后，让来让去，

让成这么个情况，主席住在里边，周副主席、陆定一、胡乔木，住在当中的炕上，弼时同志爬到那个洞里面去。那么工作呢，情况又不一样，主要是时间不一样。我们在转战陕北的时候，老百姓点的是油灯，却没有油可以用。主席他们工作，都是用随身带着的蜡烛。那时候，我们带的蜡烛不多，只能保证主席、周副主席几个人用。主席有个桌子，点上一支蜡烛，就可以工作了。周副主席那儿呢，他把自己棉袄脱下来作为垫子，垫在老百姓那个酸菜缸上，就在那个缸盖上写东西。陆定一、胡乔木两个，在老百姓那个炕上盘着腿，就在腿上写东西。弼时同志也像陆定一、胡乔木那样在膝盖上写东西。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然不忘互相关照，都怕影响别人休息。我们去送东西，总理见了就摆手，意思是你不要说话，不要有声音，以免影响主席休息。主席写东西，一般写完以后给周副主席看一看。他出来的时候，都是轻手轻脚。周副主席写东西，怕影响陆定一、胡乔木、任弼时休息，就找个板把那个蜡烛光遮起来。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是过了绥德以后。周副主席到了井儿坪那个地方，鼻子流血了。我一看周副主席鼻子流血了，赶紧跑去报告主席。在转战之前，警卫员曾为主席准备了一个担架。当时，主席说你们准备你的，我是坚决不坐。一路上，主席真就没坐过。这一次，主席一看周副主席鼻子流血了，两个大夫正给总理止血。主席赶紧叫警卫员，把担架送过去给周副主席坐。周副主席不肯坐，任大家连推带说，才勉强坐下来。这就已落了一段距离了，过了一会儿赶上主席了，周副主席马上下来了，坚决不坐了。主席跟警卫人员说，你们准备的担架还用上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用上了，好。

1948年4月23日，刘长明在周副主席的率领下进驻西柏坡。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并没有进过军委作战室。

在西柏坡时，我是军委作战室的参谋。军委作战室虽然与毛主



1948年3月离开陕北杨家沟东渡黄河前，中央前委首长秘书室的几位同志合影（后排为刘长明）

席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但他并没有进过军委作战室。可在不少影视作品中，比如《大决战》等，都有毛主席到作战室研究作战方案的镜头，甚至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在那里开会。这作为艺术虚构，并不是不可以。但实际情况是，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时，并没有到过军委作战室，都是我们每天往他那里跑，当时前沿电报很急，标明“等复”的很多，对方不关机，需要马上起草电文发回去。往往是主席在复电上批注“发后送朱、刘、周、任阅”。在电报上，“A”代表急电，三个“A”就代表特急了，而在西柏坡时，电报最急的达到过五个“A”。因此，毛主席常常是几昼夜不休息，有时一个小时就起草两三份电报。

指挥三大战役是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毛主席作为战略家的指挥艺术。战役准备阶段是主席最忙的

时候，了解敌我形势、兵力安排、征求前方指挥员意见，反复研究形成正确的战役部署。下达批示时，电报上仍说明“ 这样是否适当，即告 ”。充分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而当战役打响后，毛主席反而轻松了，放手让前线指挥员大胆果断行事，“ 应因地制宜，一切按情况决定 ”，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要求“ 临机处置一切 ”“ 不要事事请示 ”。一个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总要亲自拟贺电，同时又在思考下一仗的打法。

五十七年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战斗的经历，刘长明至今历历在目，离休后刘长明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他的书中，他希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其伟大的人格，能够永远激励后人。

访问 王鹤滨



毛泽东与王鹤滨在一起

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三次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穿着让他大吃一惊。

我是河北白洋淀人，在我的少年时代，白洋淀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我高小以后，毛主席就派贺龙的部队到了我的家乡。

1943年，我从晋察冀军区到了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过去这所大学叫卫（生学）校，以后变成解放区的医学最高学府。

学校在延安的乔儿沟，它的对面就是鲁迅艺术学院。我们到的时候是6月份，我那时候是一个党支部的委员。开学的时候，主席来讲话。我们席地而坐，有小板凳、草垫子什么的，我就坐在主席身边。主席用的讲台就是一个小桌子，卫士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上面。

主席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打着补丁，上身是一件灰色的旧军装。我当时很吃惊，我虽然知道八路军讲官兵一致，但没有想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穿着竟同战士没什么两样，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主席作报告的语言非常生动，深入浅出，他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枪是可以杀人的。同学们都是小知识分子，都说枪能杀人这个谁不理解呀。

主席说这个真理让我们共产党人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就追述了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不要武装，蒋介石就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革命党人。大家明明知道枪可以杀人，但是大家不知道可以把枪拿起来对付反动派，所以革命遭到失败……

听了报告以后，我们在思想上提高了很多。

说到主席的补丁衣服，我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就此与蒋介石的对比。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的服装不仅挺阔，而且戴着好多勋章。毛主席的服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是皱皱巴巴的，甚至左襟比右襟还长出两寸。但是，两人在气质上、民族意识上则有高下之别。

王鹤滨清楚地记得，他曾经三次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我下山被调到了军委卫生部。当时，科长戴振华把我叫去，我说我想下山，当时也不知道下山干什么，同学们都下山我也想下山。

他说党培养了你这么久，难道你就不愿意服从党的分配，我就定住了。我是党员当然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就到了延安的兰家坪。那是中央门诊部所在地，也是军委卫生部所在地，我在军委卫生部的义诊科当科员，同时在门诊部当眼科医生。

1946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停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三方就在北平搞了军事调整执行部。在这个过程中，延安与外界有了联系的窗口，跟北京、重庆经常有飞机来往。医疗条件也因此有了改善，

主席当时住的是石窑洞，有三间，一间是过厅，进去就是办公室，再往南一拐横着的是他的寝室。这次检查主席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是硬闯去的。因为检查很费时间，怕他不接受。检查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主席很配合。查了以后，主席很关心我，他看我很年轻，就问在哪学的习呀，我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傅连璋副部长就说，他是咱们自己培养的。查了一段时间，因为要查视力、配眼镜，他说哎呀，看个眼睛还这么费劲呀。检查完以后，邓子恢回来了，看到了李讷，他说哎哟我们的公主呀，大了以后谁还敢娶你呀，说了些玩笑话。

我们一看有人找主席，就退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给主席检查眼

睛。

第二次是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撤离之前，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区回来，胡乔木记得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开了一次会，他作记录。

当时毛主席提出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了，这个预见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预见，斯大林他们认为延安无论如何不能撤退，如果延安撤退了共产党就完了。所以当时党的意见也有分歧，任弼时就坚决反对撤退。主席当时说撤退就是为了再回来，第二年就可以回来。

第二年，我们没回延安，却奔北平去了。两年的时间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计，后来我说毛主席怎么预计得这么准呀。

随着延安的撤退，我们就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门诊部，它是中央后委的所在地。那时候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分成前委、中委和后委三部分。前委就是毛主席他们，1948年的3月份，我们到陕北去给毛泽东检查身体。主席当时住在米脂县的凤凰寨。凤凰寨是一个城堡，是马明方家族的一个大院，整个一座山被城墙包围起来，易守难攻。

毛主席刚到那里，在战争中奔波，身体相当疲劳。以后就是第三次给他检查。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的王鹤滨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处报到，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傅连暲给他一封事先写好的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泽东。王鹤滨怎么也想不到，这第四次见到毛泽东，会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到了傅连暲家之后，他把信递给我，并说我是派到主席身边的第三位保健医生。我好奇地问，那第一位、第二位是谁呀？他忽然沉默下来，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他说，第一任我派去的是我

的女婿，反 AB 团的时候，他们俩都被杀了。我听了，心情也非常沉痛。我说，这个政治斗争真是残酷。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第二个保健医生叫周医生，他那时候在一个旅卫生部当部长，现在已经去世了。

第二天，我快到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王振海（值班卫士）就瞄着我了，瞧着我来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赶我。他原来没见过我，要检查。突然间，毛主席跟着一群人，从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从菊香书屋大院走出来了。我一见高兴了，就赶快迎上去。主席一出来，王振海就赶快闪开了，他要给主席一行人让路，也就没法堵我了。他一闪开，我就冲过去了，把信递给主席。毛主席打开信一看就说，欢迎你来啊！我现在去开会，我需要你的时候，通知你。这时候他就和我握了个手。这握手既是会见，又是告别。主席他们就到颐年堂开会去了。

我当时被安排住在丰泽园西边的静谷，是一处园中园。此前我去过一次，觉得印象非常深，因为那里边有不少假山哪、楼台亭榭呀，还有流水呀，风景很优美。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鹤滨被毛泽东请到了自己的卧室。面对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王鹤滨一时间乱了阵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住下来以后，过了几天，主席就派王振海来叫我。我到了主席休息的紫云轩东侧的房间，主席刚起床，还半躺在床上，正拿起一支烟点着了抽了一口。我笑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主席说：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的事情还不太多，我身体还可以，你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书记。我就坐在那儿听着，眼睛看着他。他一看我那么愣着，也不说话。主席肯定还有什么要指示我的，我就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了一声：“哎，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一听这话，觉得非常窘迫，我想主席怎么能说这样的粗话呢。说着，主席又笑了，意思是说是不是

呀，我就勉强地笑了一下，因为我不好回答，他是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这样说话，有点像农村的大人对小孩那样说话。

后来，我理解了这是主席的幽默，也是主席的平易近人之处。我听说，在陕北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战士们就经常吃黑豆，吃黑豆放屁就多。战士们放完屁，常常哈哈大笑。主席听到笑声，坐不住了，就从窑洞里出来了。他说同志们现在很艰苦啊，本来陕北地方很小，加上国民党来了以后搞破坏，所以我们就得吃黑豆。大家要熬过这个艰苦的时期，说到这里，有个人就放了个屁。主席就开玩笑说，谁说不呢？大家都哈哈笑起来了，他又严肃了，跟战士们说，将来我们可以到南京、北京去改善伙食。

我自己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我们跟着主席到北京的郊区去。中午的时候，天气正热，一人一身汗。毛主席穿着一件背心，一件白衬衣，汗湿透了后背。到了一个村子边上，长有一片玉米，玉米长得有一人多高。我们正在树底下乘凉，主席向李银



工作之余，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毛泽东后侧为王鹤滨）

桥招了招手，李银桥就赶紧过去了。他们就沿一条小路，往玉米地钻去了。我说，天这么热，玉米地又不透风，钻进去了要是中暑怎么办哪？我就跟着走。

汪东兴和叶子龙见状，就嘎嘎地笑起来。他们都叫我，王大夫，你进去也想施肥去呀。这时候，我才理解主席跟李银桥招手是要手纸，像这样的事在农村是很普遍的。

后来，王鹤滨兼任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毛泽东总是以没时间看《参考消息》为借口，让王鹤滨来读给他听，以这种方式培养观察认识问题的能力。

主席说，你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请你给我讲一讲。我接受了，看到我感兴趣的国际评论，不管长短，我就拿去，从头到尾念给他听。一开始，主席听完，抽支烟之后他就笑了，也没有说别的。我还高兴呢，这也让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转换一下脑筋。

过了几天，我又看了一篇，也如法炮制。这次，我念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你这样的办法，你应该用我的稿酬订一些报纸，不管是左的右的，你都买来，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产生一种观点了。当你产生观点以后，你再给我讲你的认识。

以后，我当了研究生就体会了，对有些问题有初步的看法你必须先掌握大量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找出适合你或者是你认为要发展的东西。这时，我才明白主席是在培养我观察问题的眼光。

这之前，江青就进来了。主席给我讲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等他讲完了，她说主席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后来，这事情我就没再做下去了。但是，这种教育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除此之外，作为保健医生，还有一些日常工作要做。

主席的睡眠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做记录的，他吃饭的热量与营养也是记录下来的。

不过，记录主席的睡眠时间，并不是那么准确。他卧室的灯灭了，大致是睡了，灯要是老亮着那就是没睡。灯亮灯灭就是给我们一个信号，因为他睡也好没睡也好，你不能老在他屋里跑呀，你不能干扰他嘛。办公室的灯光嘛，就是他一出来就要把灯拉灭。我们就知道是主席从办公室出来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主席是在办公，是在看书，还是在睡眠。

毛泽东经常教导王鹤滨要多回农村去看望父母，要为老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

主席从十四岁到十六岁那一段时间，一直跟着父亲挑粪、种地，他对农民的痛苦有着深切的体会，对农民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到主席身边不久，他就说：“哎呀，你去看过你父母吗？”我说离不开，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医生，照顾他们五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所以离不开。他说我可不要这样的不孝子孙。后来我回河北老家，农村人知道我是医生，又是在主席身边，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很多。我从毕业到进城都是给职工、给农民看病，从不要一分钱。我回到中南海之后，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说：“你可以在你家村子里头办个诊所，一半在我这儿为我服务，一半到农村去给农民服务。”

王鹤滨陪毛泽东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夹菜。

王鹤滨以为自己是尊重主席，却受到了汪东兴的批评。

我在主席那里工作，吃饭时间到了，开始我不知道，值班卫士就通知我：“王秘书，主席叫你去呢。”我得去啊，去了以后，一看

桌子上摆着饭菜和两双筷子。主席从办公室出来，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往这处走，用手一指，叫我坐在他旁边：“别看啊，吃吧。”我也不好意思吃，陪主席吃饭嘛，我也不能随便夹菜。主席就说：“你们青年人喜欢吃肉，你来尝尝这个牛肉片，这个苦瓜我爱吃，你也尝尝。”说着，主席就夹给我，我也不能不要哇，他夹了我就吃。有这么几次之后，主席在丰泽园散步的时候，我和汪东兴走在后面，忽然，汪东兴笑了。我说，有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他说：“你跟主席吃饭，不要老是埋头苦干啊。”我说，什么埋头苦干呀？他就说了：“主席跟我讲，你陪他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光埋头吃，说你是咱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人，不懂得待人接物这一套。”他说你不要老让主席照顾你。我说，哦，我明白了。

实际上，毛泽东对吃几乎没什么要求。

主席吃饭很简单，从来不点菜，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时间长了，厨师和卫士都是根据他爱吃什么，才做什么。主席自己不说，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看他吃剩下的菜，哪个吃的多哪个吃的少。下次再做饭，就多做些他吃得多的菜。但是，一直也没总结出来主席到底喜欢吃什么。后来，有我陪着吃饭，这就更没法分了，这菜到底是主席吃的还是我吃的，就闹不清楚了。

因此，我每次吃完饭以后，还得向厨师和值班卫士说主席吃什么比较多，吃什么比较少，他们就根据我的汇报来做菜。有一次卫士张仙朋来找我，撅着个嘴巴说，王秘书，你这个菜是怎么报的？你说主席喜欢吃这个菜，结果主席一筷子都没动。丁师傅也跟我说，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对呀，你说主席爱吃的东西，主席根本没有吃呀。

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哪个菜离主席近他就吃哪一个，远的他就懒得去夹了。说起来，主席吃饭就像是例行公事。

但有一次主席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跟我说，王医生，你怎么老给我吃这个细大米呀，弄点粗大米不好吗？我说，好啊，粗大米含

的维生素B高。他说，那含的维生素B高，你怎么不给我弄点粗大米来？我说，那我就想办法吧。可我上哪找去呀，商店都没有卖粗大米的。后来，我想起香山一带有不少稻田。我到了香山下的一个村子，拿细米一对一换人家的粗米。就这样搞了一面袋子，几十斤吧。那大米真够粗的，刚把壳去掉，那个胚芽上都留有粗米糠。回来以后，我说主席粗大米搞来了。主席说，那就赶紧做来吃。我拿给食堂师傅，告诉他，这是主席今天想吃的粗米，你就给他做这个粗大米饭。饭蒸熟了，他没端去。厨师给我叫去了，他说王秘书啊，这啥米啊，你看这米蒸完了，汤是汤，米是米的，就像高粱米饭一样，没有黏性，它是一颗一颗分着的。我说，你端上去吧，别担心，这是主席让做嘛。可他怕毁他厨师的声誉，做不好主席不吃，犹犹豫豫地端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主席愿不愿意吃，就等啊，等主席吃下来了，我问他粗大米好吃吗？他说好吃、好吃。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就给他吃粗大米。

在吃的问题上，主席很少提意见。就是提，也是要降低伙食费。自从我当了他的秘书以后，主席老跟我说，我这个伙食消费太多了，能不能把它压低点儿？说实在的，主席的伙食费并不高，已经没有节省的空间。那时，他家里是八口人，八口人平均下来，伙食费跟我们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小灶吃饭，生活不见得比他低。可主席说了，还是得想点办法。我就告诉厨师，做菜的时候，菜不要摘得太细，只要能吃的就不要扔掉。主席自己要降低伙食费，但还让每个月给邓小平家一点补助，因为邓小平家里孩子多，人口多，生活水平低。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层也有困难户。

后来，主席专门问我，伙食费压得怎么样？我说想了好多办法，可压不下去。他说，那你就用力压嘛。他还举例子说，1925年，我在国民党政府里面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共四口人，我、夫人、大儿子还有一个保姆。那时候，官没现在大，钱也没现在多，可是每月还得节省。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派的，车是国家派的，花那么多不应该啊。

我没有办法，就给卫士们开会布置了一下任务，准备把孩子们的水果来个定时定量。第二天，我一到主席那儿去了解情况，江青正在院子里打转，我一进门，她就冲我来了。她说，王医生，我问你，你是医生，吃水果对人有没有好处？我说，当然有好处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吃。我说，不是不给吃，是定量吃。她说，那不行。她这么说，我就不能说话了。所以，江青弄得我没有办法。后来，在总理处工作的一个护士讲，总理知道我离开主席后，说什么事情夫人一插手就不好办了。

一次，王鹤滨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顿饭，小家伙对红红的油炸辣椒格外感兴趣，毛泽东就逗起小家伙来，引出的一段对话却让王鹤滨回味至今……

有一次，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有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偏巧，卫士通知我陪主席吃饭，可这孩子怎么办呢？我出去找人带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哪能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只好抱着他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就问孩子多大岁数了？我儿子就举了四个手指头，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孩子说想。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在托儿所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那油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诱人。主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就说：“啊，你想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这个可好吃了，你想吃吗？”说着，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赶忙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送过来，我又把

孩子搂过来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他这句话的用意。

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他办公，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我想陪陪他，两个人不说话，就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时，我还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可一会儿就迷糊了。主席却一直在工作。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可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用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拧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边上有个沙发，开始我不敢那么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绿色军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闲啊，好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哪，来了以后，给主席找了麻烦，还让主席照顾我。

195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收到了许多来自各个建交国家发来的贺电。

当天，叶子龙拿了一沓子电报。他站在门口说，主席，兄弟国家和其他建交国家的首脑来了电报给你贺寿。主席说，收下，不登报。叶子龙说，如果他们问起来呢？主席说，他们问了，你就说我们国家没这种习惯。

晚上，在紫云轩，主席叫我去吃饭。我进去就发现桌上多了几样主席自己爱吃的菜，还有两个高脚杯，里面盛着葡萄酒。中间的搪瓷盆冒着热气，我一看里面是面条。主席坐下拿起勺子就给我盛，我这时候不是有点进步嘛，赶快站起来，接住饭碗，把他那碗先拿过来给他盛上面条，然后再盛我的。主席端起酒杯说，王医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一块来过我的生日。我说，那好，祝主席长寿，这算我的祝寿词了，我端着酒杯的手因激动有些发颤。主席说，咱们不祝寿，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咱们吃面条可以吧。他又说，人哪，活百岁就不得了了，哪有活一万岁的。我说，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在一百到二百岁。中国古代管一百二十岁叫上寿，一百岁叫中寿，八十岁叫下寿。我说，您应该能活到一百到一百二十岁的。他说是吧，不会活到一万岁吧。主席就是这样幽默。到了第二年，因为我是1953年11月份离开主席那儿的。12月份，主席请我们这些卫士，身边的人员在乒乓球室共同吃了顿面条汤，算是祝贺六十大寿。

毛泽东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喝茶，二是吸烟。作为保健医生，王鹤滨不主张毛泽东过量吸烟。于是，他动员毛泽东的家人搞了一场戒烟运动。

主席吸烟是长久形成的习惯，但我作为保健医生，有责任劝他少抽一些。每当我劝他的时候，主席就说：“我也知道吸烟不好，但是戒不了。”后来，我对主席开玩笑说，要搞一个戒烟运动。主席笑着未置可否。我就把他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动员起来，还有叶子龙的两个女儿艳艳和丽亚。那时候，还有毛远新，还有他的儿媳妇刘思齐。因为他们跟主席可以随便些，就是主席正吸着，他们也可以拔下来。小女儿去拔，像开玩笑一样，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做到。当然，为了减少主席的吸烟量，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把烟剪成两段，或者以花生、糖块代替吸烟。这么做了一段时间之

后，主席就跟我讲，我吸烟实际上并不多，在手上拿的时候多。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一支烟在手，就好像是帮助我思考一样。糖块也好，花生米也好，瓜子也好，起不到这个作用。他说这个话，我觉得确也是肺腑之言。因此，我说这次戒烟运动，我认为是失败了。但护士、卫士们都说主席吸烟是少了，怎么少了呢？就是把一支烟剪成两段，这一点保持下来了。

王鹤滨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很少生病。

建国初期，主席已经六十岁了，身体仍然很好，这与他青年时代的锻炼打下了良好的体质有关。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繁重，主席的体育活动太少。一天到晚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吃饭前看书，晚上睡前也看书，一到办公室就坐下来，体育活动少，人自然就胖起来了。胖起来对人很不利，尤其对老人更不利。所以，要让主席加强活动，他一出来散步，我们就非常高兴。但是毕竟太少，跳舞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有时候他跳的时间很短，半小时就回来了。怎么样增加主席的活动量，也是颇费脑筋的。后来，我们就想请个按摩师来，增加背部的运动。但是，主席不喜欢不熟悉的人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在香港学护理专业的女华侨，回国在医院工作。我们就请她来教卫士们按摩，所以卫士们都学会了按摩。这对主席的帮助很大，每次给主席按摩完，卫士们都是一身汗。有时候，按摩按摩，主席就睡着了，这应该说是对他有帮助的。

1953年11月，王鹤滨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

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也非常感动。就是我想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去学习，主席一连说三次：“我需要你。”我

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主席对你那么好，你就忍心这么走了。最后，主席看我打定了主意，才同意我走的。

他问我要学多长时间，我说从大学学起，他说太长了，我说那我就去做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多，本来是三年，后来呆了三年半。不论你在不在主席身边，他都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丁点不舒服。我在他身边确实没什么忌讳，高兴笑就笑，高兴说就说，并不像外面的人们想得那么严肃、枯燥。

所以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认为是金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主席是个金光四射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虽然也受派别的打击，但是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对主席产生什么别的想法。

访问 高智



毛泽东和高智在中南海颐年堂

对于1945年在一次工作之余 ,高智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半个多世纪之后 ,他的记忆依然清晰。

高智是陕西佳县人。少年时,就听到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传说。在那时,他特别渴望见到毛泽东。17岁时他从绥德师范辍学去了延安,去见毛泽东。由于他的学历高,到了延安后不久,就进入了中央机要科。在那里,他看见了自己做梦都想见到的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总算如愿以偿了。随后,高智就跟着中央机关,随着毛泽东进了北京城。

1952年,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年。这期间,高智亲身体会了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的人格魅力。

我小的时候,不晓得是哪一年的时候,是我父亲吧,还是哪一本书,就讲,现在世界上有两个人最伟大,我就好奇,我说哪两个人最伟大,他说,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就想见到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1945年上半年。那时候我们在延安山上的一个窑洞,就是以后中央宣传部办公的一部分窑洞,我们也到那一部分窑洞办公。搞完电报以后,大家出来在窑洞前面活动活动,休息休息。突然看见中央礼堂的西北门,靠里边的门,毛主席,还有一个女的,个子高高的,还有一个小孩在那里散步呢,那是不太高的一个山坡嘛,一见毛主席就认识。作为我,是第一时间,那当然很高兴。

我就赶快跑到窑洞里边把其他同志叫出来,我说快出来,快看,毛主席在那散步呢。我当时想从山坡下去,再近一点儿,跟毛主席握个手。哎,一想不对,人家正在散步、谈话,一下去就把人

家打扰了，就没下去，就在那目不转睛地看，看主席，一直看到大小三口快出杨家岭了。然后大家回到窑洞里就开始议论了，他们的心情我不太了解，作为我来讲，我是很激动的，因为我想到延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能见到毛主席。

到延安二十多天都没见到毛主席，原来想的见主席是很容易的，一到延安还不是那么回事，只要见到主席就非常激动。回到窑洞里边我就问，那个女的是谁呀，别人说，那个女的就是江青，我说那个小孩是谁呀，别人说那个小孩就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叫李讷，那个时候李讷很小，才四五岁。这是第一次。

1947年，胡宗南率23万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在撤离前，毛泽东要把全国各解放区的战略计划部署完毕，于是一封封带有加急加密字样的电报被发往全国各地，而这些电报几乎都经过了高智的手。

在我所经历的电报当中，可以这么说，几乎全部都是毛主席起草的。特别是解放战争，我几乎没见过其他人的电报，几乎全部是毛主席的电报，当时土改方面的也好，都是毛主席起草的。这个电报呢，它是分等级的，三个A的就是很急的了，四个A的就是更重要的，更急的了，代表电报的保密度跟时间，既保密，而且要以最快的时间发到对方去。转战陕北行军的时候，毛主席就等着机要科是不是把这个最重要的电报发出去了，然后决定我现在离开不离开这个村庄，如果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我们都转移；如果电报还没有发出去，他也等。

在这次延安的撤退行军中，部队多次险些与国民党军队碰头，情况十分紧张，但毛泽东敞胸露怀镇定自若的样子成了部队所有人员的定心丸。

发生了很多次紧张的情况，毛主席从来没有一点紧张，周（恩

来)副主席还紧张,叫毛主席赶快走,毛主席一点不慌张。哪怕是冬天也好,他穿棉衣或单衣,从来都是不扣扣子,都是敞着的,所以我们就想,毛主席的胸怀就是大,他没有一点紧张。我就感觉,跟着毛主席就放心。转战陕北有好几次敌人离我们很近的,但是毛主席估计都准确,该向哪里走就向哪里走,毛主席说过,他动我也动,他不动我也不动,就是你敌人走我也走,你敌人不动我也不动,主席的预测非常准确。

1949年3月,高智跟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了北平城。到了1952年,上级调他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听到这一消息,高智一反常态,犹豫再三。

1952年初,组织上叫我回一次家,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一年多了。组织上就说,你跟你的爱人(我的爱人也是陕北人)回趟家去。那时候我们穿着军衣嘛,就回家,大概是3月份,具体日子记不大清楚。

回到北平没有几天,把我的工作就调动了,调到哪呢,调到中南海去,去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当时,叶子龙说了以后,我说我不敢去。虽然心里边天天想见到主席,但是真正到主席身边去做机要秘书我就不敢去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一个,主席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我担心我听不懂他的话,他听不懂我的话,我说这不是闹着玩的,恐怕出事情,做不好。叶子龙就反复给我做工作,我说我提个建议,我能不能试一试,行了我就一直干下去,不行的话请组织随时调整,最后叶子龙笑一笑,就定了。

第二天,高智就去丰泽园,终于握住了毛泽东的那双大手。

我把手头工作一交代,第二天一上班,就到丰泽园那里去。一

进去，主席卧在床上，穿着睡衣，就是那种类似大毛巾的材料做的睡衣，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烟在那看报纸，盖个毛毡，他不盖棉被，主席就说话，慢慢地，他说，哦，哦了一下，然后就起身了，把报纸一放，就伸出来一只手，他的手比我的手大，我就三步并做两步上去把他的手抓住了，问候了一下：主席你好。然后他就说，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愿意。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好，以后就在我身边，帮助我做一点事，帮助我做一点事好不好？哎呀，这句话我也是非常感动，你是领袖，我是很一般的人，你想让我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还帮助你做一点事情，还带了一个“好不好”。帮助我做一点事情好不好，我说好好好，然后我就告退了。一出主席的卧室，我就在院子里连蹦带跳，我就通过主席的书房跑到我的办公室，身上好像一下就轻松了许多。

到了机要室以后，就做秘书工作，当时我们三四个人，我负责处理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文件，毛刘周朱陈。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来，小平同志在西南，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我就作为秘书，时间也不长，就固定了，固定到毛主席那里给他当机要秘书。

高智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接触，他看到了毛泽东在生活中那平凡的一面。他喜欢毛泽东的幽默，喜欢毛泽东和他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毛泽东几次说高智这个名字厉害。

有一次主席叫几个常委同志去开会，有少奇、总理、陈云、小平，还有总司令，他们几位都到了颐年堂了，我就请主席去了。主席醒来，刚醒来，我说常委几个同志都来了，请主席去，去颐年堂开会。主席就把衣服穿好了，还穿了一件大衣，他书房的中门到颐年堂不是有过道吗，刚出书房门的时候，我在主席后面，主席回过头来叫我的名字：高智！我以为主席有啥事情呢，他说你这个名字

太厉害了，我说那我以后就改一改，政治的治，同志的志，或者植树的植。主席笑了一下，然后就到颐年堂开会，就这么随便说了一下。我并没有真的改名，以后我还是叫高智。但有时候写些东西给别人，我就写政治的治，有时候也写同志的志。我记得陈毅老总有一次给我写了一个条儿，是同志的志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就随便那么说说，也不是主席叫我改名字，他也是那么随便说说。工作之余，主席也说说玩笑，在外出的时候，在火车上，他跟大家说说玩笑或者有趣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发生在工作人员之间的典故，他能感觉到，但不一定听得懂。

工作上也有趣事，有一次我出差去了，有一个人给主席送了一封信，信一放那人就走了，主席就看那个信，把信封一打开没有瓢子，然后主席自己找，在火车上，在床头上找，找不见以后，就把那个送信的人又叫去了，他说这个信没有瓢，光有皮，主席不批评他。这个同志就回到他的车厢里去了，信里边的内容还在台子下边压着呢，结果又给主席送去了，他说主席呀，我光送了信皮，信瓢子还在台子底下压着呢。主席没有因为这事批评他，要给别人还不批评啊。

在1960年生日的这一天，毛泽东显得很疲惫，在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过后又给他们七人写了一封信。

26日那天的下午，我正好就在李银桥他们值班的院子，碰到李银桥，正好李银桥也找我。然后，我们就一块到他那个卫士值班室去，他说他正要找我呢，我说啥事呀，他就讲，主席现在还没睡着觉。因为我们是秘书，所以他有时候要跟我们说一说。主席跟他讲，先吃饭，后睡觉。大概下午的时候，好像时间不长，总理就叫我们准备，看找哪几个人。然后，李银桥告诉主席，什么饭菜。

是六点还是六点半我记不清楚了，反正进去就准备，准备好了

就吃，你时间长了不成，以后主席还要休息嘛。都准备好了以后，我们这些人就先去了，到主席那去了，北面是主席的办公室，右面是江青的办公室，中间空着一个房，一面是江青的，一面是主席的。中间摆个圆桌，我们几个就在那儿等着，我，叶子龙，罗敬贤，李银桥，封耀松，汪东兴，林克，七个人。我们都在那等着，封耀松那天给主席值班嘛，他陪着主席来了。来了以后，等主席坐下，我们才坐下，我坐到主席的右边。然后，开始一起吃饭，饭菜很简单，具体的啥菜我也说不清楚了，笼统地说，反正是素菜多一点儿吧。有一个是荤菜，是啥荤菜我也记不准了。然后，就在那吃饭，主席精神不好，眼睛也小，因为休息不够，好像走路也有点摇晃。一面吃，主席一面谈话，主要谈党的路线这方面的情况，主要讲这些。下面说不说了，我记不太清了，我记得最清的一个是他谈了以后，他就说了后面的话。他是开始笼统地说的，他说一个人不要老在屋子里面，老在屋子里面是要死人的。

这些话我理解的就是好像向那些有职务的人说的，对高层领导们说的，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要经常深入基层，不能老在上面，后面的话好像是对大家说的，对所有人说的，不能老浮在上面。要下去，这些话我理解的就是对任何人说的，包括我嘛。接着他就说，你们谁愿意下去，我也不敢说，主席问了话以后首先盯着叶子龙、汪东兴，这两个人得先说。他们的职务不是高嘛，汪东兴是警卫局的局长，而且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这一年他刚从江西回来。叶子龙是从长征过来的，当时是中央机要科的主任。

短时间内没人说话，我不是在主席的右边吗，我就说，主席我愿意下去。主席说，好。紧接着就说，你们谁还愿意，接着就是这个也说愿意，那个也说愿意，汪东兴没有表态。这以后我想，好像他不应该下去，因为他随江青刚回来的，已经下去过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也就是六七点钟，12月份的时候，天气已相当冷了。天亮了，主席要准备睡觉了。然后把我叫去，就把他那天晚上看的東西都交给我了。并从那个里面拿出一个东西，

就说，你看一看，然后叫汪东兴办。我就在主席的床的旁边站了一会儿，就看了一下。是写给我们七个人的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下，看完了以后我当时就是感动。

主席很关心大家，清楚地写着，叫大家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信的后面还有报告，说是叫大家看一看。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糟糕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吃肉了，还叫送点牛羊肉来，叫护士送来一些药，给我们带上，我当时心里真的挺感激。然后，我说我看完了，我就离开主席的卧室。回到办公室，我就打电话叫汪东兴快来，我说汪东兴，你快来。他来了以后，我是在主席的院子碰到他的。因为他从警卫区过来，我知道他从哨所那边过来呀，我就迎他去了，在主席的院子我就把信交给他了，我说主席叫你办。当时，我还提议这个信每人都给一份，其他人有没有我不知道，给我的那份是照的相，侯波照的大相片，上面就是那封信，估计其他人都有了。

高智平时的工作就是帮主席起草文件，当然也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面有一个报告给主席，是广东的还是河南的记不清了。给主席看了以后，主席那时候好像两三天都没有休息好。那天把我叫去，他说他要休息，你替我代中央起草点东西，等我睡觉起来看，他说了这个以后，因为这文件我看过。他这么交代以后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要理解这个精神。先改了一些笔误，我就开始起草。写好了以后，主席还在睡觉，没起来。那时候，北大的陈伟离我很近，我就把这事告诉陈伟了。我说这是我起草的文件，主席还在休息，你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陈伟看了以后说好啊，他说，再有半年就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再有半年就可以起草山东会议的文件了。他没啥意见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等着，时间不长主席就醒来了。

我就把起草的东西给主席送去，同时跟他说明，我说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你还在休息，我就征求一下陈伟的意见。他说这有两句话，相信群众跟依靠群众哪个放在前边，是相信放在前边还是依靠放在前边，我想来想去说，只有相信才能依靠。我说把相信群众放在前边依靠群众放在后边。当时，主席就说，你不相信咋能依靠啊，我说对的。顺手主席就在我的宣纸上写了一个照办还是照发。

我原来想的是啥呢，是想问问主席有啥意见，没啥意见我回来再抄写一份，弄清爽了再让主席签字。主席一写以后，我说哎呀，咽了嘛，主席说，以后先要写好。

作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就有时候给主席写报告，有时候我就口头跟他汇报。

写出来的文字，我或者放到主席的办公室，或者放到主席的卧室。不知道啥时候，主席有工夫签字，所以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写好放到他回来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他签完字，他就会叫我去，再交代怎么办。

毛泽东常说高智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老老实实的人。

我感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矛盾。至于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主席没有做过我啥工作，这也许是他跟别人说我是好人的原因。

平常的印象里，卫士之间互相有点意见，或者有点误会。主席知道以后就找他们谈话，调解调解。还有江青、护士之间，和卫士之间，有点不愉快的事，或者有时候是江青批评卫士了，或者是批评护士了，护士和卫士有点冤枉，主席有时候和卫士和护士做工作。据我知道主席说过这个话，一个意思，要原谅江青，说你们要为了我。完了回来他就批评江青，这个我印象中比较多一点儿。

1958年以后，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点火，有点脾气呀，这些孩子们，都是年轻娃，受不了委屈的多一点。虽然具体是啥事情

我还说不太清楚,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亲眼看过,也从来不问,但是从一些人的言语流露出来,我就有这种感觉。

有一天晚上我给主席送东西,主席就把我叫住了。我说主席你有啥事情啊,他没说有啥事,他说你说我管多少人,我心想这还不好答嘛,我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归你领导嘛。不,我只管两个半人,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问主席,哪两个半人。你一个,罗光禄一个,他停了,我说那还有半个是谁,江青。他这么说,我也不好问,我就轻轻笑了一下。

我从工作里边有这种感觉,毛主席喜欢老老实实的人。你对问题有啥看法你就是啥看法,你要说你心里的话。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办。不要装懂,不懂就是不懂,我看他喜欢这样的人,你有啥想法,你就说,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可能以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在高智的记忆里,大家都关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工作人员的身体,尽量不耽误他们的休息。

主席交代我们事情大都是口头上的,但有些东西是文字批的,交代我们怎么写信,或者怎么怎么办。有时候叫我们办的时候,就随时叫,不管是二十点或是一点或是两点。通常都是他晚上批好的东西他不叫,他在天亮的时候再叫你。我至少有两三次跟主席说,你写好了以后就叫我,我们就拿去办。主席讲了一句,你们是被动的,我是主动的。他照顾我们还要休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看,因为你们要来我就把这个翻一翻。实际上,他凌晨两三点钟就批给我了。他不叫,天亮了,公鸡啼了,他该休息了,你也差不多休息好了,他再叫你办。

他叫我们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叫卫士通知，值班的李银桥什么的打电话叫我们；一个就是打电铃，我们的电铃声音大，但是声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着墙，也会妨碍主席休息。为了能随时到岗，我们几个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叶子龙同志的一家，我们一家，罗秘书一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让他们高声哭喊。我们教育说，哭的声音太大或者时间太长都会把毛爷爷哭醒。那时候，我们的电铃声音比较大，你就是睡着了也不要紧，主席不打电话的，一打电铃就能叫醒我们。我在他身边工作，他最多打过三次电话，他没有那么痛快打电话。我们一般是把他的电话线拔掉。总台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电话一插上，然后叫我们。总理打电话找主席也很少，总理要找主席通话也是先跟我们打电话。

有时候总理就说，他要给主席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你跟主席说啥呀？”我们就跟主席报告，总理要跟你通话。我就把电话给主席插上，然后他们通完话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碍主席休息，因为他的习惯就是不打电话，就是叫我们请他们来，当面说，不打电话。

过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们就按毛泽东的计划，到农村去搞调查，了解大跃进、大办食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我记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着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装，集合起来，我那天晚上本来要叫主席检阅了，看每个人穿的走的样子，一块照张相，然后去河南去了。我们到河南以后，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食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往中央报告。我当时的看法是，食堂在农忙季节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后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如实汇报。当然，这些问题不光我们来调查，还有中央其他的同志来看。后来，中央就做出决定，食堂制度取消了。

下去一年多，高智他们回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较长的同志，都要离开毛泽东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处，在分别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挽留之意，曾两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尽管高智想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做事一向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来。

从江西回来以后，1962年初，我们先休息了几天。我印象里，好像是3月下旬，到4月初的时候，当时我听到主席身边工作的这些老一点的同志都要走，都要离开，而且有的同志到哪到哪都知道了。叶子龙、李银桥好像要到天津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脑子也转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我也要走啊。当时我就跟我的爱人说这件事，我说主席身边的一些老一点的卫士，叶子龙他们都要走，会不会咱们也走啊。咱们要走的话去哪里呀，就随便那么说。我母亲在我五六岁时就去世了，我父亲解放前也去世了。我说你的父母亲还在西安，你的老人也是我的老人嘛，如果要走咱们就回陕西，回西安，也可以照顾老人。

到了4月19日上午，值班卫士是谁不知道，给我打电话，说主席约我下午三点钟在颐年堂谈话。我爱人已经上班走了，我就抱着我家老三，才四岁多，不到五岁，下午两点五十就赶到颐年堂。

我去颐年堂的时候，主席已经坐在他平常开会的沙发上，一个人在那抽着烟，好像在想啥事呢。我到了颐年堂以后，我就把我那个女孩老三交给服务科了。

主席找我谈话，他们就帮我带着孩子。一见主席，主席叫我坐在他左边的沙发上。我问了一下主席好，然后主席就开始说了，他说高智，今天找你来谈一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下面这些都是原话：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你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你愿意到其他什么地方



1962年4月19日上午，高智带着女儿到中南海颐年堂和毛主席告别

去，也可以谈谈你的意见。

我就讲，我说主席，说心里话，我愿意为你服务一辈子，但是根据你的指示，我们先后到河南、江西这一段以后，我感到你说的是对的，我愿意继续下去。他说如果你要下去，你要走，你想到什么地方去，我说我要回陕西，回我的老家去。他反复地叫我考虑，并说如果你要走，你也不要急着走，等你爱人生了孩子以后再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咋知道我爱人要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星期。

我跟主席说，如果走，还是早走好，这样我到了西安，我就可以一面找人照顾我爱人，一面就可以工作了。谈完这些以后，主

席还交代：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去，还要继续为我做一点事情，你到了西安，把工业、农业、财贸，都搞一搞。

主席说，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他想去陕西看看。

四点多以后，我说主席要没有啥事的话，我是不是就先走，因为主席还有其他的事情。最后，他就讲，咱们两个照个相好不好。我连说好好好，我就把他从沙发上搀扶起来，到颐年堂门口照了个相。

照完了以后，服务科的同志不是也在那服务了吗，就把我的女儿叫过来，我抱着我的女儿，主席又站在院子里跟我交谈起来了。

他问我的女儿叫啥名字，我说叫小梅，他说为什么叫小梅，我说她是最小的，也是女孩，所以叫小梅。正和主席谈着，吕厚民又抓拍了几张，就是我抱着孩子和主席交谈的照片。

我以后回想起来，好像是有这种想法，主席舍不得我。他一开始就说，你工作很好，我很满意，你可以继续在我身边工作。当然主席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他虽然很重感情，但不会强迫我们遵从他的意见。

当时，我想离开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老的都走了，都很熟悉的同志，像李银桥他们都走了。另外一个原因我也体会到了，主席说了，老在上面，光看文件，就是空，到河南、江西以后，很有帮助。

高智离开毛泽东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会写信问候，汇报情况甚至写检讨。当然，他也时不时给毛泽东寄些陕西特产，寄托自己的思念。

从1962年回陕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这中间还写信，写过几次信，寄过几次陕北的小米，中间我也到陆川县工作过。陆川县的苹果是名产嘛，我给主席捎过苹果。我的工作变动，我也给主席写过信。我的学习计划没完成，也给主席写信检讨过。

到了地方以后，复杂的环境让高智无所适从，他开始想念毛泽东，想念那段在梦中都挥之不去的中南海生活。

开始离开主席的第一年没有想，特别是到了陕西以后，各方面工作不知道咋搞，人也不熟悉，慢慢地就越来越想主席，越来越想，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有一天我正在搞农业侦察工作的时候，突然叫我回来，我当时就想，一定是主席来了。结果不是，是要把我的工作从研究所调到县外办。我天天盼，月月盼，盼能有机会到北京去。1965年1月份，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去了，印尼退出联合国了，我们中国跟印度尼西亚就成了同一战壕的了，我们中国派了一个比较大的代表团。大伙都是搞外事的，一起到印尼去了。

我没想出国，人家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去，我是想到北京去。一下火车我就到中南海去了，西门口站岗的还认识我，一见我就叫我进去了。

1965年1月，高智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

那次见了主席，是1965年1月13日。我到了，就先见主席。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主席的卧室去，他躺在床上，也没有起床。我就坐在床边，跟他谈了一会儿。我主要谈我的工作，他还是说要到陕北走一走。我说，这几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我一直盼着你去，我可以陪你。那天好像是星期六，为什么是星期六呢，那天我就没有离开中南海，一天都在那呆着，到了晚上以后，我还陪着他去参加舞会去了。晚会完了以后，我才到华侨饭店去报到的。

那次的分别，高智没有想到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回到陕西后，他日日盼月月盼，希望毛泽东能回延安

沿黄河走一圈，可是他怎么也没有等来。想着当年与毛泽东的约定，高智先后在延安、洛川等条件艰苦的老区做前站工作。随着年龄的增大，晚年的高智又开始想念起毛泽东来。从当年的壮志少年到现在的白发老人，对毛泽东的热爱在高智身上延续了一生。

访问 韩桂馨



毛泽东与李银桥、韩桂馨一家告别

1962年4月，我们要调走了，主席叫我们在办公室坐一坐，让孩子也一起过来。分别时，留下了一张我们一家与主席的珍贵的合影。

1947年初，胡宗南率领国民党20万大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后委行动，毛泽东率领几百人的后委机关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这一年，20岁的李银桥和18岁的韩桂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李银桥担任卫士，韩桂馨是毛泽东的家庭服务员。

对于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而李银桥竟然不愿意，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不同意呢，毛主席就问过这句话。我老伴回答说，我在周副主席那儿工作的时候，提出来希望学习，因为自己文化低，想学习学习再工作。主席说，你在我这工作，我也会放你去学习的，这个顾虑你不要有，你不是因为喜欢周总理那儿，不愿意来我这儿。李银桥忙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答应我了，你不放我走，我就着急了。主席说，行，咱们订个君子协定吧，半年我放你走。半年到期了，主席就和李银桥商量怎么办。正在战争环境下，李银桥一看实在走不了，就又续了半年。这一续就是十五年。后来，李银桥发现毛主席很恋旧，穿的衣服旧了也不丢，用的喝水缸旧了也不丢，人用久了也不愿放走。并且主席大事小事都挺讲信用的，具体用人，他完全有权力决定，大家都能理解。就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以后就不再提半年的约定了。从1947年去主席身边，到1962年离开，前前后后总共十五年。

就是在陕北转战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李银桥学

习

当时，毛主席给李银桥布置了一个任务，写日记。

李银桥觉得这个任务很重，自己的文化底子薄，怕是不容易写出来。但由于是主席布置的任务，他必须完成。李银桥在一个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旅行集”，主席说写错了，不是这个“集”，是“旅行记”，记录的“记”，日记的“记”。

虽然日记的质量自己都感觉不满意，但是李银桥写完就得交上去。主席说，我给你改改。李银桥写的都是大白话，看到的什么写的什么，既无结构，也无修饰。主席一看就乐了。不过，主席就像老师带学生一样耐心的。他鼓励说，优点是如实反映了自己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写什么，不是人为编的，挺好。缺点是写得比较乱。毛主席又说，这样写比华丽的辞藻更受欢迎。你寄回家给父母看看吧，看你的文化有进步了。说完，主席还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李银桥寄回家之后，全村的人都想看，说是毛主席御批，毛主席批改的作业，看了以后都挺受鼓舞的。

主席最后说，学文化，写日记是最好的练习提高。你们经常写，经常记，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高小毕业的韩桂馨，1945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央幼儿园工作。为什么挑选她到毛泽东身边去呢？

我是在李银桥之后到主席那里去的。我记得是在1947年10月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天行军打仗，挺艰苦的。我们这个部队里，有一个最小的战士李讷。李讷那时刚七岁，战争环境里，上学是不可能的。可她又到了上学的年龄，除了生活上需要人照顾，学习上也需要人指导。就是因为这样，我被挑选到主席

身边工作。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找我谈的话。他说现在你的工作需要调动一下，跟你谈谈情况，征得你的同意。一听是到主席身边，我满口答应。他说，你去了以后，主要负责照顾李讷，同时教她识字。

她与李银桥不同，听说自己要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兴奋不已。

我很激动了，我参军的时候十六岁。我家是老解放区，家里参加革命的人员比较多一些。父母告诉我，就说咱们解放区靠了毛泽东主席，托了他老人家的福，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要是参军了以后，看到毛主席了替我们问好，把我们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这样一个嘱咐。我小孩有什么说什么，当时就想我参军了，在军队上也看不见毛主席呀，这么想就这么说了。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去毛主席身边的。多少年的心愿都没实现，忽然这一天，傅连璋部长找我谈话了，说我符合他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我自己呢，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见着大救星了。

可第一次，韩桂馨并没见到毛泽东。

那个时候，几乎天天要打仗，主席可能随时转移，一家人并不住一个村子。李讷一个小孩子和她的妈妈江青，没有随着主席走，她们住在另一个村子里。我是先见了李讷和江青。我和她们也是第一次见面。我的印象是到了那儿之后，推着大院的门就进去了。当时的印象，江青是一个中年妇女，有三十多岁，正在教一个小女孩唱京剧，唱得非常好。在我听来，江青唱京剧水平挺高的，她唱得好，孩子唱得也挺好。我进去，我说报告。江青就停了下来，和我说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李讷虽小，但挺爽快的，怎么想就怎么说：“阿姨，刚才我妈妈说了，你是新来的阿姨。我爸爸可好了，我可

想爸爸了。”这是孩子的话。

不久，我们就行军从后方到了主席这儿的前方。这才见到毛主席。见面后，毛主席先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北省安平县。他说，好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河北省安平县的李银桥哟。我当时是18岁，离开家也是想家，心想有个老乡多好啊。毛主席说，李银桥过来，李银桥走过来。主席介绍说，你们是老乡，握个手吧。我当时和一个男同志握手，脸红了，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年龄也小，也没见过场面，也没有经验。握个手，就这样认识了李银桥。他那时是卫士组的组长，四个卫士，加上我五个，他就管我们五个人。

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胆识和气魄。李银桥和韩桂馨从前只是听说过毛泽东用兵如神，到了他身边工作以后，对毛泽东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那时候，敌人穷追不舍，就跟着我们中央机关。空中是飞机，下边是部队。

有时候追到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没地方去的程度。毛主席呢，善于用兵，善于指挥战斗，走到一个要上山的地方，主席说就这么走，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就说了，这样挺危险的，本来敌人正在追，你再说我们在这儿上山了，那敌人发现了我们人少，他们人多，就会失败的。毛主席说，你越这么写，他们就越害怕。

韩桂馨除了照顾李讷之外，还常常给毛泽东缝补衣服。毛泽东穿着上的简朴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甚至连洗涮的毛巾也只有一条。

毛主席恋旧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考虑节约。衣服破了，不能穿了，就要我补。不是我不愿意补，我作为军人，发军装，主席

作为领袖怎么能领不到新军装呢？我们领导怎么都不给主席领新衣服呢？我一开始不理解，我就去找我们领导。他说，你是新来的，你不知道，主席爱穿旧的，不愿意领新衣服。我说，毛巾一个用来洗脸，一个用来擦脚，也应该是两条，为什么一条毛巾又洗脸又擦脚，多不卫生呀？他给我解释，主席节约惯了。我说，那我找主席说说去，提个建议。我找到主席说，你得有两条毛巾，我们都有两条毛巾，衣服也比你新，你应该再预备一条毛巾。主席说，现在是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我要是再领一条擦脸的毛巾，脚会有意见的。主席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我逗乐了，这是怎么说的呢。

我说，你这样不讲卫生。他说，要这么算账，现在的战争生活很艰苦，我多一块毛巾，每个人都多一块毛巾，集中起来就应该给前方战士，叫他们穿好、吃饱，多打胜仗。我节约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

毛主席就是这样，从每一件细小的地方教育我们。

毛泽东常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要遵守共产党的纪律，不以恶小而为之，哪怕是一颗小枣也不准拿群众的。

这是在陕北行军的时候。行军途中停下来休息，我们就到老百姓的家里、地里去看一看，看见那枣树林很多枣子掉在地上，我就捡了几个枣，给李讷两个，自己留着几个。正在吃着，主席散步来了，发现我们拿着枣吃呢。主席问了，你们怎么拿老乡的枣子呢？我们说，不是我们摘人家树上的，是在地上捡的。他说，如果老乡来了以后，他没看见你是摘的呢还是捡的，人家就会怀疑这枣子是怎么来的。我们刚修改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刚说了就做不到，这样影响不好，不要拿老百姓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接受这个教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李银桥和韩桂馨在毛泽东身边相识、相知，最后成为

相爱的终身伴侣，毛泽东还是他们的月下老人。

不论从工作、学习，还是从生活上说，毛主席都是我们的大恩人。那时候，女同志少男同志多，要想求得一个女朋友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女性比较少的单位工作，李银桥二十多岁了，当然也想找个女朋友。我不是说我有多好，主要是少为贵。我这么说话，可能不恰当，但就是这个意思。打个比喻来说，追求女同志的人数远远要超过女性的人数。有的人跟我介绍过很不错的长征干部，只是比我的年龄大太多，我那时还是小青年，不愿意，想着先把学习搞好了再谈恋爱。别人介绍的有长征的老红军，有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长的也漂亮一些。李银桥看在眼里，心里挺着急的：你看这么多人追，我如果失手了，就得不到她了。

我们是老乡，毛主席又说他好，他对毛主席的工作好，我挺爱的就是这一点。说实话，爱他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对工作认真负责。毛主席常表扬他工作认真负责，他对毛主席照顾确实挺周到的，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心想，找这个男朋友也不错，心里也产生了感情，逐渐发生爱情。虽然窗户纸一捅就破，但是，我们俩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么做的呢？

有一天，李银桥家里来了一封信。父母一直关心儿子的婚事，儿子二十多岁了还没有说下媳妇，在农村就是一个大事了。农村的习惯，早说媳妇早订婚，父母早放心。儿子虽然在外面，老人还是在家里，给李银桥选了个女子。为了打动儿子，父亲在信里把这个女性描写得特别好，把她说得一朵花一样。李银桥收到这样一封信，就挺着急的。他心里已经有人了嘛。家里都给人家说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更害怕让我知道。他想找个人商量啊，他平常就有个习惯，好多事情都要请示主席。这件事情，他又跑去问主席，他

说我喜欢的是小韩呀，可家里又给我说了个媳妇，怎么办呢？他着急得不行，才跟主席说了实话。主席说，那好啊，这封信你叫小韩看看。让小韩帮你写封信，她上过高小，文化程度比较高，看看她表什么态。主席的意思就是让李银桥试探试探我爱不爱他，这样我就不得不表态了，事情就一目了然。李银桥总算醒过闷了，很高兴地找我来了。李银桥说，主席说了，要互相帮助，我这封信你帮助我写吧。你看，家里这个是推掉，还是跟家里的这个女孩结婚，怎么办？我也傻乎乎的，李银桥这么一说，我真的帮他写了，写封信还是可以的嘛，我就帮他写。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李银桥在外面有了女朋友，不用父母操心。这封信，李银桥也拿给主席看了，并说小韩表态了，要回绝人家，我们俩好，不知道用什么词说好。主席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你们自己定，我是没有意见的。

主席把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就谈恋爱了，就大胆了一些。我们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大街上就敢谈恋爱，我们在一起都不敢谈。在工作上，我和李银桥搭档，笨得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过去就好了，两个人就敢说话了。不久，李银桥就写了个报告，申请结婚了。那时的婚礼也比较简单，组织同意，管我们的领导，像伍绍祖的爸爸伍云甫和叶子龙等都签字同意了，写的意见都是“十分赞成，比较合适的一对”什么的。结婚就更简单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北京城，也没举行什么仪式。等到了北京，主席还关心我们，还想着我们两口子没有举行仪式，就说选个日子补办一下，我来吃你们的喜糖。主席这样说了，可刚进城，住在香山，我们一上来以后举行这个，我们开始不同意。李银桥说，一进城就要建国了，不合适。1949年3月23日，我们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出发，3月25日到香山，刚安顿下来就举行结婚仪式确实不合适，我们两个都不同意。耽误主席时间是一个方面，主席忙可以不来。但是国家的大事更重要的，不搞仪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拖了一段时间，因为是主席说的要有仪式，我们就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就是吃了一桌饭。不像现在要吃几桌几十桌。我们又不发钱，发小米，合不了多

少钱。过了几天又照了一次相，结婚就算告一段落。

遗憾的是，我们的结婚仪式，主席没来参加。那天他有会，又要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很多事情缠身，过后，我们给他送了喜糖，他也很高兴。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香山，韩桂馨一直照顾李讷。

本来到香山后，李讷就该上学了，韩桂馨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了。可这个时候，毛岸青、李敏他们又从东北到了香山……

我们的领导跟我谈再接着工作一段时间，我就留了下来。李敏要比李讷大，也不像外面说的，她不会说中文。她会说，只不过有些慢，生活上基本不要我照顾。主要是毛岸青有病，需要我来帮忙照顾一下。有一次，岸青自己洗衣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条件这么好，要用盆，用搓板搓洗。他身上的衣服脏了，我看到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我说该洗一洗了，他就脱下来自己洗。我说你看你洗的方法不太好，我帮你洗吧，我能给你洗好，可岸青回答，我爸爸跟我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叫阿姨给帮忙做。既然主席这么说了，我再去洗也不行。我既感动，也觉得可怜这个孩子。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难以忘记这个事情。

在身边工作人员眼中、心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慈爱的长者，是他们的人生导师。从战争年代就跟随毛泽东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解放后，毛泽东为他们创造了很多学习机会。1950年5月，李银桥要到中直机关的干部补习学校去学习，毛泽东非常支持，亲自给李银桥题词，勉励他好好学习。

毛主席说，因为咱们行军打仗的时候，条件不如中南海这里

好。这里呀，我给你办个学校，办个学校教你们学文化，因为我们身边人员吧，当然有的文化高一些，大部分人的文化都不算高，战争环境没得到机会，这样就给我们最低要达到中学程度这样的学习计划。

我先上的中南海业余学校，以后，领导又派我去上人民大学。我上了四年速成中学，又上了四年大学本科。要不是毛主席，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学习。我得到了学习机会，真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挺感谢主席。

主席对我们学习的关心，例子是很多的。李银桥到了中学程度，想继续学习，又不想离开主席，跟主席有感情了嘛。毛主席说支持你们学习，爱学习是好事情，我支持。毛主席题词，“努力学习，日进有功”，给他鼓励的话，写了两个本，另一个本上还有一句鼓励的话。毛主席题词了，因为有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个条件，李银桥又请其他书记题词，五大书记都题写了鼓励学习的内容，我们保存了几十年，至今，仍像传家宝一样保存着。

毛泽东是个幽默大师，常常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幽默的方式揭示出来。

有一次，毛主席出来散步。李银桥他们想把毛主席客厅里的一个沙发搬出来，客厅里放了很多沙发想搬一个到别处去。主席散步走到这里，就看见他们把沙发堵在了客厅门口，怎么也搬不出来了。主席说话了，你们想想，是先盖的这大楼后进的沙发呢，还是先把沙发放在那儿最后盖的大楼啊？他们不好意思地说，那肯定是先盖的大楼呗，哪能说先把那沙发摆好了再去盖那大楼呢？他就说，这么说，是不可能搬不出来的了。李银桥说，不要等着了，主席说话了，快搬吧。他们就试了几个角度，主席走过去了，这沙发也搬出来了。主席走过去又走回来了，他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办事情就要认真，一认真这事情就办好了。你要不认真，这个事情

就办不好。

主席不批评你，他启发你，让你自觉自愿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让你终身难忘。在主席身边生活，有这些点点滴滴的体会，从生活到衣食住行这些事情很多。

1962年4月，李银桥和韩桂馨调离了中南海。

我们要调走了，主席也同意了。他先跟李银桥说，小韩星期六才回来，星期六的时候，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那个时候，我住校学习。星期六，我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办公室。

主席叫我们在办公室坐一坐，说孩子怎么没来？孩子正在门口等着，我让孩子们也进来和主席合影。要再见了，双方都很激动。可我们不能老激动啊，怕引起主席难过，那就对不起主席了。我们就极力控制自己，分别是很不好受。

毛主席还给我们写了一首《长征》诗做纪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主席的摄影师吕厚民，还为李银桥拍了手拿《长征》诗的照片。

离开中南海，我们调到天津市，在那里上班。主席说了，你们走了以后，到地方上去要谦虚，不要骄傲，夹着尾巴做人。主席就像嘱咐孩子一样嘱咐我们，最后一条是，你们经常来看看我，到北京来看我；我到外地去路过天津，我看你们。“文化大革命”后期，主席途经天津，问到李银桥怎么样，“文化大革命”是打倒了，还是立起来了？没人敢不说实话，回答说他被关起来了，他属于打倒对象。主席说，他在我身边工作过，我了解，他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把他放了，解放他。很快，李银桥就被放了出来，并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当了副主任。孩子上学也不再受刁难，不然子女也得受影响。

1963年，韩桂馨、李银桥回北京时，去中南海看望

了毛泽东。

主席说，河北省发了大水了，你们家里是灾区，我只是帮助你们给你们一千块钱。还分了两个口袋，一个口袋五百。我不知道为什么分两个口袋，也许是怕我们小两口吵架吧。两个口袋李银桥都收起来了。这个事情留下的印象挺深，也是挺感动的。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主席要钱，再说也不是困难到那个程度。可主席的脾气我们也知道，就只好收下了。

以后，他们与主席之间还有多次来往，但多属于公务方面的事情。

河北受水灾主要是海河出了问题，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说海河要根治，不根治，发洪水，受灾的群众伤亡挺大的。林铁想让主席为治理海河题字，他知道李银桥在身边工作过，就让李银桥去找主席。他说，你拿着我这个要求和希望叫主席给题写几个字：一定要根治海河。这个题词，都载入史册了。

李银桥到了中南海，正赶上主席挺忙。汪东兴说，你先住北京饭店，等我通知你，主席有时间了，再到主席办公室去。后来，主席给题了词，还发表在报纸上，引起了治理海河的高潮。

如今，李银桥和韩桂馨都已是古稀老人，那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在这两位老人心中，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却随着岁月的更替而越发清晰。得知主席去世的消息，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当时听广播，听到了这个消息，全家人都挺悲痛，挺难过的。我们一定要到北京来，跟他老人家最后告别。我们带着儿女全

都来了，我们家四个人都来了，因为不能随便到中南海，我们就住在北京饭店，去参加主席的葬礼活动。当时，我们与主席的家人亲戚一块在第一排。

参加完追悼会后，民族饭店来说，“四人帮”里的人要接待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公开。李银桥很认真，他给我说，“四人帮”要接见我们，我们就跑吧。

“四人帮”倒台以后，有的人不了解，说你们到北京参加主席的葬礼，和主席的夫人，就是江青有什么来往，要交代。我们说了实际情况，就算交代完了。

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侯波、徐肖冰和毛泽东的合影。拍摄前，毛泽东对侯波说：“今天呢，你是代表半边天，你站在中间。”

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

侯波、徐肖冰夫妇是著名的摄影家，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为毛主席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传世照片。那么，第一次为主席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呢？

徐肖冰：我知道毛主席，是在国民党画的一幅宣传画上。宣传画上的毛泽东龇牙咧嘴，像个魔鬼。那是1935年，我17岁，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做摄影助理。

就在两年之后，我亲眼见到了宣传画中描述的那个毛泽东。1937年，抗战时期，我随我的老师吴印咸在太原的西北电影制片厂。不久，我参加了八路军，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暂时拍不了电影，只能拍些照片。后来，大概是11月吧，我就被送到了延安，成为八路军后方政治宣传部的一名摄影干事。

1937年11月的一天，组织上对我说，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拍摄，具体情况到延安飞机场就知道了。我赶到飞机场时，人还很少。等了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肖劲光等都到机场来了。飞机一到，我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下来很多人。原来是苏联派专机把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送回延安，陈云也从新疆上了这架飞机，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那时，我刚到延安不久，很多人我也不熟悉，只好想办法让主席的镜头多一点。主席看到我拿着照相机比画来比画去，就招呼大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然后，几位领导人很自然地站在一起。我那时候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装置，也没有广角镜。我只好退得远一些，以主席为中心拍摄。因为不熟悉这些人，我险些把站在边上的王明放在镜头外面。刚拍完一张，突然有个外国

人把我拉到旁边，问：“你是哪里来的？”我虽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但还是回答说：“我是后方政治科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但这人仍然一脸疑问，仿佛我不说清楚就不能拍摄似的。还好，一旁有人认识我，向他证明了我的身份。后来，我才知道这人叫马海德，是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大夫。被他这么一搅和，拍照的机会错过了，因此，没能多拍几个镜头。当我与马海德熟悉之后，就总拿这事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时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怀疑我，这事该你管吗？”每一次，都逗得马海德哈哈大笑。

那么，徐肖冰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呢？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四大队作《论持久战》的报告。我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就带着相机，准备给主席多拍几张照片，可是听讲的人很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根本找不到位置，更看不见主席。没办法，我围着房子绕了一个圈，找了好几个角度，希望既能拍到主席，又能把听众也拍进去。拿着相机选来选去，最后，我只好站到边上，主席的侧面没有听众，那我就到侧面嘛，同时可以将听众纳入镜头。这幅照片，是我到延安后比较近距离拍摄主席的第一张照片。可等到这张照片公开发表，已经是三十年之后的1968年了。摄影界的人士评价说，拍摄领袖人物敢于从侧面取景，而且把听众的反衬也带上了，主席的形象几乎占满了画面，瞬间抓得好，表现的动作也很生动。所以这张照片，被选入纪念主席的各种画册，一发再发。不过，从当时来讲，我没有其他的条件来拍主席正面的照片。如果能拍到正面的照片，我还是会拍主席的正面的。

1939年，延安成立了电影团，徐肖冰他们为毛泽东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影像资料。

那个时候，主席已经住在延安的杨家岭了。我们有机会拍一些

主席活动的画面,但不能够提出来让毛主席这样那样,我不能提怎么拍毛主席的内容。我只能主席有什么活动,我把它拍下来。有时候,叶子龙通知我到毛主席那里拍,但是毛主席很长时间也没有活动,因为我们电影团住的地方和毛主席住的地方大概有三四里地的路程吧。我们住在延安城北面,主席住在杨家岭。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就靠两条腿走路。最近,我整理资料,发现了一些简短的资料。那时候在延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劳模,叫吴满友,主席跟他谈话。还有一次,吴满友给主席送代耕粮。吴满友跟主席讲,你的粮要我来给代耕。吴满友收了粮食以后,把最好的粮食用毛驴送到主席办公的地方。主席把他送出来的时候,边上有一头毛驴,这张照片可能没有发表过。

有一次在吴满友送粮的时候,李讷拉着主席的手指头,大概那时候李讷小,主席就跟李讷讲,你现在只能拉我一个指头,过两年你就可以拉我两个指头了,慢慢地你就可以把我的手都拉起来了。

再有一张画册上有,但是画册上是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看到小孩儿就逗小孩儿,并没有小孩儿逗他的画面。那个时候主席没有休息的时间,有时候就把李讷,把叶子龙的孩子或者别人的孩子抱一抱,逗一逗,算是休息。像卫士长,包括他身边的一些同志,主席工作的时候,都不敢惊动主席,工作时间一长,他们就在外面着急,那么,用什么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呢?他们就想起李讷等孩子。那个时候,李讷也就是三岁左右,叶子龙的孩子比李讷稍微大一点,就让孩子们进去把主席拽出来。我拍的一张把边上的那个孩子裁掉了,实际上,是边上的那个孩子跟主席撒娇,那是叶子龙的孩子,李讷也在边上,这样主席的思想就能松弛一下。所以说,这个照片的背景是很有意思的

要不是主席平常跟孩子玩一会儿,主席就会把所有的时间放在工作上、学习上。

1939年1月,我们要从延安到敌后根据地拍照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见毛主席。但是,毛主席知道电影团要离开延安到前线去

了。在1月28日前几天，主席就通知袁牧之、吴印咸、我，还有一个是负责领导电影团的老干部，叫李肃，我们四个人到主席那里去的。

我们是在11点以前，到主席那里去的。主席有一段讲话是很有意思的，主席知道我们是搞电影工作的，他问我们生活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问得像家人谈话似的，非常随便。但是，主席的话里的内容非常深刻，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毛主席问我们学习，毛主席说《资本论》你们是看不懂的。但是，你们是要学的。你们现在就应该好好地学习。有延安出版的大众知识，主席认为写得非常深刻，他就讲你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大众知识。他知道我们搞电影的，他说，你们手上有器材，我们共产党是很穷的，哪里有钱来买这些器材呀，你们到时候片子都用完了。到那个时候，你们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当时，主席讲，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要解放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你们的工作、任务就很重很重了，你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1939年，毛主席就预见到我们的抗战一定胜利，全中国一定能够解放，将来，就指我们搞电影的，你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

徐肖冰拍的一张照片，怎么会有两个版本呢？

我拍摄过许多有关主席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还有着特殊的经历。这张照片就是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我拍的毛主席与朱老总的合影。朱老总当时是八路军总司令，头上戴着的是国民党军帽。但有一段时期，这张照片在发表的时候被修去了帽徽。所以，这幅照片就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1988年，日本邀请我们夫妇去日本举办摄影展览，展出的就是原版照片。《朝日新闻》特地就此发表文章，称赞我们党尊重历史的原貌。我觉得，照片记录的就是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

徐肖冰曾在一张发虚的照片里，与毛泽东合过影。

1949年3月25日，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发，去西苑机场拍摄欢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进京的场面。机场上已经有不少人，打着旗子，扯着标语，有“热烈欢迎毛主席”等。

等了很长时间，我们总算看到一排苏联产的吉普车朝西苑机场开过来。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任弼时同志坐在车上不断向人群挥手。车停下来后，主席他们从车上下来，与前来迎接的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地拍摄，三脚架

不时地被挤歪。这时，我耳旁突然响起毛主席的声音：“徐肖冰，你也来啦？”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自从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告别主席，已经有4年了，主席记忆力居然那么好，开口便能叫出我的名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主席就把我介绍给周围的民主党派的代表，并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摄影师，是吃延安的小米稀饭长大的。”他口气里的



七大期间，徐肖冰为毛泽东和朱德拍摄的那张特别的照片

自豪，一直激励着我。

主席正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几位同行就过来了，他们想与主席一起合影，主席欣然同意了。这张照片冲出来后，我发现有点虚。可能是拍摄的同志心情激动，光圈没有调好，也可能是拍摄时手有抖动。

徐肖冰、侯波夫妇第一次和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很长时间却不愿意挂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徐肖冰：那天，我都没有想到，到香山会和主席照个合影什么的，脑子里没想这回事。主席的秘书叶子龙通知说，有照片要拍，我就跟侯波说我们一起去吧。

侯波：在延安的时候，我都是在学校里面，开大会离主席很远，从来没有像和他一起拍照这么近，那是我第一次离主席那么近。主席把客人送走了以后，就叫我们过去，在他住的双清别墅的院子里面有一个亭子，主席说你们来一块跟我坐一坐。

徐肖冰：后来，我们就坐在亭子边上说起来了，主席问侯波问得比较多一点。

侯波：主席就问我，你的家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山西人。他说山西什么地方，我说解县，他说关云长是你的老乡。你们那里不错，陈赓同志在你们那里打了几个漂亮仗。他又问我你到延安做什么？我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到延安，很小，组织上送我去上学。主席说：“哦，你是吃陕北小米长大的，你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好好为人民服务，主席的这句话一直牢牢记在我心上。

后来，我们就跟主席一起照相，有很多工作人员跟主席照相，我取好三个景致，主席就跟我们照相了。照相的时候，我们请主席站在中间，主席就说了，今天呢，你是代表半边天，你站在中间。我就站在中间照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拿回去以后，长时间没有挂过。因为我在主席那儿工作，我怕大家看了以后，说我要显示自己，我不愿意叫人家说闲

话，我就把它收起来。另外就是那次照相了以后，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站在中间主席站在边上，这张像挂出来后，好多人就说我了，我总是要解释一遍当时的情况，所以就不愿意挂了。

1949年6月，侯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边的第一位摄影师。当时，侯波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的照像科科长，到了中南海以后，仍是摄影科科长，其实这个科只有她一个人。时间久了，毛泽东问：“你怎么叫个‘侯科长’？不要当那个‘长’。”从1949年到1961年这12年的时间里，她用镜头记录了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侯波最满意的照片又是哪一张呢？

侯波：说实话，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最满意的照片是哪张？”“你最得意的照片是哪张？”“你最喜欢的照片是哪张？”我觉着都是一个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开国大典那一张。去年我们两个带着照片去法国，以“伟人毛泽东”为主题展出。法国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就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开国大典。这是我一贯的回答，因为这张照片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事件。中国在此之前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中国人民解放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经典时刻，是永载史册的大事，我的镜头能记录下这个时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大事。

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但是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又没有广角镜，离得近，拍摄技术不是很好。如果像现在有广角镜，有升降机，肯定会拍得更好。庆幸的是，这张见证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照片，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有一种自豪感，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

会。它虽然有遗憾，但意义很深远。

当时，为了安全，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摄影师中唯一的女性。周总理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左侧上来时，我就开拍了，一边拍一边往后退，拍完一卷就赶紧换卷，生怕多耽搁时间，漏过什么重要镜头。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天安门那么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那天主席讲话那段是最重要的，我的任务也在那里，一定要把这个照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毛主席讲话了。毛主席他们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很近，我想拍到他们的正面，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外伸，要把更多的大人物拍进去，背景要宏大庄严，身体就要伸到护栏外面。在开国典礼主持人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毛主席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我的快门立即按了下去。就在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点掉下去了，幸亏旁边有人拉着我的衣服。我还以为是工作人员，起来一看是总理。细心的人一定能看出来，这张照片里没有总理。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对我们的身教言教，真是没法比，我想起这些来总是很心酸。

总理说要小心要小心，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心的人。那天我要是真的掉下去了的话，就出大丑了。我老记着这个事。后来，再上天安门，我们抢镜头的时候，陈云、彭老总都说小心小心啊，掉下去就吃不了饭了啊。首长们都很关心我们，所以工作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

侯波、徐肖冰给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多达一千多张。在这些照片中，毛泽东又喜欢哪一张呢？

侯波：1954年12月在杭州刘庄，正赶上主席的生日。为祝贺主席的生日，我们一起吃了面条。主席没有吃，他刚起床，在外面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

走。那天杭州下了雪，这可是多年不遇的景象，而且下的是鹅毛大雪。第二天，天晴了，南方的雪化得很快。主席要坐车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途中，主席下来坐在了稻田边上。雪后的早晨，天气寒冷，大家就催主席赶快上车去，怕他感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个照片后面没有背景，浙江有好多村子，都说是在他们那儿，我也不知道确切是哪的。有人说主席是去访问农家，那也不可能，因为稻田里的雪都在化了，去不了，下雪也没有人出来。

侯波作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几乎见证了毛泽东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活动。其间，毛泽东提出要侯波注意一个问题

从建国初开始，拍摄主席的活动就是我的工作了。基本上，他出去我就跟着，甚至他出来散步，有时候我也会跟着。有一次，主席说，你不要把照相机老对着我，要对着群众，我和群众在一起的你照，我不说你，不要老照我一个人。

以后，我就很注意了，尽量不打扰他。我的镜头更多的时候是拍主席和群众在一起。

比如，主席和新疆的库尔班大叔握手。1959年，毛主席在紫光阁接见亚非拉青年参观团。外国青年看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知道要照合影，都往主席跟前挤。当时，总理就站在我边上，正在给他们排队，招呼他们怎么站，站几列，因为一排站不下嘛。可他们往主席跟前挤，有的趴到主席肩膀上。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那次，本来决定很多领导人都在一块儿，好拍电影。后来，别的领导人都到另一边去了，主席要走过去，路却走不了了，群众都围上来了。结果，只好临时决定主席在一个地方劳动，所以电影也没有拍成。很多人连照片都没有拍成，我一直跟着他，只有我一个拍到了主席劳动、休息以及和群众在一起的镜头。

1957、1958年这两年，主席出去的时候很多，工作起来就很

艰苦。我估计一年只能在家里待四个月，八个月都在下边。

在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相机都是老式的，有许多配套设备要随身携带，比如背个充电的大电瓶。另外，还有一个包，里面要装胶卷。他们都帮我忙，帮我背东西。

我有一个箱子，随时都准备好放在身边。因为主席到哪去都是随时就走，来不及的话，他就通过值班室通知一起去的人。那时候，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负担，也根本顾不上家和两个孩子，都是同志们帮着照顾。我即使在办公室，也是坐在电话机旁边，随叫随到。特别是会见客人，有时候是临时决定的，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就坏了，我都是准备好好的，拿起箱子就可以走，到了地方马上就工作。

主席身边的同志对我都很帮助，我只是按按快门，拍这么多照片，可以说都是大家的功劳。

可为了拍主席与群众在一起的镜头，侯波却出了一回洋相。

那是在长沙，主席到湘江去游泳之后，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休息。我一边对镜头一边往后退，我没有注意身后，想不到一下就掉到粪坑里面去了。南方的那种粪坑都在河边上，在户边，上面有块板，水正好把粪坑都淹住了。还好很浅，我就赶快跳出来，我把相机举起来跳了出来，边上的人扶了我一下，我就上去稍微洗一洗，继续拍照，拍到主席逗小孩儿。这次经历虽然尴尬，但也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还是很值得的。

我出的这个洋相，主席并不知道，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后来还是有人告诉了他。

毛泽东让侯波多拍群众，群众则给侯波提供了很多有利于拍摄的条件。



侯波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

主席让我拍好群众，可群众热爱主席。为拍好主席，有些人就把我举起来，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比如有一次，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拍照，学生的那个热情劲真受不了，为看到主席，大家挤呀挤呀，回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袜子都没了。我还出过一次洋相。那是主席视察到河南，棉花堆得很高，主席很高兴。我就想上到棉花垛上，给主席拍一张周围都是棉花，主席喜气洋洋的照片。结果上去以后，我就陷进去了，上得越高陷得越快，棉花很松软，居然将我埋住了。主席发现了，就说你看看她。几个人就七手八脚上去把我抓出来了，满头满身都是棉花。主席幽默地说，哟，这不是个雪

人吗？主席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幽默的，会跟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在火车上，他在埋头看书，我坐在边上，就悄悄地拿起照相机对着他。他看到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老用一只眼睛看我？我说，两个眼睛放不下，那是到保定去的时候。

1957年，侯波跟着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问她为什么不喜欢莫斯科？

当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就跟着他，他一看我跟着他，就问我，你这次到莫斯科去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不喜欢他们。毛主席就说，哎，你怎么不喜欢呀？我说，他们不够朋友。主席就笑了。我说，我照一张照片他们还派一个人跟着我，他们不让我拍，在中南海我在哪都可以拍，在那人家就限制了。在红场里，咱们去了好多代表团，彭老总的军事代表团等，他们在那个观礼台上，我就想去给他们照相。他们的警卫员就瞪着我，不让我动，我就没有办法了，就跟那边招手，那边才叫一个苏联人过来把我领过去。即使这样，他们仍有一个人看着我，我又不是特务，我可是客人哪！他们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国家对他们很客气的。

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主席就笑了。他说在人家国家就要听人家的。然后，主席说，报纸发表了一张照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张照片很好，我很喜欢。

侯波拍摄主席坐飞机的照片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1957年以后，中央就不让主席坐飞机了。因为咱们有一个代表团去苏联，飞机遇难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主席就不坐飞机了。后来，到哪里去，主席都是坐火车。因为坐火车他愿到哪停就停下来，如果坐飞机的话，有些地方没有飞机场，就不方便。再一

个就是，主席不愿意打扰地方，他都是住在火车上面，视察完了，可以在火车上吃饭，晚上就住在火车上面。

我在飞机上给主席拍过一张照片。大家都说，你应该在主席办公的时候给他拍一张照片。我总找不到这个机会，又不愿意打扰他。主席在办公的时候，什么人都不能进去，只有值班的同志和机要人员送电报什么的可以进去。那是从莫斯科回北京的飞机上，去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飞机上。回来的时候在一个飞机上，头等舱有个主席休息的地方，但他就把这个地方让给副团长宋庆龄了。

侯波不会游泳，却拍下了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的照片

我当时就在一条小船上，从照片看，江水似乎很平，其实流速很快。那个小船是准备给主席休息的，等我上了小船，主席他们已经游得很远了。我就叫老艄公，快划，快划。别人都知道我不会游泳，还都跟我打招呼，我根本顾不上回应，害怕自己掉进江里。后来，我们赶上去了。主席上岸以后，一看我的衣服全是湿的，就问我，湿都湿了，你为什么不下水呀？我说，我不会游泳，我要下水的话就沉底了。主席跟我讲，你多喝几口长江的水你就会了。

在侯波的记忆里，毛泽东亲切自然，就像是自家的老人

1961年3月，我要离开主席到新华社去工作了，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我要到新华社去了。主席说，什么时候走呀？我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我先来看看主席。主席说，今天就要走了，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好多年，给领导同志们都拍了好多

照片，你有功劳。我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谢谢主席对我的鼓励。主席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我走到门口，给主席敬了个礼，主席眼圈就红了。

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

访问 马武义



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左二为马武义）

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欢声雷动。可在这个时刻，除了我，又有谁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旧毛衣裤登上了张灯结彩的城楼？

马武义出生在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5年,15岁的马武义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四年之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马武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在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亲手帮毛泽东整理衣装,送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帮着主席准备行装。主席要参加这么重大的国事活动,仪表上当然要讲究讲究,好配合庄严的仪式。吃过午饭,我趁主席午休的时间,先把主席的皮鞋擦亮,再把主席的绿呢子套装熨平烫好。主席的皮鞋是到香山后刚做的,绿呢子套装还是用延安时期就珍藏的旧呢料,专为开国大典裁制而成的。到了下午一点钟,我准时把主席叫起来。十月初,北京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主席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把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那衣服胳膊肘处的两个大补丁非常惹眼。那是在西柏坡的时候,胳膊肘处磨出了两个窟窿,韩桂馨同志用旧袜子头补上的。我拿来毛裤,要帮主席穿上。不知是不是因为紧张呢,主席两条腿往裤腿里使劲一蹬,脚就从膝盖处的大窟窿里穿过去了。实际上,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发现了膝盖处的两个窟窿,可窟窿太大,韩桂馨没找到那么大的袜子头,就没有补。毛主席就这样穿上了,他还问我怎么样。我当时就乐了,我说主席你的腿从那两个窟窿里跑出来了。主席也乐了,是吗?我说,你坐在那里看不见,毛裤的下半截都吊在腿后边了。主席坐着不动,好像是说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说,主席这样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门。他说上不

了，不能上天安门？我说不能，他说那好办，推倒重来。

有谁知道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城楼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庄重朴实的绿呢子套装里面，穿着一套打了两个补丁，露出一双膝盖的毛衣毛裤，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

我陪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云集了四十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是党内党外的高层人物。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欢声雷动。可是在这个时刻，除了我，又有谁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旧毛衣裤登上了张灯结彩的城楼？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心里说不清是酸楚，还是敬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个事呀，除了毛主席，不会有第二个这么做。我估计不会有第二个人，穿着这么一套破衣服上天安门，面对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可能与一条特殊的家规有关。

我1948年开始跟随毛泽东，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主席住进香山双清别墅以后，李银桥同志就从行政处为主席领了一个新的洗脸盆。因为主席原来的洗脸盆太破旧了，盆沿那一圈的搪瓷全部脱落，盆底也有多处脱瓷，早已破破烂烂了，换个新的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李银桥就给主席领了个新脸盆，可主席洗脸的时候发现，不是他原来那个洗脸盆了。 he就把李银桥找回去了。主席问李银桥，你们把我那个原来的洗脸盆弄哪儿去了？李银桥实话实说，扔了。主席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以后你们再给我换东西，必须得经过我同意，我没有同意，你们不许随便给我换东西。这件事以后，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就形成了。

有了这条家规，工作人员又能做什么呢？

主席进入北京以后，经常接见一些党内外人士。党内人士对主

席的一些习惯大多表示理解，可一些民主人士就不能理解。虽说穿衣戴帽个人爱好，那是指个人活动，但主席的活动代表着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于是，有人给主席提出来，主席，您再穿那个破布鞋有点不合礼仪，我们给您做双皮鞋吧。主席同意了，就做了一双皮鞋。可这双皮鞋，平时主席并不穿，仍穿他的布鞋，只有在重大活动的时候、有重要会议呀或者是重大的国事活动啊，或者接见外宾哪，他才穿上这双皮鞋。主席到莫斯科去，就是穿的这双皮鞋。这双皮鞋穿到什么时候呢，当我1958年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十多年过去了，他穿的仍然是这双皮鞋。

从1948年到1958年，马武义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留在马武义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在我的印象中，主席最爱吃肘子。但是保健医生建议说不要吃那么多，因此，一般来说，一周给主席吃一次。当然一个肘子，主席一次并不能吃完，他就说给我留着。不光是肘子，别的菜剩得多了，他都告诉我们，这个给我留着，下次再给我拿来。可一个是医生不让多吃，再一个是苏联医疗专家绝对不准我们给主席吃剩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到主席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他忘了，我们就谁也不提这件事，让它不了了之。如果他问起来呢，我们就说我们给吃了。他一听说是我们吃了，他就不说话了，也不吭声了。

主席爱抽烟，按他自己的话说，吸烟比吃饭还重要。北京医院的周泽昭院长，最反对主席抽烟。有时候，主席出去散步，或者爬山，只要坐下来休息，就要抽支烟。周泽昭就在边上劝他，你别抽烟了吧，少抽点儿吧。劝他几次，他也不说话，照抽不误。有一次，周院长多说了几句，他有点不耐烦了，有一点火了。他说，你看列宁、斯大林他俩谁抽烟呢？周院长说斯大林抽烟。那他俩谁先死

了，就是论年龄谁死得早？周院长忽然觉得上当了，但还是嗫嚅着回答，那，那是列宁死得早啊。主席顿时轻松起来，斯大林他抽烟，他怎么死得晚呢？

主席以他的机智和诙谐，挡住了医生的建议。但主席抽烟非常节省，那个烟抽得都拿不住了，他仍舍不得丢，还要塞在烟嘴儿上接着抽，直到抽个一干二净，火熄烟灭。用北京人的话说哪，主席抽烟有点抠门儿。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高岗点燃一支烟来抽，只抽了几口，就顺手扔到地下了。主席不言不语，十分自然地伸手捡了起来。主席的举动把高岗弄得呀，真是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南京解放的捷报传来的那一天，毛泽东异常兴奋。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是怎么庆祝的呢？

我记得南京解放就在春节后，4月25日，主席起床后，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类似沙盘的地形图，边上的一个小盘子里，放着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小三角旗。我们每解放一个城市，也就是说解放一个大城市，一个中等城市，都要把标示蒋介石统治的小黄旗拔下，换上标示已被解放军占领的小红旗。大多数小黄旗都是被拔下来的，小红旗的数量越来越多。南京解放这一天呢，主席亲自拔下了插在南京名下的小黄旗，再插上一面小红旗。

主席那天的高兴劲儿，人们可以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首诗词里体会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来说，体会应该更直接，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统治的彻底结束，平时我们和主席照相，都要找机会才行。可那天主席兴奋地主动招呼身边的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和毛泽东唯一的一张正规合影。多少年来，我一直细心珍藏着。

照完相，为了庆祝，我们就给主席安排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也就是多做了几个菜。正赶上这么个好日子，当然要庆祝一下。我们把菜摆好，我说请主席吃饭吧。主席坐在饭桌跟前，我们还打开

了一瓶准备好的青岛产白兰地，给主席倒了一杯。主席端起来就喝完了。放下杯子，主席就把菜拿过来，弄了个大饭盒，把各种菜夹满一饭盒子，把剩下的酒盖上。主席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咱们共同庆祝南京解放，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你把酒和菜拿去，和在值班室值班的警卫员，一起庆祝一下，去吧。我端到值班室，我说王振海啊，主席叫咱们共同庆祝南京解放，还有一瓶酒。王振海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要在平时，值班哪能喝酒。我把一瓶酒直接倒进一个大铜碗里，就这么一人一口地喝起来。那时候也不知道白兰地会那么厉害。喝完了以后，王振海就该换班了。他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快要站不住了。我说坏了，刚走到大门口那儿，有个木头制的哨位，他刚要往上迈，脚却没抬起来，随即趴倒在那儿了。

马武义和毛泽东在一起感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所承受的悲情和伤感。马武义见过毛泽东两次流泪，第一次是在解放北平批斗南霸天时，毛泽东为控诉者的悲剧潸然泪下。而另一次，又是因为什么呢？

1954年秋天了，庄稼已经收完了。主席从杭州回北京途中，专列在德州停车加水。主席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主席问，小马，你的老家是德州吧？我回答是。主席说，离北京不远了，你也可以退身了。我一听主席要给我放假了，心中暗自高兴。主席接着说，我给你放二十天假怎样？我说听主席的。你可以回乡探亲，但同时，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你去完成。今年的秋收结束了，你回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主席说着，就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白纸，给我写了一个提纲，就是调查合作社的提纲。

提纲要求我在二十天的时间里，要调查十个农业合作社。主席指着提纲说，你可以在家休息一天，去调查一个合作社，再休息一天，调查另一个合作社。实际上，我回到家呢，一天都没休息。一个是时间并不充裕，另一个就是，主席叫我去搞调查，我哪敢在家里休息。

我到农民家，就像串门一样，并没有选择什么对象，随便走进去，跟人家要了一个平常吃的窝窝头。这个窝窝头是什么做的呢？就是那个高粱，还没有脱皮的高粱磨成的面，又硬又黑。放到手里，能感觉粗糙无比，如果吃下去，肯定划喉咙。我说这个玩意儿啊，很能代表农民的生活状况，因为有相当多的农民还在吃这个东西。

调查结束，我想应该带点土特产之类的，给主席捎回去。我就弄了两只野兔，准备给主席尝尝鲜。那个时候很容易打到兔子，现在只怕连野兔的毫毛都见不着了。当然，我也没有忘记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为此，我还带上了一个物证——窝窝头。

我回来以后呢，开始值班。有一天，我看主席不太忙，就到了厨房叫大师傅，把我带回的野兔做给主席吃。这一天，我就趁主席吃饭的时候，坐在旁边给他汇报合作社的情况。主席那天的胃口很好，看起来野兔肉很对他的胃口。这个时候，主席就问我，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啊？我事先已经把那个窝窝头装在衣兜里了。主席一问，我就从兜里摸出那个糠窝窝头来递给他。他拿起来看了看，摸了摸，脸色即刻严峻起来，筷子早已放下。此时，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主席沉默着，掰下一块儿就搁到嘴里了。我根本来不及劝阻。主席的牙齿不太好，他根本就咬不动那块窝窝头。再说，我带回来已经在兜里装了十多天了，可别给吃出问题来了。我一想，这可怎么好，怎么能让主席吃这样的窝窝头。我说主席不行，你不能吃这个，太硬，你咬不动。

可是窝头的粗糙难咽，已经堵在了他的心里，堵得他难受至极，堵得他流下了眼泪。主席得知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他没有掉眼泪；面对农民吃的这种糠窝窝头，他流泪了。

三十年后，马武义再次回到丰泽园，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了。

1958年，我离开主席身边调到东北去工作了。三十年以后，我

又回到曾经工作的丰泽园，这个时候，距主席1976年逝世整整十二年。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十二年就是一个轮回。虽然记忆长留心间，但过往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来。我站在秋日的菊香书屋前，主席吃窝窝头的那张方桌还摆在原处，两把椅子也还在，就和我向主席汇报时一模一样，碗筷啥的，也在那上边摆着呢。秋风萧瑟，落叶缤纷；庭院静寂，人去屋空，无限伤感涌上心头。

访问 张木奇



张木奇与李讷一家合影（左一为张木奇）

我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既幸运又幸福，尽管那时候工作很紧张，纪律也很严，也不能说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为主席服务，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1948年3月，张木奇在河北曲阳老家参军，入伍到了石家庄的华北步军兵团。1949年，中共中央从华北部队抽调了三十六名战士到中央警卫团警卫连工作。张木奇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一年他只有十六岁。进了中南海之后，他问排长能不能到春藕斋去看毛泽东跳舞？

我记得是1949年8月24日，那个时候，我虽然能看见主席，可总是隔得较远，看不清楚。那天晚上，我听到舞曲响起来，就问我们排长杜福同志：“排长，能不能让我看看主席跳舞？”他回答说：“小声点，别惊动别人，我再给你看看去。”然后，他跑出去一趟，回来就叫我去：“小鬼，慢一点，慢一点。”我就去了，高兴得不得了。去了以后，排长已经通过现场值班的同志把帘子拉开了一道缝，我就在那看。哎哟，这就是主席呀，和一个女伴舞着就过来了。那个女同志梳着两条长辫子，穿的是列宁装，主席穿的是黄呢子中山装。主席一面跳，还不断地跟舞伴说两句。主席跳的那个舞步很稳重，那个形象呀，很魁梧，很大方，那个面孔又很慈祥。我没参军，还在老家村子里的时候，就是1943年前后的春天，有一次我跟我爹、我弟弟，我们推碾子，压苞米，也叫棒子，碾那个玉米面。那时候，我就想着毛主席，在那些书本上和报刊上不是有一些主席的头像嘛，我就是在脑子里有那么一个大概的印象，就在碾房的后墙上画了一个主席的像。画了以后，当时我还很满意的，眼睛很大，很明亮。嘴唇呢，画得也很厚道。老百姓就讲究嘛，厚嘴唇的人就是比较厚道的，当时，我觉得画得还是很像的，符合自

己心里想象的那个毛主席。可这时候一对比，毛主席那么生动，红光满面的，个儿又那么高，有一米八吧，那么魁梧，唉呀，我的那个感受，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回去以后，我真的就睡不着了。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在玉泉山，开会就下山去中南海的居仁堂，开完会再回来。张木奇那时是连里的一名通讯员，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打泉水。一天下午，张木奇第一次直接面对毛泽东。

主席开完会，回到玉泉山，和江青、警卫科长李树槐、卫士孙勇几个人正沿着鹅卵石山道向主峰玉泉塔攀登。我在山腰，拿着水壶，打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我看到主席，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他的上额很光滑，有一种反光。他身材那么魁梧，穿着白衬衣。主席一见了我以后，马上就向我走来了。可我光顾着激动了，只是直直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我才十七岁嘛。主席问我：“小鬼呀，你要去做什么？”说着，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握手了。我愣头愣脑地上去，两只手就把主席的手给握住了，他那个手特别大，很软乎的。“叫什么名字啊？”又问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李树槐同志，他是警卫科长，就说：“小张，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这才说，俺叫张木奇。“哦，张木奇，哪几个字？写一写。”我就站着，主席把左手伸到了我跟前，让我写在他的手心里边，我的手当时也可能有点颤抖。我写一个，主席就说：“弓长张，树木的木。”我又看看主席，写那个奇字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奇怪的奇吗？我赶快点头认可，就说是这几个字。这个时候，主席就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说，俺今年十七岁了。“十七岁嘛，还是个娃娃，你讨没讨老婆？”我对讨老婆这个说法不是很清楚，我们家乡河北曲阳说娶媳妇。李树槐同志马上就给我解释：“主席问你结婚了没有？”一问到结婚这个题目，我年龄还小嘛，就感到很害羞，低着头跟主

席说：“俺还没有娶媳妇呢。”一听我用曲阳的乡土乡音说没娶媳妇，主席、江青和孙勇，还有李树槐同志，他们都乐了。他们一乐，我也就不那么紧张了，也乐了。

然后，主席就继续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哪？我就说，家里有俺爹、俺娘，还有俺兄弟，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我说的时候，主席就捏着手指头给我数，我说一个，他就伸一个指头，他说加上你这个解放军，就是一个四口之家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说的意思了。江青还插进来问了一句，看你挺老实、挺聪明的，是个机灵鬼，哪个地方的人呢？我说河北曲阳。主席又说，曲阳，我们从那里走过嘛。我估计是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路过，但我没敢问。主席好像意犹未尽，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去呀？”我说给连里打泉水，他点点头，再次和我握手，还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好啦，再见！”我忙说再见再见，心情已经放松下来了。

1951年元月上旬，中南海成立了主席的内卫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卫排，总共二十个人左右。可随着当时的需要，这个警卫排很快就撤销了。我们警卫连的一班加上警卫班的几个同志，十二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内卫班。

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都省吃俭用支援前线，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

当时，主席住的丰泽园，菊香书屋那一块，是一个四合院，四面房子前面各安了一盏灯，他说我们要增产节约，把这四个灯都去掉，在院子里安一盏灯就行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约三盏灯。

再有，就是在夏天，主席住的房子没有空调，只用冬天中南海的窑冰降温消暑。实际上，这样的消暑办法很不理想，作用微弱。我们就在院子里，用自来水笼头洒一点水，希望在环境上降降温，使主席更好地办公。主席却说，这个水不要洒了，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支援解放军战士，以便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战争。



内卫班的战士与汪东兴合影（前排左三为汪东兴）

当时，警卫局的行政部门想把主席的房子拆掉重盖，因为这些房子都是清朝、明朝的老房子，怕经不起地震什么的，影响主席的安全。已经有两个同志和两位技术员来给主席汇报这个事了，我们外边就听到了，主席说，我这个房子还可以住嘛，人家能住，我们就不能住了？现在我们正在抗美援朝，你们要多想想前方，多想想怎么支援前线。我这方面你们不要多想，现在也不搞这事儿。

1952年的3月7日下午三点，在颐年堂的院子里，毛泽东接见了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当时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空军司令员刘亚

楼,空军参谋长刘善本。在主席接见之前,女飞行员们就整好了队。我向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后,他就请主席去了。主席在李银桥的引导下,来到了队伍前面。飞行员们一看见毛主席,就高声地喊起口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举起手同他们打招呼,然后做着下压的手势,要大家停止喊口号。接着,主席走到一个大个子女飞行员跟前,问她空中工作适应不适应,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那个女飞行员高高兴兴地回答了。这时候,主席就拿着耳机后边的一个插销问,这是什么东西呀?飞行员回答,司令员也说,这是咱们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飞机与基地之间联系用的通讯插销。哦,主席乐了,有这个东西,你们就可以在空空中互相讲话了。主席这么一说,大家的拘谨心理一扫而光。

朝鲜停战的消息传来,毛泽东高兴地唱了起来。

朝鲜停战是在1953年7月27日,大约是28日下午,主席在院子里散步。他起床不久,刚在院子里吃过饭,在院子一边散步,一边哼着一点京剧的曲调。我对京剧呢,应该说是个外行,但能听出是京剧,而不是河北梆子。至于哼唱的是什么,我们虽然也跟着领导们听戏,但我还真说不上来。我还听主席唱过革命歌曲,我感觉是很逗的。我听领袖唱革命歌曲,这是很少有的事。但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听着很逗乐的吧。

毛泽东一直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他都有哪些考虑呢?

建国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合格的干部,而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太多。我们作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原来在西柏坡的一些同志,在进北平以前,主席就把他们送去

学习文化，进行深造。到了北京以后，在没有成立干部大队一中队以前，主席晚上跟我出来散步的时候，就几次问我上没上过学，认多少字。他知道我家里穷，没钱上学以后，就说你们都应该学习学习。

这些话他并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着急。他就想怎么办呢，应该搞一个学校，有助于我们的学习。

主席让我们学文化，还考虑到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必须有可靠的又懂文化的人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派你下去，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开展工作呢？很快，在主席的主持下，就成立起了一个干部队。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每一个省区，还包括沈阳、上海、重庆、武汉、西安、广州等几大城市，一个城市调来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的移动队。这些同志来了之后，第一个是担负警卫工作；第二个是要学习文化，边工作边学习；第三个任务就是回家做调查。主席由此掌握全国的基本情况。

主席在1954年的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的院子里接待移动队的同志。当时，移动队还没有完全调齐，有的同志还没来。主席专门进行了布置，调查农村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干部的反应，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应等等，即正面的调查；如果遇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也要调查，特别是反映党的干部工作，政策方针方面的东西，要搞清楚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在我们成立这个移动队之后，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校。主席说我兼任你们的名誉校长，另外再请一位教导主任和几位教员，也就是老师，给你们讲课。让你们学习几年之后，取得一些文化知识，打下一些基础。你们不可能在我身边工作一辈子，将来离开我，也好为党工作。在汪东兴的具体操作下，文化学校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第一批的学习用品，练习本、铅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主席用他的稿费给大家买的。学校成立以后，总政批了，有关学习的开支就有了着落。

文化学校办起来了，我们要跟主席外出怎么办呢？这个情况主

席也考虑到了，他说，现在全国的治安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你们学习文化，跟我外出的同志就要耽误学习。这样好了，我每年四至六次外出，每一次你们给我四至五个人就行了。这样你们三十几个人可以每年只跟我出来一次，要不然老是你们几个人跟着我出来，你们的学习会受影响。

我记得是1957年的3月20日，我们跟主席住在南京西康路三十四号，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美国大使，叫司徒雷登，住的一个别墅。那一天，太阳刚出来，主席就起来了。我正在值班，就陪着他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散步。主席问我，南京好，还是北京好啊。我说南京鸟语花香的，南京比较好，北京老刮大风，尘土飞扬的，难受。主席就说，哦，对嘛，对嘛。又问我们，你们学习的东西带没带来，我说课本、作业本都带来了。这次领导强调外出不要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差距太大了，外出也要把学习抓好。除了工作期间，陈守信老师就给我们讲课。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就能够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基本持平了。主席听了之后，很感满意，哦，这就好，这就好。

除了身教，主席也不忘言教。我们住在广州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主席问我们，涨潮、退潮是怎么形成的呀？我说是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吸引作用吧，他说应该加一个力字嘛，吸引力。老鹰为什么能在天上飞？这就牵扯到空气流动问题。另外，在北京，主席有的时候问我们一些这个花那个草的等植物学方面的知识。

主席有的时候还会为我们改错别字。比如，我们打的一些报告中间，调查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中间，如果有错别字，主席就会给你改过来。

主席看了我们的探家报告，有些情况不太清楚，来叫我们当面再聊一聊。这样，我们对于应该调查哪些东西，主席需要哪些材料，他最关注哪些问题，就会心里有数。

主席不仅关注我们的理论学习，而且指导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

1954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完宪法以后，就回到了北京。稍事休息，就从北京坐专列往北戴河去。中途在天津、唐山、秦皇岛看了几家工厂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专门去看了日出。

我记得是4月23日晚上，我们离开了专列，就到了北戴河海滨，住在原来张学良他们住的房子里。

主席睡完觉起来，已经是第二天十二点半了。汪东兴同志从主席那里出来，我正在门口值班。他说张木奇呀，明天早晨三点四十，叫我起床，他也没说干什么去。第二天早晨三点四十分，我就把汪东兴给叫起来了，主席他们都起来了，说要爬山看日出，到联峰山上去看日出。

我在前边引路，到了半山腰上，遇到了海军海防部队的哨兵。我们不知道，因为是突然决定的嘛。哨兵看来了一群人，还打着手电筒，打手电给主席照路嘛。这时候，两个哨兵过来了，拿着枪说，干什么的，站住。我就赶紧跑上去，说同志同志，请注意，我是公安局的，下边几位领导同志，他们要上山看日出。

他们看到后边的人都跟上来了，就把枪赶快收起来了。上山的时候，我们还给主席背了开水瓶、行军床，还带了个毡子，方便他老人家累的时候临时休息。再说看日出的时候，站累了还可以坐在行军床上看。上去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看日出比较好的位置，联峰山东边一个相对平一点的那么一个地段，先让主席坐在行军床上休息。给主席倒了一杯开水，这时候东方的鱼肚白都已经过去了。正是快要出太阳的前夕，这时候主席喝着水，跟大家聊着天，兴致很高。正在聊的过程中，慢慢的东方海平面上，比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更白了一点儿。上边还多少覆着一点红云彩，一片云彩丝贴着海面上边一点儿。不一会儿，好像是早起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吧，太阳就出来了。慢慢有了红牙牙儿，主席就用望远镜对着它看。我记得好像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太阳才完全出来了。出来以后，主席就把

那个望远镜心满意足地交给大家，让大家轮流着都看看。

事后，我想过主席为什么去看日出。根据当时形势的背景，宪法起草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快要开了，看日出的举动有特殊的意义。人民唱东方红太阳升，在毛主席眼里，我们的祖国就像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跟着主席一块看了海上日出，虽然感受颇深，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难表达。

1956年国庆节前夕，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华访问，接见地点设在了中南海勤政殿，工作人员刚布置好，毛泽东就走了进来……

主席进去以后，那个客厅里摆了一个美国的收音机。当时，咱们这些同志就想摆一个质量好一点的收音机。可主席一看，就说，我们是新中国，接待这样高贵的外宾，我们也有东方红收音机嘛，换我们自己的。

在这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又建议毛泽东接待外宾时改一改穿着习惯，毛泽东问这是为什么？

主席这个人最不讲究穿着了，一双大头皮鞋穿了好几年了，外边那一层光滑的面已经逐渐褪色了，就是上鞋油也不行了。罗瑞卿部长说，主席是不是把这双鞋子换一下？主席说为什么呢？他没有说鞋子太旧了，而是说根据国际惯例，像接见外宾这样庄重的场合，一般穿黑皮鞋为好。主席就反问他一句：“我们中国有中国的礼仪嘛，有我们自身的特点嘛，为什么一切都要照搬国际惯例？”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都很恭敬，这里面有例外吗？

有一次，我看到老理发师王惠在院子里给主席理发。好嘛，主

席还有几分钟就要接见外宾了，他当然希望老王能快点儿，也就是随便把胡子刮一刮。但是，老王想主席这是接见外宾哪，我理不好的话，好家伙，要是在外宾面前丢了面子，我就不好交账了啊。老王就用肥皂什么的，给主席抹了抹，还没有下刀呢，主席就说：“老王啊，快一点。”老王没吭声，拿刀子晃来荡去，这儿照照，那儿看看，才开始理，理了好长时间并没有理多少。主席呢，着急得直看表：“老王，快一点嘛，时间快到了嘛！”这时候，老王才用保定话说了：“你着么急呀你，你着么急呀？我不给你理好的话，你那样去接待外宾，那就是什么样子了，那不好了嘛，那就！”主席也不好说重了，老王依旧慢悠悠、慢悠悠地理。主席呢，想催他，又感觉催多了，老王反感。两人这时候的情绪非常逗，我们在一边也不敢插言，就像是看热闹。这时候呢，主席的表情很焦急，老王还是不紧不慢，就这么理完了。主席想走了，老王又发话了：“别动，别动，还没给你擦擦呢！”他把毛巾洗了洗，认真给主席擦完，才允许主席走了。

1957年夏季的一天，天气非常闷热。张木奇听卫士李连成说，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浑身是汗，就让李连成劝他游游泳。

我记得很清楚是1957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那儿住着。这个游泳池是个室外游泳池，是傅作义将军以前在中南海建的。以后，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建了一个室内游泳池，就在原来那个游泳池的南边。这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主席正在室内游泳池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天气特别热，闷热闷热的。我们在游泳池值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李连成，小李在主席身边服务，我就负责警卫安全。当时，小李一直皱着眉头，很犯愁的样子。我说小李你怎么了，（小李说）哎呀，你看咱们一身汗，主席也一身汗。他是担心主席的身体。我说这不是有游泳池嘛，待会儿请主席下来洗个澡嘛，那

不是更好吗？小李就回去请主席去了，主席呀，这么热的天你还在办公，浑身都是汗。主席没吭声，仍低头看文件。李连成就说，咱们是不是出来游游泳啊，缓解缓解这个热劲。主席缓缓地放下手中的文件，痛快地答应了。当时就我们三个，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主席披着一个睡衣就出来了。小李跟着他，我在前边快走几步，先下去了。主席站在那问我，最近家里来没来信哪？我说最近还没来信呢。以前的信里说没说下雨的事呀？我说，最近好像没怎么下雨呀，人民日报说三百来天华北地区没有落一场雨了。主席马上就反问我了，那天不是下了一次雨吗？他这么一问，我忙说对对对，但是那次雨量太小了，根本不顶事。哦，主席抬头看看天说，雨终是要下的嘛，现在不下，等几天可能要下。今年不下，明年一定要下。主席这么说着，就从扶梯上慢慢地下来了，我扶着他，为什么呢，怕蹬空，尽管他泳游得好，但是毕竟岁数大了，一旦出了事，我们都有责任。我值完班回宿舍休息，就听到一阵子雷声，接着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我说，哎，毛主席真灵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1958年1月7日，张木奇陪同毛泽东到了南宁，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主席说要冬泳，我们只好到现场去测试，还没来得及回去报告，主席的车就已经到了江边。我马上跟他汇报，我说主席呀，这个水温我测了，十七度半，看样子是有点低呀。“没有关系，”主席就说，“没有关系嘛，你们都下。”他这么一说，别人就没法坚持了，你要说不行，他肯定会不满意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呀，随着他上了一个小船。当时，主席和我对面坐着，主席就跟我说：“我们国家不是很大吗？北方嘛，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不能游泳了，但是你们来到这里还可以游泳。”

虽然是这么说，但我们看着他身上还是起了点儿小疙瘩，小红疙瘩，明显的有些凉意。这时候，李银桥上了小船，把暖水瓶的水



1958年1月7日，邕江冬泳时的小船上，毛泽东与警卫战士谈笑风生
(前左三为张木奇)

倒在脸盆里，浸了浸毛巾，准备给他来擦一擦身子，使他暖和一下吧，老人家毕竟上岁数了。但是他不让擦，有个同志问他，说：“主席呀，这儿的水温比较低，你冷不冷啊？”主席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二十度也冷。”不过，主席还是问李银桥：“带没带酒？”李银桥说没带，确实是我们没想到这事儿。这时候，我就说李银桥卫士长：“快点，拿毛巾。”他拿毛巾拧一下，递给我，我就给主席从上到下，连背部，包括手臂、腹部，两条腿呀，我都给他擦了。老人家再没说不让擦。尽管他说下决心二十度也不冷，但实际上是凉的，这说明什么呢？主席要下决心干一件事情，千难万险他不怕，他非要坚持到底不可，非要实现他自己的愿望不可。

后来，张木奇发现除游泳之外，毛泽东还有一大乐趣。

一天晚上，主席去怀仁堂开会要回来了，我到后门那儿去接他。主席下车以后，罗光禄就抱着给主席的文件回机要室去了。主席，李银桥和王鹤滨还加上我，四个人，就在后门那个地方。那时，雪已经下得很厚了，主席高兴得很，说：“好，很忙嘛，需要散散

步放松嘛，还有雪嘛。”十分钟，主席让李银桥看着表，要散十分钟的步。主席就在雪地上散步，踩得那个雪，“嘎吱、嘎吱”响。散了一会儿，李银桥说七分了，主席又走了一阵，问了一句：“现在几分了？”“九分多了。”又走了一下，他也估计到时候了，李银桥说话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嘛。”寂静中的“嘎吱”声让主席高兴得不得了。

毛泽东喜欢在雪地上散步，所以下雪之后，他不希望把院子里的雪扫掉，张木奇他们就想怎样才能既保留住雪，又不影响毛泽东走路呢？

主席不让把雪扫掉，我们就在院子中间扫出一个大十字形的路。另外，再扫一条往外走的路。就这么着把别的雪都保存起来，主席他高兴了，他爱雪呀，有的时候在我们扫的路上走，有的时候就在雪地上走。雪能激发他的激情，主席办公累了，在雪地上散散步呢，马上就能恢复精神，身体的疲劳很快被赶走了。

60年代初，张木奇离开毛泽东。如果张木奇可以重新选择，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既幸运又幸福，尽管那时候工作很紧张，纪律也很严，也不能说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感觉这是值得的，而且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以后再有这么个机遇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么选择，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访问 张仙朋



毛泽东和张仙朋合影

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的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孩子……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苏联，经过沈阳的时候，毛泽东在文化宾馆做了短暂的停留。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张仙朋正在文化宾馆当招待员，他见到了毛泽东……

我记得是在1949年底，12月份，当时我在沈阳文化宾馆当招待员。文化宾馆就是后来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了，当时叫文化宾馆。有一天，领导布置我们任务，说是有重要的接待任务，让我们赶紧做好准备。来人被安排住在我负责服务的101、102房间，那是全楼最好的房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接待谁，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搞完卫生以后，客人来了。我上楼一看，啊！是毛主席来了！我又惊奇又兴奋，我接待的是毛主席！毛主席先到我负责服务的那个大厅里的沙发上坐下了。当时一块来的有很多人，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都来陪同了。我亲手第一次给毛主席送了一杯茶水，我说：“主席请喝茶。”主席接过了杯子，看看我，笑了笑，说：“谢谢。”

这次主席在沈阳呆的时间很短，只半天，吃了顿饭，稍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

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时候路过沈阳，又住在文化宾馆里。就是这一次，带来了张仙朋工作上的变化。

1950年2月底3月初吧，这次主席一行住了三天。我们原来给

主席准备的是101房间，给总理准备的是102房间。后来，可能是因为习惯的原因，主席住了102，总理住了101。我记得，主席的贴身卫士李家骥同志让我给主席准备洗澡水，我放洗澡水的时候，主席走进卫生间，对我说，水温不要太热了，和人的体温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好好好。放完洗澡水以后，我从卫生间出来，主席招呼我，哎哎，小孩子。我走过去，主席就问我，你多大了，今年几岁了，哪个地方人，读过几年书？我说，我今年十六岁，山东人，小学没毕业。主席看看我，又问我，你在这儿工作累不累呀，给你们发多少零花钱？我说，工作不累，我们都是供给制，会抽烟的发一包烟，不会抽烟的发一块钱。当时，我们用的是东北币，不是后来的人民币，相当于人民币几毛钱吧。

这次主席在沈阳住了三天。三天里，都是我们服务的。当时，跟随主席的有汪东兴同志，有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他们很喜欢我。汪东兴同志就问我，小张啊，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其实我是想去。汪东兴说，我到北京去以后想办法把你们调去。我听了很高兴。

过了有半年时间吧，组织部就下调令。当时要六个同志，后来经过组织上审查，要了三个。我一个，再加上李连成、孙益亭。我到东北人民政府组织部转党团组织关系的时候，有几个同志见到我们很惊喜，说你们真幸福啊，这么年轻就到北京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

我们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到主席身边工作，我和孙益亭先在警卫处负责搞搞服务性的工作，李连成在叶子龙身边工作，主要就是熟悉情况。

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毛泽东打乒乓球的情景，那个和毛泽东打乒乓球的人是谁呢？

在中南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主席身边的卫士都很熟悉

了。当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一次我到主席住的地方和他们打乒乓球。正打着呢，主席和江青吃完饭从食堂里出来散步，就走到打乒乓球那屋去了。我们看到主席进来，都欢迎主席来打乒乓球。主席很高兴，就和我打了一会儿乒乓球。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打乒乓球。这时候，我还没到主席身边工作。详细情况我倒记不大清楚了，但打得很高兴。到1951年3月份，我到主席身边工作以后，在游泳池和主席又打过一次。有一张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嘛，那边就是我。主席横握拍，有时候他猛抽一拍，球却没抽到桌子上，但是他很高兴。

1951年3月，张仙朋被调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在主席身边熟悉情况以后，我就正式到主席身边工作了。记得主席在石家庄，我跟江青晚上从北京坐火车去的。卫士长李银桥带我去客厅见主席，告诉他说这是小张。主席跟我握了握手，他说欢迎你，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接着就讲，到我这里工作可苦哇，有时候要跟着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说，主席，我不怕苦。主席看着我笑了笑，我就开始在主席身边工作了。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仙朋发现不怕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毛泽东的湖南话，让张仙朋他们闹了不少笑话。

主席是湖南人，他讲的话，我这个东北人不大听得懂。刚去之前，老同志都跟我说，主席讲话你得注意听，别净听错话，出洋相。即使这样，仍出了不少洋相。主席要叫警卫，我们却把政委也给请去了。老同志讲过发生在延安的一个笑话，主席说要打牌，卫士说主席要打靶。主席从来没打过靶，怎么打靶呢？原来主席说要打牌。还有一次，主席说把鞋子拿来，结果工作人员把箱子拿来了。

就拿了两个一大一小装东西的箱子，让主席挑。结果，弄得大家都笑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听主席说话，我就有些紧张。有一天晚上吃饭，主席、江青和孩子们一块吃饭。主席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我进去以后，主席仍低着头看文件，也没看我，就说搞个蜡烛。我听着是搞个辣子，这时候李讷说，爸爸这个菜有辣子，就把那个菜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说吃个小辣子，我就赶紧跑到伙房去，我说快快快，师傅，主席要吃辣子。大师傅就赶紧洗小青辣椒，用油过了过，放点盐，我就把小盘辣椒给主席拿去了。我放到主席桌前一看，哎，主席前面怎么点着一根蜡烛。主席正在烛光下看文件，我就想，哦，我听错话了。主席是说搞个蜡烛，因为光线暗看不清，我却听成搞个辣子了。我虽然不好意思，但还是把这盘辣椒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可能是了解我的心情，他怕我心里难受，就有意识地夹了一个辣椒吃了。这时候，我的心里就比较舒服了。

再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主席工作很累，有时候睡不好觉。有一次，天都亮了，主席说要吃东西。那时候，主席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麦片，算是夜宵。主席喜欢麦片煮的时间长一些，就是成糊状的那种。那一次，麦片煮好了，主席却睡着了。正巧，江青起床了，江青知道有麦片粥，就要去当早餐吃了。过了一会儿，主席醒了要吃麦片，可麦片却没有了。主席以为值班人员没做，就很生气，发了一通火，批评我们这些值班的同志。李银桥知道了就说，我们要开会了，主席批评我们了，我们要好好检讨检讨。当时，我们几个同志比较紧张，特别是我刚来，就更紧张。会刚要开，主席就把李银桥叫去了。李银桥回来后说，不用开了，主席说了，不怨你们，你们没责任，不用检讨了。我想一定是有人将江青吃麦片粥的情况报告了主席。虽然我们没有检讨，也说没有责任，但是到主席那里去，心情仍不免紧张。

我记得有一次，我由于紧张把话又听错了。主席从办公室出来，到卧室要睡觉。他打铃叫我去，主席讲，你到办公室搞个刀子

来。我连忙说好好好，却不好向主席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刀子，因为主席已经躺在床上看文件了。我就到办公室找刀子。主席办公桌上有剪刀，却没有刀子。主席从来不用刀子，通常是用剪刀剪文件。我却听成了刀子，只知道急着找刀子，却没想一想主席为什么急着要刀子？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就有些紧张。不行，我得问问主席。我说，主席呀，你要个什么刀子？主席说，就是办公室桌子上的刀子，你找一个大的来。叫我找个大的拿来，我也不好再问，却更糊涂了。我就赶紧出来，嘀咕说什么刀子呀，小的都没有，还要什么大的。我找了半天，不行，我也不敢再问主席了。我就到了李银桥房间里，李银桥睡着了，都半夜一两点钟了。没办法，我就把李银桥叫醒了。我说，李卫士长，主席要刀子，不仅要刀子，还要大刀子，他说在办公室放着，我找遍了，哪有刀子呀！主席要睡觉了，用不着刀子呀！他说，哦，主席是不是要桃子？今天有人给主席送桃子，我给主席洗了几个放在办公室，主席一直没有吃。我说，对呀，主席原来是要桃子。我飞快地跑到办公室，挑了一个很大的桃子，用盘子送到主席的卧室。我说主席，是不是要这个？主席说，哎，就要它。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主席呢，一点儿也没有怪我的意思。我觉得，主席对我们青年人的一些过错很体谅，也很宽容。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养成了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一时不能适应的张仙朋，难免出了几次小小的问题。

有一次，主席正在办公室办公。我就趁这个机会，到房间里给主席搞搞卫生。我带上笤帚，拿着撮子(簸箕)，一面哼着小调，一面到主席卧室去。我开门一看，主席却躺到床上，我吓得撒腿就往外跑。主席喊，哎哎哎！我头也没敢回，撒腿就跑了。心想这下可糟了，我把主席吵醒了。打扰主席的睡眠可是个大事。

过了一两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就问我，小张，你看我是个老虎吗？我说不是。那我是不是个鬼呀？我说更不是。我不是老虎

也不是鬼，你为什么怕我呀？我这个人哪，一不打人，二不骂人，我批评你们批评错了，我还向你们认错呢。以后不用怕我，你要再怕我，我就不高兴了。主席这么一讲，我的心里既觉得很难受，又觉得很温暖，心情很矛盾。

还有一次，主席正准备休息。值班室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我们起床以后，都到那个水龙头处洗脸。我喜欢一边洗脸一边哼唱，我正在哼评剧《小二黑结婚》的那个调子，李银桥就从主席房间出来了。李银桥严肃地说，小张啊，你瞎哼哼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主席都听到了。我问，主席生气了？他说，那倒没有，主席问是谁在唱啊，我说是小张。主席就说，他唱得不好听嘛。我说，那我去告诉他不要唱了，主席说，哎，别，让他唱，让他唱，人家高兴嘛。李银桥说着就笑了，我说主席没生我的气吧？李银桥说，没生。

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你们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吃一顿饭，而你们呢，天天见面。从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所以，不论从工作上还是学习上，主席都特别关心。

为了工作得更好，张仙朋想出了一个和毛泽东步调一致的绝招，但是绝招也有不灵的时候。

所谓绝招，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主席睡觉，我们也跟着睡觉；主席起床，我们也跟着起床。主席睡觉，有时候吃安眠药了，他要吃三次安眠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完了睡觉。我呢就一个人跟着，主席吃第三次安眠药的时候，快要睡觉的时候，我也吃安眠药，赶紧吃，所以主席睡了以后，我也赶紧睡。有一次，主席说睡

觉吧，我要睡觉了，你也睡去吧。我说好，回来以后躺了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打铃叫我去，主席说不睡了，搞饭吃吧，天亮了。好，我给主席盛米饭的时候，我这手连碗都拿不住，一碗饭就掉在了桌上。主席说，你怎么了？我说，主席，你前边吃安眠药，我后边跟着吃，赶紧睡。他看我的样子挺有意思的，就笑了。

有一天，张仙朋得了感冒，因为怕传染毛泽东，没去上班，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回信却让张仙朋哭了。

我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感冒了，很想主席。

主席接信的第二天，那是1961年的12月24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过两天（26日）就是主席的生日嘛。主席信上写：小张啊，你好些了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大好，全国都很困难，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那屋吃饭。我看到信以后很感动，正好我的烧也退了，我就去看主席。因为是冬天，回来后，感冒复发，发高烧。几天看不到主席，我就又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小张啊，好孩子，怎么又病了，可能是过滤性病毒引起的，应当服四环素，嘱咐大夫为你配药。我收到这封信，一面看信一面流泪。主席对我们确实是特别关心。

到毛泽东身边后，张仙朋开始迷上了写诗。当大诗人毛泽东在写诗或者读诗的时候，小诗人张仙朋就经常陪伴在左右。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比较喜欢写诗，江青还把我写的两首诗转给一位诗人，让人家给我修改。

有一次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都去了，高岗也去了，我给他们送茶水的时候，主席跟他们讲，这是我的小诗人。

我很不好意思，但高岗很高兴，因为我是从沈阳来的嘛，从东北来的嘛，他感觉很有面子，所以就很高兴。

1957年，主席到苏联访问，我和李银桥同志跟随主席到了苏联。到了苏联，我就开始尝试着用诗的形式写日记。

有一天，主席问我最近都写什么？我就把我的日记诗拿给主席看了。有两首诗是回忆我童年时代的。我童年时在大连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学习和生活都很艰难。我写的是：忆起当年尝辛苦，手握杆枝泪寸土……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看主席的表情很沉重。主席说，你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我说是我写的，主席很高兴，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几首古诗。他还给我做了解释，那次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主席你该睡觉了吧？！主席看到我写的一首心愿：当明月刚入晨霞，毛主席方才睡下，但愿他梦中无扰，醒后精神焕发。这也是一首日记诗。主席说，好！既然是你的心愿，我马上睡觉。

主席有时候看完文件，要休息的时候，自己就朗诵诗。有时候朗诵自己写的，还没发表的。先朗诵着看一看，需要改的地方可能要改一改。再不就朗诵一些古诗、古词、古曲，有时候叫我：“你拿一张纸，拿笔来。”主席一面朗诵，一面让我记。他朗诵一句，我写一句，朗诵一句，写一句。朗诵的时候，他那个湖南口音我听不懂，我听不懂的话，主席就把纸拿过来，他写上，写上几句，完了，给我，他再朗诵，我再写。所以，我保留的东西里边有主席的笔迹，也有我的笔迹。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很喜欢住玉泉山，后来却不愿意住了，这是为什么呢？

主席在过去很爱运动，这个在已出版的书籍里边写了很多。建国以后工作忙，运动就比较少，但是他发现这样不行，就坚持锻炼身体。为了方便主席锻炼，他们在玉泉山主席住的地方给修了一个

游泳池。因为是在楼里面，池子很小，如果扎猛子的话，从这头一下子就到那头了。另外，在玉泉山楼外面搞了一间房子，里面有些健身器材。什么划船呀，骑自行车呀，这样一些器材。有一天，主席上床睡觉了，很气愤地跟我讲，我要在外面游泳，不让我游，就给我修了个这么一个池子。搞个健身房，在这里边健什么身！还是要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嘛。

在修完游泳池以后，我听说主席在会上还做了检讨，并用稿费付了费用。从那以后主席再也没到玉泉山住过。

毛泽东主要的休息方式是散步，在这个时候总会和陪伴他的人谈一些轻松的话题。

有一天我和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停下了，就看着我，说：“小张，张仙朋，哎，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当时我愣了一下，主席什么意思？主席说：“我问你，小张，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我说，我们住地下。他说不对，如果别的星球也有人的话，我们不是也住在天上吗？后来，又问我：“你说我们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说：“我们不是神仙。”他说：“别的星球上有人，我们也在星球上，我们不是也是神仙？别的星球上就是神仙，那么在天上是神仙，我们住在天上，我们不也是神仙吗？”我笑了：“那好，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张仙朋嘛。”主席哈哈大笑。

可是，有时候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让张仙朋觉得不那么轻松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庐山嘛，主席跟我讲，也是他睡不着觉了，有很多心事，就开始和我聊天。主席说：“我有三大志愿呀。第一呢，是要搞调查研究，到基层搞调查研究，搞上一年工业，搞上一年农

业，商业我搞上半年，我要多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这样呢，我也给全国的干部做个榜样吧，这是一大志愿；第二大志愿呢，他说，我想骑马视察黄河长江两岸，我对地质方面呢，还不大熟悉，地质方面的知识太缺乏，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再请上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块儿视察；第三呢，我要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来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主席这么说，我心里挺沉重的。后来因为事情太多，主席的这三大志愿并没有完全实现。

过了一会儿，主席说：“我这个人呢，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呢占百分之三十，我已经很满足了。”接着，主席叹口气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我就是这么个人。他还说要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把他自己写进去，也把我们写进去。我说主席呀，你千万不要把我写进去。

张仙朋有两次和江青吵了起来，那是为什么呢？

主席不仅对我们很严格，对孩子很严格，而且对他的夫人江青同样很严格的。当时，我在主席身边服务的时候，江青还没什么职务。名义上是主席的秘书，实际上她是主席的生活秘书，并没有什么实际职务。每次开党代会、人代会，江青总要和主席吵嘴。主席说，你看，又来和我吵架。因为什么，就为当代表。江青当时连党代表、人大代表还不是，中央一开党代会、人代会，江青心里就不平衡。她就找主席闹，主席就是不答应他的要求，只让她看看参考消息，国际上有什么情况向主席汇报。我们和江青当时相处得还可以，和江青没什么矛盾。但因为江青这个人有时候要求挺多，事儿也挺多的，难免有不愉快的时候。我就和江青吵过两次。

有一次，我值班。我是晚上一点钟接的班，上一班的同志告诉我，江青已经睡觉了，等一会儿你去给主席吃安眠药，我说好。

等过了一会儿，我去给主席吃安眠药。我一开纱门，就听到里

面有人和主席讲话，是江青的声音，我马上关上门退了出去。

不大工夫，我正在值班室，江青打电铃叫我去。我一进门，她在床上躺着，她已从主席房间回到了她的卧室。她说，小张啊，我和主席谈话，你们也听啊？当时，我就愣了，我说我没有听啊。她说，怎么没听，刚才你不是开门了吗？我说，刚才交班的时候他们说你睡觉了，我以为你不在主席房间里，就去给主席吃安眠药。一开门，听到你在讲话，才知道你在主席房间里，我怕打扰你们就退出来了。

她一听我讲的话有道理，就转移话题说，前两天我让你找一个文件，你说你没找到，我明明看见这文件就在办公桌上，你不给我。我当时也不高兴了，我说，你当时叫我找的文件，我确实找了，没找到，也可能是他们收拾房子的时候文件压在哪了，没找到，现在又翻出来了。你让我找文件，我要是看到我能不能给你吗？结果她说，好，好了，你走吧，主席叫你，你上主席那去吧。

主席见我满脸不愉快，就问我，怎么啦？我说，和江青吵架了。为什么？主席问我。我说，她冤枉我，我就把情况和他讲了讲。

主席吃完安眠药，我就回值班室去了。过了一会儿，主席又打铃把我叫去。可能是我走了以后，江青又到主席那去了，她把这种情况跟主席讲了。我进去，主席跟我讲，刚才，我狠狠地把江青批评了一下子，我说小张的脾气你也发。主席跟我讲，江青是开钢铁公司的，不过你的脾气也太钢了，你们两个是钢对钢。说完，主席就笑了。

我记得是第二天，我碰到李银桥。我说，我不干了，我不想干了。李银桥就劝我，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在济南，主席和江青住在飞机场。在机场接见完外宾以后，主席就离开了济南。江青还住在机场。当时，飞机场的条件确实比较差，窗户、房门又响又透风。周围的鸟叫声，听得清清楚楚，很不安静。当时，跟江青在一起的有我，有王大夫，还有两个护士。王大夫从江青那儿出来，到值班室找我。他告诉我，小张啊，

江青叫你去呢，你注意点啊，江青发火了。他解释说，江青怪罪这门直响，鸟又叫。她怕声音，睡觉的时候怕有声音。

我说好，我过去了。江青她那个客厅的门是木头的弹簧门，开开吱地响一声，关上也吱地响一声。为了防止有声响，我一进门，就把门扶住了，不让它响。江青就不高兴了，你看这条件，这么不好，你们也不管。我说我管不了，没办法。我就争辩了几句，惹得江青发火了。我一直就这么着扶住门，她指着我说，你看你那个架势，像赫鲁晓夫的架势，你给我走。我气得一摔门就走了，这个门就吱嘎吱嘎响个不停。我到值班室，就告诉王大夫，江青发火了，你可要小心点，明天上飞机，咱俩的行李你别往里拿，就放在机舱门口。走的时候，咱们拿起行李就走，赶紧下飞机。王大夫说，好，小张我听你的。

等到第二天上飞机了，我把江青安顿好了，她已经躺在了床上。我们的行李就按事先说好的放在了机舱门旁，起飞前，飞机上的解放军同志正准备关门，江青就讲话了，她说，同志啊，先别关门，我们有两个同志要下飞机。我一听，两个人，就说，王大夫，走吧，我们两个拿着提包就下了飞机。山东省公安厅的厅长一看，飞机已经开始滑行了，怎么从飞机上又下来两个人呀？我们下飞机后，就回宾馆了。我接着就买了下午回北京的火车票回北京了。回北京以后，我就发高烧。到了第三天，李银桥给我来电话，小张啊，你不来呀？我说不行，我发高烧呢。他说，江青叫你来啊。我说不行，发高烧。又过了两天，李银桥又来电话，小张好了没有啊？我说好点了。他就说，你快来吧。我说不行，身体弱不能去。第三次李银桥又来电话了，已经过去六七天了。他说，我告诉你啊，江青说叫你来，我说好啊。当时，我想，我也该去了，顺着下个台阶吧，我就坐着火车到了北戴河。汽车开到主席住的房子前边，李银桥正在路口等我。我一下车，李银桥就说，哎，你先别回房间，江青在大厅等你呢。我说好，叫他们把行李给我拿到房间去，我就到大厅去了。江青坐在大厅里面，一看我来了，似笑非笑说，怎么，你来

啦？我说来了。她说，小张啊，你这个人哪，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骄傲自满，还自由主义。上来就给我扣了三个帽子，我笑了，我说是，我以后改正。她说，你回去休息去吧。

我到了主席那儿，主席说，怎么样，你和江青和好了？我说，江青给我扣了三个帽子。哪三个帽子？我说骄傲自满，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席笑了，主席对我们和江青之间的关系呢，他不是护着江青，批评我们，主席是很公正的。

其实江青对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我还是不错的。经常在一起，有些矛盾是在所难免的，这也符合辩证法嘛。

1963年，张仙朋二十九岁，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三个年头。这年的二月份，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地方上工作，和妻子商量后，张仙朋选择去兰州。可回了一趟老家，张仙朋却变卦了……

大概是1961年，一些老同志就开始下放劳动锻炼。为了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能够更坚定，经得住党的考验，主席决定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期分批下去劳动锻炼。主席还说他自己也要加强锻炼。一些老同志走了之后，主席就问我，他们走了，李银桥也走了，谁负责呀？我说，大事情汪东兴管，小事情还不知道。主席说，你能不能管起来？我说，主席，我不行。主席说，我看你行，他们能管，你不能管？我笑了，我说，我不行。但是过了几天，汪东兴宣布说，让我代理李银桥的工作。那是1961年初，等到1961年9月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正式下发文件，任命我为第一卫士组副卫士长。

1962年，第一批下放人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第二批又要下去了。主席讲了好几次，今天讲，下放你得去。明天又讲，你不要去了。后来又讲，你还是去吧。就这样反反复复，主席最后下了决心，让我也下放锻炼。我们当时去五个同志：我、主席副卫士长孙勇、机要秘书王光禄、警卫团的陈长江、理发员钱水桃。主席讲，你们

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病要在当地看，当地看不了到县里看，县里看不了到省里看，实在不行了，赶紧给我来信，我就把你们调到北京来看。病好了以后，还得去。

我们下放那一年相当艰苦。不仅是生活艰苦，而且劳动量特别大。我们过去没劳动过，感觉很不适应，好在最后还是顶下来了。

我下放回来以后，1963年吧，主席决定我到地方去工作，离开北京。一开始，主席问，你要到哪个地方工作？我和我爱人李淑琴商量，因为她是西北军区的，军区司令部在兰州。她的意思是到兰州去。我就告诉主席，我们想到兰州去。主席说，那好啊，那个地方艰苦。我说，那好，哪个地方艰苦我就到哪去。

在没去以前，我和我爱人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我父母。我把这个情况和我父母讲了，我说我要下放了，要到地方工作了。我父亲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说你走这么远，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赶上我有病了叫你回来，你都不能及时回来，不能去。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仍然说不行，我得上北京找你们领导去。回北京后，我就跟主席讲，我父母不同意我去，因为太远了。我父亲还说要到北京来找领导。主席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回我的老家山东。主席说那也好，打回老家去喽。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汪东兴，汪东兴就跟山东省公安厅的张国富厅长谈了。汪东兴同志当时跟主席在外地视察，就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到山东青岛工作。临走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去看主席，主席握了我们的手说，你们都大了，翅膀硬了，应该出去飞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主席一面说一面流泪，我们也都哭了。我1963年离开，1964年，出差到公安部，我当时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到公安部去汇报案子。汪东兴同志正在住院，我赶去看他，并向他请示。我说，我要去看主席。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我同意，但是我要打电话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问问主席让不让你去。徐秘书回电话说，主席刚起床，让你马上来。我就急忙赶到中南海。主席一见我挺高兴的，他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

在青岛公安局搞政保。主席一听政保还不习惯，主席说什么是政保工作，我说政保工作就是抓特务的。他说，哦，好抓吗？我说不大好抓。我说，主席你以前到青岛去过，你什么时候再到青岛去？主席说，上次到青岛去，青岛那个地方不错，但是正赶上连雨天，天天下雨，去了就感冒了，另外青岛市比较小，活动范围也小。以后，我到青岛去就找你。说完，他就从床上拿起《辞海》，这个《辞海》主席是走哪都要带着的。主席翻到最后一页，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写上，我就写了，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一处，张仙朋。主席说，好，我到山东青岛去找你。完了以后，我说好了，主席你休息吧，我得走了。主席说，你看看，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呀？主席就打电话，把卫士周福明叫去了，说你到伙房去看看，给张仙朋，小张，弄点面包哇，什么点心啊。周福明就带我去了，结果回来以后，小周说没有面包，没有点心了，就带了七八个大鸭梨。主席又把他的房间里柜子上的饼干筒拿下来，一看饼干筒里的饼干也不多，就把连饼干带饼干渣子，一大包，说你给我包起来，带回去给孩子吃。我就带着主席给的饼干和大鸭梨离开了。回去以后，我就把梨送给同志们吃了。我们科的同志都非常高兴。

1963年再次去的时候，主席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我们的原子弹炸了没有？当时，我去公安部汇报的案子，就是有关原子弹的。结果，火车还没到北京呢，火车上就广播了，说原子弹爆炸了，那么原子弹爆炸就不保密了，我这个案子也不用汇报了。我回答，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了。另外赫鲁晓夫下台了，你知道吗？真巧，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也下台了，主席很兴奋。

1965年，我们又到北京去看主席，这次有小田，田云玉和他的夫人小胡，我们一起去的。

1965年以后，我再也没去看过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5年那次，是最后一次见主席。本来要照相的，结果打电话找侯波同志，没有找到，就这样离开主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主席。

如今，我时常拿出日记本，回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在主席身边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很宝贵的那段时光都是在主席身边度过的。我感到很幸福，虽然我没捞着什么好处，虽然主席要求我们很严格，但我很知足。

访问 沈同



毛泽东和沈同的合影

毛泽东晚婚晚育的观点 ,在沈同身上起到了作用。到了后来 ,沈同偷偷交了女朋友 ,但没有告诉毛泽东 ,也没有结婚..... ,在知道这件事的第二天 ,毛泽东就主动提出来要做他们的主婚人.....

沈同，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景县。1949年10月，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由于他机智灵敏，毛泽东每次出外视察都要带上他。他处理过多次意外事件，这位从中学时就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地下党，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竟显得很紧张。

第一次见主席确实很紧张，那时候我就是说不上什么话来。我在门口站着，他到勤政殿来开会了，他看见我，笑笑，你说我说什么好啊。这时候，主席先跟我握手，我高兴得不得了。他看我紧张的样子，他说你做工作，这我一下子还不好答。因为我们在山沟里头，没有职别什么的。我想了一下，跟毛主席说我管文件，主席看出来我这紧张的样子，他说，那么天下的文件你都管啊。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倒好了，放松了，所以都没什么忌讳。

一开始，沈同担任中南海警卫处的秘书，因为他曾在北平搞过地下工作，熟悉北平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外出必定带上他。后来，沈同升任警卫科科长，毛泽东出行的许多工作都要他提前完成。

汪东兴是跟着主席从延安过来的，那时候他是主管主席警卫的，他们都在丰泽园里面，我是警卫处的秘书，每次汪东兴跟着主席外出必定带着我，因为叫我给他布置警戒线，外围的路线、当地的路线他都不清楚，我最清楚，因为我当时做地下工作，我就在北京，所以他

都带上我，这样子，我就开始做主席随时活动时的警卫，只要是主席外出，汪东兴去就叫上我。有时候主席要到下面调查工作，要外出什么的，他也会带上我，坐专列我就组织专列，坐飞机我就试验飞机。后来主席越来越忙，开会什么的时间就紧迫得很，所以他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在勤政殿开会，有时候上怀仁堂开会，有时候到颐年堂开会，因为这些地方过去我们不常用，没有专人照顾。他一去我们就要告诉服务人员到那开个门，准备茶水什么的，后来汪东兴说这个不方便，最好是想去就去，到那就开，我说这个方便嘛，我们管起来，他说那好，你得当警卫科科长，我再给你几个人，把这些会场都给我管起来，主席不管上哪去，到那了以后，都跟回家一样，我说可以。就王永清、孟宪芝、徐永福我们这四个人，一个科长，三个干部，这样子，我们就把中南海里所有的会场都管起来了。

毛泽东很喜欢接近普通百姓，但人们一旦发现是毛泽东，就会高兴地奔走相告，场面也会失去控制。

有一次我记得，是主席外出。那是春天吧，他要去看看麦子生长的情况。经过徐州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地方的麦苗长得真好，他说你停一下车，我去看看，他就下来了，沿着这个麦苗地走，走到一个村子边上，正好碰上人家当地开“三级”干部会，正在吃午饭。主席说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看到反正有人在那儿，旁边那个当地的警卫同志说，这儿在开会，“三级”干部会。坏了，我说坏了，不行了。可是，主席还要往前走啊，你还不好挡他。他走到那儿，正好人家中午开饭，有一个小伙子，不知怎么又出来了，也看见了，就说，哎呀，毛主席来了吧？大伙儿就炸了。呼啦啦那些人哪，盘子、碗、桌子、凳子哗啦哗啦的，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我都听清楚了，我就赶快说挡一下子。挡也挡不住了，那些人他也不知道我是老几呀，他都往外走，我真是急得没办法了。急中生智吧，我就看当时正吃饭的嘛，我就拿了两个菜盘子，这么一

扣，使劲一扣。啪，一响，大家都吃一惊，一下子鸦雀无声了，说这是怎么了。我借这个机会，我说毛主席来看大家，大家要有礼貌，你们都按照你的桌子位置，你们都回去，好不好。大家说好嘛，正说着主席就进来了。进来了，问问他们的情况，主席看看他们吃的东西，走了一圈。他那个地委书记要给汇报，主席说不用汇报了，我看到了你们的情况，我就了解了嘛。

毛泽东喜欢接近百姓的举动，这给沈同他们的警卫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减少毛泽东与群众的亲密接触。

我们这么做被毛主席知道了，主席说这是神经病嘛，你们为什么怕群众呢？你们为人民服务，你怕群众，这说得过去吗？怎么办呢，就是因为在武汉蛇山让蛇咬了一口，所以见了麻绳就害怕，这不对。主席说组织群众是一种艺术，要学会组织群众的艺术。他说你看我们天安门庆祝国庆，十几万人哪，大家都是井井有条啊，是不是？谁也不影响啊，这就是群众的力量。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了，你懂这个意思了，你就跟群众的意见一致了。回去你们研究研究组织群众的工作，这个群众工作是一种艺术，要研究管理群众的艺术。

回来我们就开会，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就研究怀仁堂照相的这个问题，这个把主席围起来了谁也不好办。因为都是老干部来了，我们这些人过去了，有人说你一个毛孩子你懂个什么啊。我们那时就研究了一下组织群众的艺术。后来大家经过研究想了几个办法，就是他一开会，我们就参与会上的组织工作，包括主席接见这一条，这一条我们有我们的要求，首先是了解人员的情况，哪个省里来开会要带着保卫处长来，把这个情况记住，然后就约法三章了。大家排着队入场，进来以后是先参观怀仁堂，一参观怀仁堂他这个心就静下来了，会场上的气氛是很安静的，整个会场都是很肃穆的，然后到花园去就排队，再有到了花园里头，我们就修了一些照相的梯子，

一个梯子四层，一个梯子上头站二十个人，我说我给你分配多少人，多少位子，我说谁挨着谁由你们自己组织。我试一下，大概有个千把百人的会议，把这个梯子排好了，然后大家带着队伍来了，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就不能动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主席去了，我说主席咱们可以走了。主席说那好啊，不光是这个，还得有常委，还得有政治局委员，主席说这些人都得去，就把这些人都找到一起来，一起去，大家见了，谁也不能动。哎咳，老老实实的，接见完了，大家走一圈，有的打个招呼，有的特熟的人还过去拉拉手，这一圈走完了，出后门上车就走了，然后大家退场，非常有秩序。

彭真同志最欣赏，他说你们这个办得不错嘛。又搞几次之后常委、政治局常委又有意见了。会议老是有的，过两天就开这个会，过两天又开那个会，因为他们都得布置自个儿的嘛，主席来了要看大家，我们都给约好时间，几点钟组织队伍，几点钟主席去，都挨个通知的，等开上会主席叫了也得去呀，接见嘛，有的正在搞自己的事情脱不开手，脱不开手也得去，这个我们也很挠头。后来我们又研究了一下，不是修了一百个蹬子了嘛，就是在这个时期搞的，叫他们都来。一次，就是你这个会议八百人站这，这个会议五百人站这，主席带着队伍一起从这边一直走，都看完了，大家非常欣赏。主席这边说了，这就是组织群众的艺术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并且喜欢轻车简从，不要太多的车辆出动。但是，警卫人员必须考虑特殊情况，要保证万无一失。

主席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曾经发现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下去了坐的车就是这么一个大队，让当地农村应接不暇，完了以后这些人回去还得跟着吃一顿，主席就很讨厌这种做法。他说，我不搞这套，你看这像话吗，你告诉人家了，人家专门成立一个班子迎接你，找了这么多人，跟代表团一样，那干什么去了，我是做调查研究的，我不要

这些东西。很简单的，他看见大家排着车队也不好，他有一次跟汪东兴说，你们得改呀，你们不能这样做。汪东兴跟他说，主席咱们就两辆车吧。如果一辆车的话秘书也没地方坐，我也没地方坐，主席说那可以，以后就两辆车了。两辆车我觉得不够，警卫工作就是怕万一，要防万一，真正出事了，也不一定，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出事可能也要做到防备。我说这要一出个事，你怎么办呢，当地也有意见，他说你们到我们这儿，不让我们的车跟着，那我们怎么保你的险哪。我就跟当地商量一下，我说，在我们的车一百米以外，你准备两辆车就可以了。如果有事，一百米，用不了几秒钟你那就跟上来嘛，没有事你就离远了，就跟群众在一起，那毛主席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他的车队吗？也不是。所以到外地的时候，他都是跟上一辆车到两辆车，在很远以外，很远以外也有别人的车嘛，没关系。

有那么一次，那是在上海，毛主席过一个大桥的时候，他这辆车灭火了，那司机着急呀，也修不好，他说这怎么办哪，我说不要紧，我一招手后头那车就上来了，我说主席呀，这个车不行，咱们得换一个车，他说你随便坐老百姓的车呀？我说是咱们的车，你上车吧，他就上了后头的车了。所以，以后他也不再说话了，他知道这个警卫工作不能没有万一，不能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这是我们做警卫工作里的万一事项。不出事便罢，一出事，你还要防备，不能没有防备。

毛泽东外出坐专列，也不愿意给地方上添麻烦。好多事情都在专列上进行，甚至吃饭，有时候也在专车上。毛泽东有随时停车的习惯，这对警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席外出的时候，他给我们订了规矩，不准执勤，不准接送，因为我们的首长一下去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要组织一个班子，有拍照什么的，那也能理解，比如说，毛主席要到哪个地方去呀，那个班子都得给准备吃喝用的东西，主席说这个浪费就很大了嘛，不能光为了我，各有各的工作嘛，怎么能这样子呢。所以，如果是

到了一般的地方，不开会，不找群众研究问题，临时都不下车。

主席不上当地吃饭，不上当地住宿，你就没有必要搞这个班子，他住在他的车上，我们按我们的标准吃饭，这样就避免了地方干部非要见主席这个问题。

但是，不管到哪个地方，都有临时停车的情况，比如临时要加水什么的。当地一般也不知道是主席，他们只知道是首长的专列路过这儿，他就向上头的领导报告了，报告地委、省委书记什么的，他就懂了，不是主席来了，就是哪个首长来了，他就到车站上去接待去了。主席有一条，不准带人接待，我也不见。但是，我们得下来迎接一下。他们都关心主席呀，问寒问暖，说吃的合不合适，是不是能下来，到我们这来走一走了解一下情况，听一下汇报，都是这些事情。我们也没得可说，因为主席说了他不下车，他们说让我们看一看主席嘛，一分钟也行啊，我们不敢乱动，主席说不见，如果领到车上去见主席，那我们可不敢。我说，你们得谅解我们的情况，那没办法，这些人都是看着车来了又看着车走了。

有一次主席散步的时候，我也憋不住，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主席说了，我说咱们经过好多地方，有些地方的领导很关心你，都问你的生活情况啊，想见见你，他说不行，我们是他搞他的我搞我的，各司其职，他有他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如果他在那老百姓找他办事，他要说你等一等我去见毛主席，你说我这个心里不难受？他说，另外我也有我的工作，你来了我还得接待你，我也没打算要和你研究什么问题呀，假如我需要找你研究工作的时候，你不找我我会找你的，我请你到车上来开会可以，我到你家里去找你也可以，但是我不找你，你也不用找我。咱们各司其职，这样有多好！主席说，你懂不懂？如果你懂的话，你就要好好跟人家做解释。

1959年2月，毛主席让沈同陪他的大儿媳妇刘思齐，还有她的妹妹邵华，一起去朝鲜给岸英扫墓。

毛岸英是1950年去世的，刘思齐和他结婚还不满一年，他就牺牲在朝鲜了。主席过了两年才将真相告诉刘思齐，刘思齐一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1959年的时候，刘思齐向主席提出到朝鲜为岸英扫墓。主席让我陪她去。去的时候是在那一年的二月份，这是个秘密行动，不能惊动朝鲜官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金日成领导，他如果知道是毛主席的家人来了，那就麻烦人家太多了。去了之后，罗瑞卿部长特别给乔晓光，他是中国驻朝大使，给他写封信，有事让我们再商量。我们的军代表在沈阳接待我们，跟我们一起去了，就进朝鲜了，因为他是军代表，他进朝鲜也不受检查，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去之前，主席交代，一个是保密，一个是所有经费都由主席的稿费出，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叶子龙让我给刘思齐她们买了几件衣服。我们做的工作都很顺利，到那就住我们的大使馆里头，谁都不惊动。可是到了最后这一关，就是去扫墓了，他这个烈士陵园不准人随便去，要去的话必须有领导的手续，然后才能让进。我们去要是办手续那就麻烦了，所以乔晓光大使，还有那个叫什么荣，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这边的军代表（任荣当时是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三方是吧，这是我们这边的军代表，他一直陪着我们，闯一下，就是大使也来看了，到那去，他们还是没让进，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情况不一样，因为大使都来了，军代表都来了。就赶快把领导找来了，领导来了之后，乔大使说就给他说了吧，这个来的意思，跟他说了以后，他说这得好好招待，你们愿意看什么看什么，我们给你做向导，那里有好多坟墓，他一直领我们到毛岸英同志的墓上。

刘思齐快步上前，跪在墓前双手抚着墓碑放声痛哭，直哭得撕心裂肺，闻者心碎。她喃喃地哭诉道：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由于极度悲伤，她几次差点儿晕倒。

我们只得把痛哭的姐妹俩连劝带拉地搀扶起来，又搀扶着她们俩沿毛岸英墓缓缓绕行一周。

离开墓地之前，刘思齐边抽泣边在毛岸英的墓地里捧起一把

土，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起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她再次向毛岸英烈士墓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不得不走了，她一步一回头地挪动脚步，望着毛岸英的墓依依不舍地说：“再见了，岸英！安息吧，岸英！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时，大家见墓都拜了一下，完了以后，朝鲜同志就在那现场摆了宴会接待大家，就在桧仓志愿军烈士墓的办公厅里面摆了宴，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估计他一定想不到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我也不懂这个事情，主席让我陪她来，就是来了又回去了，按主席的办法，后来看看他这个领导怎么提吧。后来说了一下，他那有个女同志叫朴正艾，是朝鲜中央的女代表，她说她晚上接见刘思齐，刘思齐说那咱们去吧，我说不是咱们，是你去。后来她说那我带我妹妹，我说那可以呀。我当时也不放心，因为她也没见过什么外宾什么的，就让大使也跟着去，大使说那可以，于是大使跟她们一起去的，朴正艾接见的，给了她们礼品，就说她们如何怀念毛岸



1959年2月，沈同与刘松林等人在朝鲜中国志愿军墓地（右一为沈同）

英什么的，就把心情表示一下吧，后来就回来了。

1959年6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终于抽空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家乡韶山冲。

1959年吧，毛主席外出做调查，路经长沙，当时湖南的书记周小舟，还有几个那都是很熟的同志讲，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可以回家看看，群众渴望你回家看看，主席当时说：“短时间的可以。”于是我们就去了，坐了一半儿火车，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当时才修了一半，我们坐到中间下来以后，又坐的汽车，就一直到了韶山冲。主席下来以后，是回家了嘛，到处看一看，非常高兴。回家第一个是和亲友们谈话嘛，尤其过去有些老人，主席专门把这些老人，也有亲属，也有老朋友，聚到一起吃顿饭，促膝长谈嘛！所以，主席在后来写的一首词里，就有这么一句：故园三十二年前。大家在一起讲当年的一些事情，一直很晚很晚了。到了第二天早起，他不一样，平时主席起得很晚，这一天他早早就起来了。好像毛主席没有这样子，清早起这么早出去散步。有几个同志跟着，比如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还有我们警卫。他走的路线正是我昨天晚上探查过的，我知道他这是上他父母的坟。因为我到那以后的第一天晚上，等到主席睡觉了，我就回来忙自己的事情了，我就找了湖南省的公安厅厅长、公安处处长，我说介绍一下情况吧，他把社会情况、地形什么的都跟我讲了一下，然后我问主席母亲的坟墓在什么地方？他说离这不远，就在对过的小山坡上。我说咱们的会已经完了，我想去那看一看，他说这么晚了上山也没有道，你能走吗？我说你们能走我就能走，他说好吧，那就带上手电筒，我们走了一下。当时晚上也看不清楚，山上是一片松林，可能孩子放羊时候走的一条小路，我了解一下情况就回来了。第二天我看他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因为主席对他母亲的爱呀、孝啊都是十分让人钦佩的，也经常给我们讲他母亲怎么对他好。原来我在他前头走的，因为山里头人不多，我老怕地下有蛇什么的，我一看他走这儿了，我们什么也没拿，手里空空的，所以我就让我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湖南老家韶山冲扫墓（前回望者为沈同）

们两个战士上前面领路去，打草惊蛇嘛，我就留到后面，我就想总要拿点东西，主席如果给他母亲表示一下心意，祭礼呀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沿路采了一些长的松枝、长的柳枝，编了一个花环一样的东西，路上还有一些野花儿什么的我都采了一些。主席到了他父母的坟前，他就要行礼，一看，哎呀，他说我这空空如也，我就赶快拿出这个花环，旁边有个卫士，我就叫他赶快给主席，卫士拿过来了，李银桥在旁边，就接过放那了。主席说拿过来吧，主席亲自把花环放在那，三鞠躬，说了几句对他母亲的怀念，大家就回来了。

那天谁也没有听清楚毛泽东对他母亲说了些什么。
但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曾写了一篇祭文来祭奠母亲。

昔日的农家少年，如今成了国家的主席。毛泽东的归来，自然成了韶山冲的盛事。能和毛泽东照张相，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我们走的时候是第二天第三天了，群众都拦着，不让走，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都是老乡，我看那个情况不好办，我就说大家在主席的门口站着我们照个合影留个纪念，毛主席回去还有好多工作嘛，大家同意这个意见，所以大家都站那去了。

主席还到学校走了一下。到了学校，孩子们和老师也看到主席了，搬了凳子给主席坐下。孩子们都高兴得很，他也不管是主席，孩子们都管他叫老爷爷，有的拽着主席的手，有的勾着主席的脖子，那么亲切，他们说这不像话吧？我说毛主席从来没这样高兴过，一天到晚都是办公，好不容易到家了，这是一个大解放嘛，谁也不要管，结果就闹腾。主席是来一个就接见，我说照相啊，因为还要到别人家里拜访，结果那些人搂着脖子拉着胳膊，都拥着他照



毛泽东在家门口和韶山的乡亲们合影留念（右二为沈同）

相，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在地照了相。我给安排了一下，我说大家都拉着人不好看，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一边儿一站，大家说好，老师也说好。就这样给照了一个合影。

结果多少年之后，这两个孩子就成了一对夫妻了。

毛泽东虽然整天忙着国家大事，但在闲暇之余，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小事也很关心。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主席就问我，你结婚了没有，你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也没女朋友，更没有结婚。主席说你为什么，我说这事情一句话说不完。主席散着步就说，你说说，我听嘛。我就给他说了。我说中学里头我参加地下党，打日本，抗日。到了大学里又抗蒋介石，我都做地下工作，睡觉的时间我觉得都不够，哪儿还有工夫跟别人谈恋爱呀。主席说你做对了，他说你不要着急找个朋友就要结婚。你组织个小家庭啊，你要费多少事情啊，影响多少时间啊。青年人啊，朝气蓬勃，正是建设自己的时间，你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加强学习，努力锻炼自己。在工作里头好好修养，好好锻炼自己，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结了婚了，还要生娃娃，生了娃娃就占你的时间更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经济跟不上啊。你哪儿有那么多钱啊，过家庭生活，还要喂孩子啊，这些事情，在青年时期都要避免，尽量地晚婚，你说这对不对呀？我说主席说的当然对，我一定按照主席说的办。所以以后都不谈这个事情了。

毛泽东晚婚晚育的观点，在沈同身上起到了作用。到了后来，沈同私下交了女朋友，但没有告诉毛泽东，也没有结婚。一直到1961年的时候，毛泽东才想起来这件事，这一年沈同已经三十八岁了。

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了上海。到了上海的时候，主席召集中央会议，在锦江饭店的国际俱乐部，主席散步的时候问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哪。我说响应主席的号召。哎，你多大了？我说三十八岁了。三十八岁还不该结婚哪，有没有朋友啊。旁边那个小魏说，主席，人家有一个小王了，是个好朋友。主席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干什么工作，行不行。我还没说呢，那个小魏就说，她是董老的保健医生，我们也没见过，听说挺不错，挺好的。主席问我，那就可以结婚了吧。我想本来是散步，跟主席说话很随便了，我说将来我结婚的时候，请主席吃酒，主席说那好嘛。这句话就完了，就过去了。



沈同夫妇

过后，沈同并没有把毛泽东的这番话当回事。没想到第二天，毛泽东就主动提出来要做他们的主婚人。

到第二天，主席要主持开大会了。下午开大会，开会以前，我想去检查会场，安排一下警卫。正在那儿，卫士打电话来了，说主席找你了。我以为他们又做什么事情让主席生气了。我说你这小子是不是又出事了，他说不是不是，好事。我就赶快跑回去了。跑回去，遇见主席。主席说，哎，你把那个小王找来。今天嘛，跟你们一起吃个饭，就结婚，我当主婚人。当时，我实在想不到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我真着急，我说主席这个事以后再说。这算什么事啊，你下午开会，中午还得吃个饭，休息一下嘛。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主席说，有什么影响的，来吃饭就是了嘛，赶快去办。主席脾气我们都知道，他要定了你给打岔，那他会生气的，结果还是按照他说的办的。所以我没含糊，我就走了。董老一听说这事，怎么也得祝贺一下嘛，让自己的夫人贺兰芝陪着小王来了，参加了。主席坐在主位，我们俩分坐主席左右，周围同桌还有其他的首长，贺兰芝同志就坐在主席的对面。我们两个想先敬主席一杯酒，主席说不能敬我，敬大家。我就说按主席说的好了。我跟大家说，今天主席很快乐，很高兴，为我们主婚，我们大家更高兴，大家就喝杯高兴酒吧，我们共祝主席健康长寿。主席说你们俩敬大家嘛，我们又敬大家一杯。我给主席夹了菜，小王也给主席夹了一块鱼。后来毛主席说，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主席一饮，干了一杯酒。就是这样子嘛，就算结婚了。到了晚上，人家上海公安局局长来看我们，还送来了结婚证书。

虽说是匆匆忙忙结的婚，但沈同夫妇婚后的几十年过得恩爱和睦。他们把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视为最珍贵的东西，到了晚年，他们就会翻开相册，共同回忆与毛泽东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

访问 陈长江



毛泽东和陈长江在一起

如果有那么十几二十天看不到我 ,再次见到我时 ,他就会问我 ,长江你到哪儿去了 ?主席见了我就叫 “ 长江 ” 两个字 ,让我感觉特别亲切

1950年,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从事警卫工作,直至毛泽东去世。他先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分队长、一中队中队长、干部大队大队长职务。但直到1952年4月,陈长江才第一次有机会跟毛泽东谈话,这次谈话给陈长江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毛主席出来散步,回来的时候看到我,我按警卫规定给他敬了个礼。主席不太认识我,就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刚刚说出一个江字,他就说你先别说,让我猜猜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接着说你是江苏如皋、海安一带的。我说对呀,我是海安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嘛,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记住了。果然,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从1952年4月算起到主席去世,主席一直记得我的名字。如果有那么十几二十天看不到我,再次见到我时,他就会问我,长江,你到哪儿去了?我说没有到哪儿去呀,主席见了我就叫“长江”两个字,让我感觉特别亲切。

再一次谈话的时候,他问我们那个地区的情况。我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主席,主席也把他了解的情况介绍给我。比如华中野战军在苏北苏中地区战斗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他说你是属于陈毅、粟裕的部队,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著名的七战七捷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打仗,具体情况不清楚。他说在你们海安就打了两仗。七战中的第三战就是在你们海安嘛。此前两个胜仗打疼了敌人,他们不甘心哪。第三战的时候,国民党军的总参谋长陈诚被我

们请出来了，他从南京跑到南通，给坐镇南通的汤恩伯撑腰打气，还有一个白崇禧也跑到徐州去督战。这一次总兵力达到了五万多人，朝海安轮番猛攻，粟裕那边哪，仅有一个纵队三千多一点的兵力，我军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杀伤敌人三千余人啊，创造了当时敌我双方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这些个情况，你都知道吧？我说我当时是个普通战士，只知道打了胜仗，没有了解这么多情况，对纵队的情况也不了解。噢，打仗太紧张喽。他说打黄桥你知道吧？我说黄桥离我们家才三十多里路，听说过一些情况。他说陈毅在那儿跟顽固派斗争，你了解吗？我说不太清楚，实际上斗争是1941年就开始的，抗日战争还没结束，我那时候还小，还没参军呢，不太了解。他说陈毅这个人哪，跟顽固派打仗的时候，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主席说起当年的战斗故事，真是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

主席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家庭很贫困，解放前没有一亩地，没有一间房，我很小的时候，刚刚十二岁就跟人家扛长活。我家的生活相当困苦，像乞丐一样地生活。他说怎么那么穷呢？我说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家都是这样子。他说现在怎么样啊？我说1947年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家分到了十四亩地，分了三间好瓦房，还有牲口，现在的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能上学了。

这一次是我和主席在一起比较正式的谈话，我当时的感想就是：主席的知识很渊博，他不仅了解新四军的情况，而且了解我们家乡的情况，比我了解得还清楚。

1955年5月14日，陈长江和他的战友们特意换上了崭新的军装，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天，主席要给我们讲话。这一次主席讲话呢，从眼前讲到长征，讲到他在湖南当兵。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也当过兵。只



1955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给警卫讲话

参加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并没有打什么仗就离开了。他还给我们比画了拿的那个枪，过去的枪是独子，扣一下只能响一次，然后再拉一次枪栓。他这么一说一拉，逗得我们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我那时候当了六个月的兵，很艰苦啊，扛着枪，那种简单的就像套筒枪似的，不像你们现在的枪这么好。他说长征不是从中南海走到北海，你们坐着车子转一圈这么远一点。长征啊，是我们不情愿走，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行军途中，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前面有敌人堵，后边有敌人追，我们不到偏僻的地区去，没有人的地方去，我们就不能生存，所以长征是很艰苦的。他说这个两万五千里长征走了十一个省市，我们十几万人走到最后剩了两万多人。我们到了延安以后，又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日战争中，在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我们在陕北，在其他根据地逐渐壮大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回顾艰苦的战斗历程之后，向干部战士强调了保卫中央是艰巨光荣的任务，并为我们安排了两项工作。

第一条，要学点文化，将来国家很多事情要你们去做，必须学好文化。第二条，搞点调查研究，帮助我和中央了解情况。后来具体的做法是一个省市的同志回家调查一次，汇总起来有十几个省的实际情况。对于学文化，主席说你们要从小学、初中学到高中，能上大学更好，将来你们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能为国家多做点事。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记忆快，领悟力好，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我现在还在学习，一天不学习就要落后。主席还讲了个故事，他说你们平均下来是二十二岁，十个五年计划以后，你们是七十二岁，中国历史上有个名人孔夫子，他就活到学到七十二岁。七十二岁的时候，你们要大庆一次，五十年后看你们学到了什么本领。那个时候，我不会在了，要参加马克思的大会去了。你们也老了，该做总结了，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再后悔。主席讲得很幽默，当时的情绪也很高，这一次前前后后讲了一个多小时，足见主席对我们有多么大的期望。主席的这一次讲话，我一生记在心里。我现在有空闲时间，常常读一读《二十四史》。尽管我的文化水平不高，读起来挺费劲儿，但我还是坚持读下去。因为毛主席曾经对我说，你应该读一读《二十四史》。

一天，陈长江陪同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给他安排了一次农村调查任务。

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时期，主席睡不好觉就起来散步，到游泳池边上散步，有王海容、唐闻生陪着，我，加上老李，李连庆。散步的时候，他说城里搞得挺热闹的，农村里怎么样啊？我们几个对农村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就没人回答。主席说，长江啊，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去了？我说快两年了。农村的情况你了解吗？我说不太了解。他说给你和李连庆十五天时间，你

们回去看看农村的事怎么样？我们点点头，表示照主席的吩咐办。又转了半圈之后，主席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来回的路程就要七八天时间，十五天的时间，在家里一个礼拜是不是有点短呀？他说再加五天，二十天，李连庆回广东老家，长江回江苏老家。回去了解了解情况，回来后跟我汇报。这一段时间，我就在中南海，不上别处去，有什么事情就交给你们的副指导员、副中队长，下午你们就走。主席办什么事，考虑成熟了，从来是雷厉风行。

陈长江从家乡回来以后，就找机会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我们这个调查并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主席平常工作很忙，我们在他身边有一个好处，可以在他稍微空闲或者休息的时候，把我们调查的情况向他老人家念叨念叨。有一天下午，我看到主席没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情，我说，主席，我把在家乡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情况给您讲一讲？钦差的汇报还是要听的哦，讲一讲吧。主席讲话总是那么幽默。我说我们那个地区呀，到1961年食堂就全部解散了。因为搞食堂确实有困难，不是因为众口难调，农村人吃饱就好，没有那么多讲究。主席插话，我就喜欢这样，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都很朴素，而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可是很讲究哪，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主席说完，我又接上原先的话头，食堂解散主要是因为粮食本来就不够吃，食堂的浪费又很大，群众有意见。村子里的人一家一户住得比较分散，有老有小，大家还想靠洗锅水拌食来喂猪、喂牲口，可在大食堂这些东西都浪费了。主席说你知道上海那么大的城市才百分之三十的人吃食堂，百分之七十的人还在一家一户地做饭，有时候中午带一顿饭去上班。农村里住得分散，老的老，小的小，集中起来省去了许多麻烦，一开始他们都说食堂好，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志都是赞成的，那个时候都说食堂好，这个好，那个好，还列出了诸多好处。我也同意他们说办食堂好，后来

又有人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不能办了。可汇报到我这里的材料都说食堂好，都说粮食过关，那就搞调查研究，让事实说话嘛。

主席吸口烟，又问我农村“文化革命”的情况。我说，农村现在大字报很多，从扬州到我们海安，街上贴满了大字报，主席的号召群众都积极拥护。有一个特殊情况，我要说一说，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份大字报说是你找到一个儿子，大家为你高兴。主席这时候反而不高兴了，他说我就是真的找着个儿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还要到处写大字报？长江，我们家几个人，你哪个不知道？别说我没找着个儿子，就是找着个儿子值得咱们全国去庆贺，到大街上贴大字报庆贺？我说这是群众对你的朴素感情。他说他们这么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呀？我看这是跑偏了，脱离了揪资产阶级的主题。长江，你给我辟谣了吗？我说，我只能给我接触到的人辟谣，我又不能写大字报辟谣。主席不高兴了，你知道了，还不给我辟谣，还说什么高兴的话。我说，我哪能辟得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主席说，算了，也不用辟谣了，日久自然明嘛。

警卫一中队常常跟随毛泽东一起到地方视察，在工作间隙他们还会和地方部队搞上一场篮球比赛。既然是比赛就有个输赢，可毛泽东却说不要老赢人家。

我们那个球队过去打篮球，到哪儿去总是赢人家的时候多，这个情况就有人反映到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跟吴旭君讲了，你们到哪儿去人家都很尊重你们，人家对你们都当成客人似的尊重，可你们到哪儿去都赢人家，也不客气一点，还是人家让你们，你们还是太骄傲了。有一次可能是在武汉，主席就说，你们再和人家打篮球，我就坐到球场的林子边，看你们打。我们以为主席可能是说说，再打球的时候注意和对方搞好团结就是了，我们打球又不会惊动主席。谁知道我们和人家打球的时候，正碰上主席出来散步，他就坐在边上看着我们打，还跟工作人员说，这次你们只能输不能赢。每

一次你们老是想着赢人家，让人家赢一次有什么了不得？那一次，我们就有意识地没让两个主力队员上场，再一个有意识地放松逼抢，让人家领先个一两分。最后，我们果然输了两分。这样，主席反而高兴了。他说，人家地方首长、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对你们都很尊敬，你们到哪儿去都不能摆架子，不能老想着赢人家，要平等啊。实际上，这一次我们打球以前先开了会，按照主席的指示不能赢，还要打得挺那个的，就是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有意让球。最后输个一二分，人家还挺高兴的，彼此的关系也融洽多了，场面很活跃。主席坐在旁边看我们打球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我的记忆很深刻，这和打假球不同，是主席通过这类事情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注意尊重地方上的同志。

毛泽东在工作疲劳的时候常去散步，他也经常借这个机会到警卫战士们的营房里去转一转。

主席散步除了休息，就是思考。有时候，他会趁散步的时候，到我们的宿舍去看看。他看到我们宿舍里头内务整理得很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他会微笑着点点头说，不错，你们很有秩序，很有军人的严谨。但看到宿舍外面有很多他的语录，他却皱起了眉头。我说上级提倡毛主席语录海洋化，我们这儿挂得还算少的。他说挂那么多有什么用处，应该多读些马列的东西嘛。特别是挂那个像，你们到处挂像，我那个游泳池不让挂，你们这里也少挂点，有的房子都挂满了，挂那么多像有什么用处？他还说，你看看现在各个机关大院门口，塑了我多少像，一年四季在那儿日晒雨淋，你看我毛泽东多苦啊，你们站两个小时还要一换岗，可我一年到头都得站岗，没有人换我，你说苦不苦啊。中央过去也下过通知，说要少塑像，没有塑的地方就不要再塑，可他们就是不听，仍然到处塑，叫我给他们看门给他们站岗。你们现在还到处挂这些像，少挂点不行吗？我言不由衷地说少挂点，少挂点。那语录啊，写

两条就行了，写那么多你们都能记住？在实际生活中，你们都能用得上？我说，上级要求墙上都要写满挂满。主席说，人家说的你就这样去做呀？我说，我不做不行啊，人家会来检查我。谁检查你呀？主席说，你告诉他们不要来检查，你们大队、团里来检查了，你就告诉他们说我说的，少挂像，少写语录，多用点时间，好好学习学习。

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以后，发现毛泽东非常注意锻炼身体。

主席的锻炼有这么几种，一是擦澡，每天卫士都给他身上擦一擦；第二是日光浴，太阳好的时候，他就穿个短裤在院子里头，晒一晒太阳；再一个是散步，主席出来散步的时候，不光是走路，每次都要晃动全身，做全身运动，通常就是这样子。

1956年的一天，北戴河海滨正刮着八级台风，毛泽东要下海游泳。

这么大的风鼓荡着滔滔海浪，轮船全部停驶。我们平时跟主席游泳都出动两条船，游泳圈等救生设备一应俱全。因为主席水性很好，这些东西都没有派上过用场，但为防备万一，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可八级台风来了，船下不去，什么都不能带，即使游泳圈都拿不住，每个人只能穿个游泳裤。因为风太大，你拿着东西根本下不了水呀。主席站在海边上，他非要下去游。他说，游泳就像对待敌人一样，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它。说着，主席向风浪里冲去。一个浪头过来，主席从浪底下潜游过去，他像打倒了敌人一样兴奋。台风一来，三个浪排着队打过来，中间只有那么几秒钟的间隔。那时候主席身体好，精神也好，你说不能干的事他非要干，非要下去不可。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感

到非常困难，出了问题就不好办。在平时，带着游泳圈，有什么事还可以救人。不行，还有船。可台风肆虐，每个人自保都难。有几次巨浪把主席都打到后边去了，身体往后直倒，我把他搀住了。他还说，你们赶快往前冲。

1959年，陈长江跟随毛泽东，回到毛泽东阔别了三十二年的家乡。

回到家乡的一天下午，主席要到韶山水库去游泳。时间大概是6月底，水库的水还是挺凉的。我说，主席，水凉，我们先下去几个人试一试。主席说不用了，我在这里生活过，还比你们清楚。主席这么说，我们就只好再阻拦了，就陪着一起游吧。主席游泳的姿势一般是蛙泳，再有就是自由泳，蝶泳主席不会。但主席在水里有特殊的技巧，一个是能悬在水中站立不动；一个是像坐椅子一样，小半截身子露在水面上；再一个是能在水面睡觉，睡觉的时候可以抽烟或者用肥皂洗头。这次，在韶山水库，主席下去游了两圈，花费了十几分钟。主席挺高兴，他说家门口原来有一个池塘。小时候，多在池塘里游。这么大的水库，那时候还没有。家乡的水亲哪，不下去游一下，乡情难却啊。那一年，主席已是六十多岁了，他身体这么好，我们心里也挺高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身体逐渐衰弱，就连游泳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有一次，主席去游泳，换好了衣服，我们看到主席的这个眼睛看不清，连台阶都看不清。只有别人搀扶着他，才能走到水边。当时主席的腿肿了，手也有点肿。主席自己说，我身体怎么没有多大劲儿。长江，你看我的身体，是不是和水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了？我说，你锻炼锻炼还能行。主席说，过去游大江，大海，什么都可以，

现在看起来就是与水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了,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很担心主席这样还能不能游啊?我就跟主席讲,你还能下水呀,主席就弄点水抹一抹,开始热身。主席说能游,下去了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主席游泳的时候,比在岸上走路强得多,到水边反而自由了。主席上来的时候,我们搀扶着他一点点走上来,这是主席最后一次游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之后,陈长江又担当了一年守护毛泽东遗体的任务,这样算起来,他一共陪伴了毛泽东二十八个年头。

访问 曾文



毛主席在长江游泳（右一为曾文）

有一天，主席来看李敏和李讷，正好从我们哨位前面过。哎哟，这是主席呀。一身中山装，脚上是黑布鞋。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现在真的看见主席了，心里面是说说不出的滋味……

曾文16岁参军,1953年被调到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文却不能主动和毛泽东说话,原因何在呢?

我第一次见到主席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穷孩子,能到毛主席身边保卫毛主席,那是多大的荣誉啊!过去我们在乡村里,谁能看得起我们?连饭都没得吃。

当时,我们给主席站岗,我的位置是在主席住处的后面,就是李敏和李讷她们住的地方。

有一天,主席过来看李敏和李讷,正好从我的哨位前面过。哎哟,这是主席呀!一身中山装,脚上是黑布鞋。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现在真的看见主席了,心里面是说不出的滋味。一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说,再就是我们有规定,主席不跟你说话,你就不要主动跟主席说话。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感觉,主席挺忙的,他要考虑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我们怕影响他的思考。所以,我们都不主动跟他说话。那个时候我刚来,主席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他也没有叫我,后来熟悉了,他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啊,学习的情况啊。

1953年,曾文去学校学习,毛泽东知道后,又把他叫了回来。

主席熟悉了我的情况后,有时候,他会主动跟别人介绍我的情

况，比如跟朱德。

1953年，我被送到东山学校去学习。学习不到一年，主席就点名叫我们回来。有人问我，你怎么回来的呀？我说，是主席亲自点名叫我们回来的。后来我听说，我去上学主席不知道，他为此还批评了张耀祠。

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前，毛泽东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在会上他向大家交定了三项任务。

主席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帮他搞调查研究。不过主席讲话的时候，交给我们三项任务：第一是站岗；第二是学习；第三就是搞调查，主要是搞农村调查。主席不能全国各地跑，就通过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战士来了解全国的情况。他需要哪里情况，哪里的同志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搞调查。如果他需要我们广东的情况，他就让我们广东的同志回去，需要湖南的情况，就让湖南的同志回去搞调查。

我们调查回来，就给他汇报。第一种就是大家综合起来，给主席汇报，我们一回去就是十个二十个，各地的都有，如果一个一个汇报，主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席就问农民有什么问题，合作化生产有什么问题，就让我们给他汇报。第二个就是当面汇报，哪个省的回来就让哪个省的汇报。

1955年7月22日早晨，曾文接到通知说部队领导安排他向毛泽东做当面汇报，这是曾文第一次和毛泽东近距离地接触。

我跟主席当面汇报过两次，第一次在中南海，第二次是在广州。第一次是夏天，天气很热的。主席在游泳池那儿办公，住在一

个帐篷里面。

队长老韩带着我们老家在广东和广西的同志一起汇报。我们事先都写了稿子，我文化程度低，只写了一两页。主席问我，你有稿子吗？我就把稿子递给主席。主席看了问，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地区的？我回答的时候，主席就用铅笔写下来。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主席也都记下来。我说，我叫曾文。他就问我，曾生你认识不认识呀？我说，我就知道曾生是我们广东籍的解放军司令员，后来是交通部部长，但我没见过他。主席又问我，曾文，你是不是文化很高呀？我说，我只念过小学。他就问我，这个材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但是让别的同志帮我抄了一下。因为我写的字勾勾巴巴的，怕主席看着费劲，就叫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抄了一下。主席说，以后不要让人家抄，我要看你自己写的，你自己写就行了。

我写的这份材料现在存放在博物馆，主席在上面画了很多条条杠杠，还有主席批的“合作好”三个字，以及“曾生”两个字。我想自己保存，可博物馆只复印了一份给我。

1958年，曾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我第一次给主席汇报之后，他对我就比较熟悉了。见了面，总要问一些情况。

第二次是1958年在广州。“大跃进”之后，农村的情况并不好。主席问了很多问题，我们家乡那个地方一两个月都没有下雨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当紧张，因为地都干了嘛。主席就问我，你回去以后，下没下雨？我说我回去以后三四天就下雨了。主席立即笑了，他高兴地说，因为你回去了，就把雨带回去了。

主席很关心农村的情况，农村一旱，他心里挺不好受的。农村的情况好不好，一直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主席知道，一场雨并不能完全缓解旱情，他又问，你们那里抗旱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那里主要靠妇女在干，白天晚上都在车水，加紧抗旱。主席说，

你们那里的妇女都很勇敢嘛。我的汇报材料上，写到我们的生产队长也是个女的，她在家里生病了，几天都没有吃饭。主席就说，你去看她了没有？我说我去看她了。他说，这位女队长好一点没有？我说稍微好了点。他说，你下次回去，再去看看她。主席关心下面的同志啊。他还说，你回去以后，要关心老百姓，要虚心，不要摆架子。你要讲家乡话，不要讲北京话，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够接近你。主席时时处处不忘教导我们。

毛泽东听完曾文汇报后，请他和同去的战友们吃了一顿饭。

我记得当时有七八个人一起汇报，是在上午十点钟以后，地点是广州军区的一个游泳池。汇报过程中，正赶上吃午饭的时候，主席说要请我们吃饭，就叫李银桥把饭端过来，我们都知道主席吃饭比较简单，是四个菜一个汤。不过，和平时不同的是，主席拿起酒杯说干杯，让我们喝了酒。

主席很关心大家，跟父亲一样，一个一个地为我们夹菜。主席吃饭挺简单的，米饭加辣椒。主席吃饭快，他吃完就把菜分给我们，并说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你们也别饿肚子。我两三岁就被送到养父母家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给我夹过菜，我心里挺感动的。吃完饭，我们接着向主席汇报。汇报的时候，主席又讲了很多话。他问，让你们搞调查你们同不同意呀？我们当然同意呀，我们都说好。主席说，你们到农村了解情况就等于我到农村了，也等于我接触群众了。我们哪敢说帮主席呢，我们了解的情况都很片面的。到那里见到一些情况回来就反映情况，有一说一。主席见我们都很谦虚，就说你们帮我了解情况，就是帮助了中央的工作。你们把这个报告收藏起来，一年一年累积起来，再回过头来看你们是否进步了。下去搞调查是一个方面，通过调查、汇报来提高你们的学习水平、工作水平嘛。主席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我们的学习和工作。

最后，主席嘱咐说，你们去农村调查，不要说是我让你们去的。你们以部队休假的名义，有什么情况回来再解决。我理解是，主席顾虑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干什么不好的事。

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深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浮夸风。粮食的亩产记录不断地被刷新，说自己是农民儿子的毛泽东相不相信这些呢？

“大跃进”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密植高产，认为庄稼种得越密越好。主席说，你回去调查调查，到底多密好？水稻行距是三乘四好，还是四乘五、五乘六好？因为他不相信越密越好。老百姓说，越密越好不行，如果太密了的话稻秧子就烂了，因为不透风嘛。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主席，主席说，合理密植是可以的，要不然就不符合辩证法了嘛。种麦子的、种水稻的，什么亩产万斤，主席就不相信这些事情。

曾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陪毛泽东游泳。

主席游泳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他到了江河里头，我们一样要保证他的安全。主席走到哪我们跟他游到哪，像北戴河、珠江、长江、漓江，还有庐山水库等等。1956年开广州会议，在会议间隙，主席几乎天天游珠江。据我所知，早在1953年的时候，主席就想游长江。

主席正式提出来以后，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长江水深浪急，不能保证安全。另外，长江里不仅有血吸虫，而且有江猪。历史上，似乎也从来没有人游过长江。主席游长江，我觉得和他的性格有关，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越要试一试。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他是负责主席安全的最高领导，他不同

意游，但是他拗不过主席。

于是，组织上决定先派几个人去摸一摸情况。第一批派去的人跟他汇报说，不能游。主席生气地问，你们下水没下水呀？回答说没有下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没办法，再派第二批人去。张耀祠、孙勇和我坐飞机到了武汉。下飞机，我们直奔长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知道主席非要游长江，已经组织了一班人在长江试水。他以为我们跟他们比赛呢，他们就顺江而下，很快离开了武汉水域。我们不能这样做啊，我们按原计划，仿照主席游泳的方法，又是仰着躺一下，又是慢慢游一下，很小心地测试这样游行不行。过桥墩的时候，我们当时不太了解水情。因为江水遇到桥墩的阻截之后，形成了一个旋流。我们到了那里，遇上了一些困难，我往这边转，江水打过来，我就得喝水，我又转过去，江水仍然打得我喝水，游起来非常困难，我心里有点慌，但我们就自己鼓励自己，这是给主席试水，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出事。还好，这次只是遇到了险情，并没有什么不幸发生。

第二次，我们又去汉江试水，重点在汉江汇入长江那一段，水流湍急不说，江水的流向也极难掌握。脚底下就像转椅似的，很难控制，反正是哪里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试，因为保卫主席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主席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试过之后，我们就清楚了哪个地方能游，哪个地方不能游。

虽然遭遇两次险情，但经过重新调查以后，证明长江是可以游的。由此，毛泽东的心愿实现了。

主席不但自己游，还鼓励大家下来游，叫大夫、卫士：“你下来！”他冲罗瑞卿说：“你不会游泳，就不知道游泳的好处。”机要员、秘书等一些女孩子下来以后，主席鼓励她们说，江水淹不死你，只能淹个半死。虽然这么说，但主席还是关照说，你们要好好照顾她们。

游了有两个多小时，到了长江中间，水温比较低了嘛。有些人就到船上休息，上来以后浑身打哆嗦，拿杯子喝水，水都要洒出来。可主席年龄那么大，却不怕冷。五月份的时候，江水确实很凉。船上的人都向主席招手，主席，你上来吧。主席说，还没到岸边，怎么能上去呢？主席边游边说，你们不是说长江不能游吗？你看我不游得很好吗？总之，游起来相当轻松。他有时候就躺在水面不动了，让水漂着他。看起来，我们围成的保卫主席的圈子只能是摆设了。

曾文陪同毛泽东游过许多大江大河，他发现风浪越大，毛泽东就越高兴。

有一次，在北戴河风浪特别大。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风浪，



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后，和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二为曾文）

真是白浪滔天。可主席非要游泳，当时在北戴河的中央领导，包括总理在内，都不同意他游。你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要游。主席要游，我们就得先下去。我们就推船下海，可是船怎么也推不下去。刚推下去一点，一个浪头打来，船就到了岸上。主席可不管那么多，我们只好弃船而下，用我们的身体多少为主席挡些风浪。但有时候，实在顶不住，哗地一声，浪头就把我打到主席身边。主席反而把我抱起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主席就高兴地指着高高的浪头让我看，我一回头，巨浪鼓动着，把我像小舢板一样，推上浪尖。主席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到了浪的下面。等他冒出来，浪头就已经过去了。他就是这样，很有诗意地与大风大浪搏斗。他以亲身体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掌握了风浪的规律，浪来了你根本不用怕。浪来了，你扎个猛子头一低，浪过去了你就起来了。实际上，主席并不是蛮干，他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就是特别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身体和意志，任何风浪都阻挡不了他。

毛泽东很尊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连称呼一类的细节都特别注意。

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广东同志有好几个，就我和李连庆岁数最小，他年纪还比我小呢，可李连庆的个子比我高。江青就叫我小广东，大多数工作人员就叫开了。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见了我，还叫我小广东，可主席从来不叫我小广东，都是叫我名字曾文。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曾文除了工作、生活、学习之外，毛泽东又给他布置了一个新任务。

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从各方面给予关心。1956年，我刚刚二十岁，他就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说，你在我这里工作，可以在农村找个对象，你们可以相互

鼓励。你在这里好好工作，她在那里努力生产。

我搞调查回来以后，看到我他就问，你的对象找着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主席就说，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啊。再后来，我每次从家里回来他都问这个问题，我说，来来回回只有七天的时间，光在路上就要花三四天，除去了解情况的时间，哪有空去找对象。主席就说，以后多给你一些时间吧。他不只是问一问，他还动员护士长吴旭君帮我介绍对象。吴旭君说，他是军官，要求高。其实哪是要求高，是因为在中南海工作，不仅接触的人有限，而且以前的朋友也都断了联系。到了1960年，我还没有对象。他说，我要给你布置一个新任务，那就是找对象。1961年，主席最后一次问我，我回答说找到了，他挺吃惊的，问我在哪找的？我说在北京。他说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是科技大学的。他说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科技大学的老师。主席说，你本事不小啊，还找个大学老师呢。主席就拍手叫好，说好好好啊，和知识分子相结合好啊。主席挺高兴的，他说你替我向她问好。

1964年6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曾文调离了警卫一中队，到军委办公厅，给一个首长当秘书。为了不打扰毛泽东的工作，曾文临别时没有去向 he 当面道别，可是这十一年的经历，曾文终生难忘。每当毛泽东的生日和祭日，曾文都去毛主席纪念堂悼念毛泽东。

访问 田云玉



1959年，毛泽东在韶山（主席左后为田云玉）

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
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
我们合得来。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么平
等地对待你，你能不感动吗，你能不怀念
他吗？

1953年，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县的田云玉，刚刚高小毕业，被分配搞财经工作。在没有正式报到之前，他就从街坊那里听说，在沈阳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招待处到县里招收招待员。十六岁的田云玉跑去应征，他合格了。于是，他打起了背包，就像参军一样跟着招待处的同志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田云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次不经意的选择，居然走进了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生活。田云玉到沈阳专家招待处不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政治审查之后，很快便被调入了北京的中南海。

说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有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每谈起来我都很激动。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那种滋味，是高兴啊，幸福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感到兴奋、轻松的那种。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54年底到主席身边的。我去之前，就有人说，你可能要调到主席身边去，我都不相信。因为和我同时进入中南海的同志都已经分配到主席、总理、朱老总身边去了，差不多就剩我一个人了。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主席那里去。可去干什么，又没具体说。当时，是卫士长李银桥领着我进了主席的睡房。主席正在休息、看书。李银桥先告诉主席我叫什么名字，到这儿来工作。主席就说，哎，你好，小田同志，欢迎你！说着，就跟我握手。当时，我并不紧张。因为到主席身边之前，我就见过主席几次，我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真能到主席身边工作，我挺高兴。主席接着问了几句家常话，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我

回答之后，主席说，那好，以后再谈。李银桥就带我出去了。

真正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前，田云玉还要先通过江青这一关。

见了主席以后，卫士长跟我谈嘛，要我熟悉主席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行走啊什么的，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我开始的时候，是先值副班，后值正班。所谓的副班就是在江青身边服务。主要是先由江青启发、教育我们，因为她既是家庭成员，又是主席的生活秘书。我记得，她曾经问过我，你愿意不愿意到主席身边工作呀？今后你准备怎么做呀？我回答说，我愿意。可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就说向老同志学习吧。她说对对对，要好好向他们这些老同志学习。

大概不到两个月吧，我就从值江青的副班转到值正班了。那时候，主席经常从中南海到玉泉山，我值副班的时候主要是在玉泉山。值副班的时候，我就注意向老同志学习，问问主席喝什么茶，喝茶喝几次，穿衣服怎么穿，吃饭的习惯，包括吃饭的饭桌等等。主席出去开会，接待外宾怎么办，反正是主席从起床到睡眠的过程，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尽到哪些责任，我都问清楚。

当我从副班转到正班的时候，也是先跟老同志学习，然后自己去做。主席该看文件看文件，该看书看书。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拿本书，我们给他盛饭也好啊，他都是很随便的。有时候，他眼睛看看你，却很少说话。不过主席的眼睛确实厉害，当时，我就感觉到主席的眼睛特厉害。你做的时候他看着你，他不说话，然后你做完了，他点点头。你做得怎么样全在他眼里。

那么，田云玉在毛泽东身边都做些什么呢？

我理解卫士这个工作，在家里就是服务员，外出时既是警卫员

又是服务员。平时的工作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从主席睡觉、穿衣、吃饭，到他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办公桌上的一些纸笔，接见外宾的服装等等，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注意。开会当中，主席有时候休息不好，我们必须提醒他注意休息。起床后，忘了吃饭，我们必须催促。夜里办公疲劳，我们要帮着做一些按摩，或者是洗澡。他一般不洗澡，多是用毛巾擦澡。按摩也好，擦澡也好都不妨碍主席看文件，看书。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以外，主席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学习。甚至上厕所，他也会拿本书。总之，我们必须尽职尽责，做到细致、周到。

好在主席的生活、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规律，比方说饮食方面，吃什么，不吃什么。大家都知道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但并不是每顿饭都有红烧肉，就是喜欢多一些。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在主席的宽宏大量下，我很快熟悉了工作。实际上，在主席身边相对容易一些。他没有那么多要求，更不会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你给他做什么他都说好好好，他很少表露出不满意，生气或发脾气是很少有的情况。他只在你打扰他睡眠时发脾气，有时候脾气很大。这不能怪主席，而是工作人员失职。

正在田云玉工作很顺利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我理解，在主席身边工作，先是主席满意了，江青满意了，领导才能满意，我自己也感到满意，自己的心情舒畅了，最重要的是工作起来就顺利了。在半年以后，也就是1955年初，主席在一次聊天时间问我，小田呀，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挺好啊，老同志对我很关心，江青对我也没意见。那时候，主席满意，江青不一定满意，因为江青可能还有别的要求。江青满意，主席也满意，并不容易做到，所以我说上面的话。在聊起来以后，主席说，小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够去上学啊？主席就这么平易近人，跟

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总用商量的口气。我当时听了，并没做过多的考虑，正是工作顺利的时候，我于是回答上什么学呀？主席说，去学文化啊！那个时候，主席正在他的睡房看书，把书一撂下，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我都这么大了，还上什么学？他说，你多大了？我说，十七岁。他说，那不是正好嘛，十七岁还是个娃娃呀，上学正好啊！我说，我在主席这儿不挺好吗，跟主席也能学习呀！他说，不行，你还是上学好，正正规规学点东西，你这个年龄正是学习的最好时候。说到这里，又聊了点别的，主席又看起书来了。这上学的事，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可主席却非常认真。几天之后，又是我值班，主席问我：“啊，你想好了没有？”我说什么啊？“去上学啊。上学去读书，学文化啊。”我说，我不怎么想去，主席你真要送我去上学校？他说：“当然是真的了。你呀，去和李银桥、汪东兴说一说。你以后就不要在我这儿值班了，去上学去，我送你上学去。让他们给你办手续。”我一听主席这么说，就没再说什么。主席这时候比上一次还要严肃和严厉，他说：“你不能再在我这儿工作了，你这么小的年纪，在我这做这些杂事，把你耽误了。”我说，为主席服务，我感觉很幸福。他说：“不行，你今后学好知识，要给人民做更多的事儿，而不是做我这点事儿。”我当时并没想通，就默默地看着主席。他说：“你呀，你！”主席肯定知道我的想法，他接着说：“我一会儿就休息了，你去找汪东兴，跟汪东兴说说我的意图，也说说你的想法。”他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得不表态同意了。于是，我很勉强地点了点头。

可后来，田云玉的回答让毛泽东并不满意。

主席一休息，我就下班了。主席说的事，我不能马虎。我先找李银桥，把情况讲了讲，我问他，你说这事，汪东兴会同意吗？他说，你想想，中南海的局长把我们查了祖宗三代，从东北调来，又培训，又审查，还不到半年，你要走了，他还得再选，他能干吗？李银桥又反过头来做我的工作，他说，在主席身边工作很伟大，今

后要学习会有很多机会。你现在在主席身边，还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嘛。我明白他的用意，他是从做好工作这一点出发的。他这么讲，我想也是挺有道理的。实际上，他这么说正合我的心意，我也不想离开，不想走嘛。我再去上班的时候，主席又问我，你同意了吗，汪东兴怎么说呀？我说，我还是不去吧。因为汪东兴交代我说，你就说你不愿意去。在这一点上，主席还是主要考虑你的意思。现在想来，我当时并没能真正理解主席的做法的深远意义。我一讲我不愿意去，主席就长叹一声：“你这个人哪。”

在毛泽东的一声长叹中，田云玉那颗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田云玉再没有听到毛泽东提起上学这件事。可是没过多久，毛泽东有了新的想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席再没谈让我上学的事，但关于我学习的事，主席并没有放弃，只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方式。那就是启发我怎么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有一次，我给他按摩，按摩腿部。我边按摩，主席边看文件、看书。一会儿，主席放下书，对我说，你这个人哪，年龄这么小，你们几个里你年龄最小吧？我说，我是最小。主席接着说，李银桥他们学习不行了，他们年岁大了，平时，你应该抓紧时间学习呀，看看书，不认识的字查查字典，我也可以当你老师嘛。这个时候，按摩只是一种形式了，我就注意听他讲。他说，在我之前，建国初期，刚进城的时候，有个叫张宝金的卫士，主席送他上了人民大学。他是卫士中第一个去上大学的，主席特别欣赏他，并多次说起张宝金，让我们学习他。每次谈起张宝金，主席的神情里充满着欣慰和满足。

在主席的鼓励下，我准备了四角号码字典、成语词典，还有些文学方面的书籍。那本四角号码字典到现在我还用呢。主席知道我自学后很高兴，经常了解我看些什么书，有时间还要我跟他讲一些学习的内容。同时，他也给我讲一些东西。有主席给我们当老师，

真是太幸福了。

1955年年初的时候，主席接见8341的战士并一起合影。不久之后，在主席的指示下，8341文化学校就办起来了，主席给这个学校请了老师，为中南海的卫士们补习文化知识。

我也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学习，结果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人家8341的战士大多能坚持到底，基本都学到大学课程了。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因为值完班就要睡觉，和学校的课程安排多有冲突，我们休息或上班的时候，它开课了。课程是越落越多，最后，我们这几个卫士都没学成。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也无奈，但如何帮我们多学习，始终是他内心里非常急迫的事情。

所以，即使我们去不了学校，在平时还是要找些书看。如果马马虎虎地学习，那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喜欢看一些历史小说、传奇呀，当然，我看的都是白话文的书，文言文的书我还看不了。我记得，我正在看《民国演义》的时候，主席问我在看什么书？我回答在看《民国演义》。主席就问我，那你知道不知道书里面有没有章太炎呢？我说，没什么印象，我回去看看吧。这个时候，主席就跟我说，他的名字叫章炳麟，太炎是他的号。接着，主席就跟我介绍章太炎，他办报纸宣传革命，后来到日本去参加了同盟会，当局到处抓他。介绍完，他还念了章太炎的一首诗。主席的教育方式真正是启发式的，他先从提高思想入手，将提高思想觉悟和学习文化知识同时进行。他并不规定你一定要看什么样的书，首先你要看你喜欢的书，然后让你提高文化水平。因为你的文化程度不高，你的认知水平就不能提高。他说你拿纸笔来，我念你写，我就去拿了纸笔。为什么我刚才讲主席督促我们学习是从思想教育入手，是启发式的呢？就是因为这首诗里面，讲到了你怎么做人，做什么人。在写这首诗之前，主席把整首诗都背下来了。背完以后让我写，第一句“邹容吾小弟”，尽管“邹”字笔画较多，但由于我认识一个姓邹的朋友，还是顺利地写下来了。第二句“被发向瀛洲”，“被”字写成了“披”字，“瀛”字笔画挺多的，我们刚开始就住在中南海的瀛

台，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我能想得起来，但是因为难以写正确，我就停了一下。主席发现我不会写了，就说你拿给我吧，拿给我吧。主席就把整首诗写了一遍。“快剪刀除辫，干牛肉做糰。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惨手，乾坤只两头。”这里边虽然有好多字我都不认识，但是我拿回去以后，看到“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还是明白他要培养我做对革命有用的人，有知识的人。主席在这方面对我的教育太大了，他写完以后我拿回去看，我是又激动又感动。从那以后，我更加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实践证明，主席的启发式教育是有先见之明的。当时，我们的体会还不深，到1961年我也去人民大学上学，才明白主席的一片苦心。

毛泽东书写的章太炎的一首诗以及后来写的几个字，田云玉一直当作宝贝珍藏着。

主席除了督促我们学习以外，我们日常看到主席的诗词和书法，有时候我们也在学。尽管他不推荐我们学习他的诗词，而是让我们学一些历史人物的诗词，但我们还是特别喜欢他的诗词。尤其是我，因为



毛主席在岳阳火车站给田云玉写的几个字（田云玉有时也会把名字写作“田云毓”）

爱写毛笔字，练书法，就以主席的书法为摹本练习。有一次，我正在照着主席过去发表过的书法，模仿着练习，我们有纪律，不允许拿主席的书法、稿件，所以我在练习的时候，只能拿主席已发表的东西来学。练习过程中，警卫科科长沈同过来了，他就把我练习的主席诗词拿给主席看了。他说这是小田写的，像不像？主席高兴地说，像、像。

主席看完后，就站起来走到他的办公桌那儿。我忙跟过去，主席正在那拿墨盒呢。我当时就把笔递给他，胆子也大起来，我说，主席给我写两个字。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呀，我不能突然让主席给写字，这时，我就顺水推舟让主席给我写两个字。火车刚刚停在岳阳，所以主席就写了岳阳，又写了湖南、湖北。我理解主席的意思，你不是要学我写字吗，我就写给你学。后来，我又进一步提出，让主席写我的名字。主席就两次写了我的名字，我特别高兴，很满足地把主席写的字拿走了，一直保存到今天。

毛泽东关心卫士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连他们情书里出现的错别字，主席都要为他们纠正过来。

主席也很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但是就我的亲身体会来说，不像在我们的学习上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我理解主席是要强调，即使是恋爱、结婚，也不能放松学习。有一次，主席问我，说女朋友来信没有？此前，主席已经知道我有了女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工作，他问我，我都说来信了，我也写信了。这样，我就有准备地把我写的信和女朋友的来信都放在兜里头。在不影响他办公的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拿给主席看。主要考虑给主席忙碌的工作调剂调剂，当然，如果时候不适合，我就不会拿出来。主席这一问，我就从兜里把信都拿出来，挑了一封我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给主席看。主席笑容满面，他说写得不错，不过，女朋友写得比你。他一边看，一边挑里面的错别字并改正过来。至于你怎么写，

怎么交流他不具体发表意见，他只看字。我记得，有一次杨尚昆接见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那是主席逝世以后，杨尚昆谈主席的几个伟大之处时，说到主席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他都关怀备至，连情书都给改。实际上，主席改的是我写的错别字，不是改情书。

那时，田云玉的初恋女友是浙江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热恋之后，关系却出现了裂痕。这使毛泽东想起了他和贺子珍……

我思想比较单纯，受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找对象的标准就是老实可靠，年轻漂亮。可是在中南海，尤其在毛主席的身边，按我的这种标准挺难找的。我初恋的对象是文工团的团员，是在她陪主席、中央领导跳舞的时候认识的。有一次，我陪江青去杭州，晚上江青要跳舞，也是活动活动，就找了几个青年男女。其中就有我的那个初恋对象，我们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后来，我就跟主席汇报了，主席也认识她了。主席接触了我这个对象，印象也不错，在这之前，我也与一些女青年有过来往，都不太满意。她的外表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我基本满意，她也很单纯、老实。江青曾在远处专门看过，是我把她带到我们的驻地，让江青看了一眼。江青看完，就给了一句话，“木美人”。说完，她就走了。但是主席不这样看，主席说不错。这样，我们有时候到杭州去，她有时候也到北京演出，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还可以，到最后是我把她从杭州接来北京的。这样两年多，关系还不错。但我有封建意识，大男子主义，武断，脾气大，总考虑自己多一些，不从人家女孩子方面考虑，老强调人家工作方面配合我们不够，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就想把她调出文工团，但是不行，因为要通过组织，要她本人同意，这样就没谈拢。在这个方面，我们两个就产生了分歧。好像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写信，在信中她说，感到我有些霸道。意思是你凭什么呀，关系就中断了。主席知道我们中间出现了裂痕，他做我的工作，就给

我讲了他和贺子珍的关系，和我在一起诚恳地交谈。他说，贺子珍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痛哭流涕地劝她，多次劝她，她不听，非要走。这是他的原话。主席跟我这么讲，并不是批评我，可我心里很难受。主席还说自己有什么责任，贺子珍有什么责任。

他说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也很复杂。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发生以后怎么对待？要理智一些呀，忍耐一些呀，有时候要等待呀什么的。想不到，我恋爱的波折引出了主席的一段伤心事。

等到我和女朋友吹了，我把送给她的东西，一块手表，一块毛料，都要回来了。她把这事告诉了主席，主席对我说：“你干吗要东西？送给了人家，不要要了嘛。你们好了一场嘛，干吗还要要回来？”他反对我这么做。我说，我家里穷，我要是再找朋友，这些东西还可以送给对方，主席听了哭笑不得。

后来，我和我的夫人恋爱以后，主席同样很高兴。两个人一起在中南海工作，互相的了解就更多一些。1961年，我能够到人民大学去学习，也与我夫人的督促有关。因为我这个时候不去上学，我夫人也去不了。正好主席一直想送我去上学，我们一起去人大上学，也算了却了主席的一桩心愿。

可惜，我学完之后，没能再回中南海，没能回到主席身边。

当时，我把学习情况给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给我提供了三个方案，三种选择：一个是回到他身边，第二个是去公安保卫系统，第三，还可以到别的单位去。别的单位是指回老家什么的，实际上是两种选择，征求我的意见，征求汪东兴的意见。最后，我选择了公安局。就这样，我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大队。一年之后，我调到了广播事业局，这里边有主席的关怀，也有我自己的意愿。

离开中南海，田云玉如果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又是怎么同主席联系的呢？

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在公安局工作的一段时间，我对公安部门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我就给主席汇报了。后来，调到广播事业局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又遇到一些疾风暴雨的问题，我同样也想找主席汇报。离开中南海了，找主席汇报问题，首先要跟主席身边的人联系。因为主席工作忙，能不能有时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离开主席的这些人，都有这个问题，不见吧，想主席，见吧，又怕给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一些麻烦。还有，就是工作人员能否给予一些方便，也是一个问题。当时，我的性格当中有一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不太考虑一些后果。所以，我工作上有了委屈，有一两次就给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想见主席。还好，每次我都能顺利地见到主席。

见到主席，我的心情就好起来。唯独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夫人没能正儿八经地和主席照次相。我有三次跟主席说要照相都没实现，这三次主席都同意了，就是摄影师来不了。是来不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是没照成。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与主席合张影，留下一张正规的照片。如果三次都能照成的话，就是很好的纪念。

中国有句古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而在1956年的中南海里，田云玉也很是伤心地哭了一回。

他是为了什么事呢？

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传到主席的耳朵里去。所以，我们有什么事，都没必要保密。

我是1953年到中南海，1954年到主席身边。到1956年，在主席身边已经是两年了。我思想意识里，觉得可以翘点尾巴了。初来乍到可能要谨慎些，两年了，我已经奠定了点基础了，尤其主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在这个时候涨工资，我认为自己还是有资本

的。我们单位有战争过来的同志，卫士长也好、秘书也好，叶子龙和汪东兴都是部级干部，我自然没法比。但是，我周围的小卫士有的工资也比我高，比来比去，就数我工资低，我家庭又困难，涨一级是肯定的了。但是，大家都同意我涨两级。涨两级工资要有特殊贡献，我跟其他的卫士一起上班，本没有什么特殊。可我想，给主席的工作不就是特殊贡献嘛，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也都同意。最后，组织上一平衡，只能涨一级。好家伙，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哭开了。我在值班室哭，在宿舍也哭。那是痛哭流涕呀，不是一般的掉眼泪。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就说了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提级时”。像这样没出息的事情，我自然不敢跟主席讲。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跟主席讲的。

那时，按田云玉的级别，涨一级是43元，涨两级是50元。当时的50元，能供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这50元，对于当时家境贫寒的田云玉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能是为了照顾田云玉的情绪，上面那句话毛泽东并没有当田云玉的面说，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所以，他问田云玉，我给你60元行不行呀？

后来，主席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小田呀，我想把我身边工作人员的工资，调成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样，咱们找那么一两个人，我自己给他们拿钱。你怎么样，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六十块钱，行不行啊？我说，要主席的钱多不好啊，那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我的脑子本来就不聪明，当时就是这么反映的。主席笑眯眯地“噢”了一声，再没往下说。实际上，我当时要是同意了的话，他肯定会给我这六十块钱。主席很照顾我的情绪，没单纯考虑给我涨工资，他不说我家庭困难，他不从这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总理的工作人员来说，用他的钱来给我涨工资。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想，在主

席身边工作了不起也好，幸福也好，多大荣誉也好，不应该有的骄傲，也有一点。可是，这件事情是主席发自内心的，我反而不同意。主席说了我没同意，他从来不强加于人，包括上学，你不去他也不强让你去，主席自己是有分寸的。他主张每个人在生活方面、思想意识上，都自由自主些、独立些，他从不多加干预。但个人的婚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有困难他愿意帮助你、启发你。

1958年5月，田云玉和毛泽东一起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那天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劳动了一天的田云玉，出了一身的大汗。回到中南海之后，田云玉就直奔了厨房，由此引发了一场“西红柿事件”。

主席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来是平等的，可是我的性子急，在处理周围的一些关系时，包括与领导的关系，和炊事员的关系等，不够虚心，不能用商量的口气，难免将关系弄僵。

1958年5月的一天，我跟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因为天气热，主席和我都是满身大汗。回来以后，我马上给主席换衣服，擦背。做完这些，我马上跑到厨房。因为我平时想方设法让主席多吃水果，知道厨房的冰柜里有西红柿、水果一类的东西，你要给主席他就吃，你不给他他就不吃。即使你放在跟前，他也想不起吃。比如吃西红柿，他要是在看文件，我也不能把西红柿硬给他喂到嘴里。所以，我就想办法让主席多吃点水果，想什么办法呢，就是给他挤成汁。挤的方法很土，我把手洗干净，用一块纱布把水果包起来，汁挤到碗里，再倒在杯子里。挤出的西红柿汁，有时候放糖，有时候不放糖。这样，主席就没有办法了，他怕坏了，就会把杯子里的西红柿汁都喝了。这虽然带点强迫性，但主席不好不吃，这样就增加了主席吃水果的机会。

这天，我就奔到厨房去拿西红柿，想自己吃。可厨师不让我吃，我想把西红柿挖个洞放点儿糖，连糖带西红柿一块吃不是更舒服

吗？于是，我又拿了糖罐子。炊事员不让我放糖，就围着面板抢我手里的糖罐子。我的牛脾气上来了，大嚷了一句，那我不吃了，说着就把西红柿砸了过去。他穿的是白大褂，红红的西红柿汁溅了他一身。他为了保护现场，马上去找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就这样，我一下子被抓了个“现行”。紧接着，行政小组开会，团组织开会，上纲上线。最后，我不得不写检查。

过了几天，卫士长将事情报告了主席。可主席的做法既令我费解，又令我感激。主席对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我给他喝西红柿汁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我当然明白他笑什么，因为卫士组和行政小组怎么批评我，江青是什么态度，他都知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什么过程，他就是笑。主席这样做，起码有两三次。有一次，他从卧室出来，途中经过我们的值班室，我已经把西红柿汁准备好了。平时，我把西红柿汁一给他，他就喝掉了。那天，主席拿到后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是西红柿水。他还没喝，就笑开了。笑完之后，他就把汁喝掉了。喝完把杯子递给我，他还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开会时上纲上线，压力太大了，主席的笑则让我轻松多了。主席太了解我了，他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才说，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一致，不同意开会批斗我。如果主席当时这么说，我更要闹翻天了。主席做思想工作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961年，田云玉被毛泽东送进了人民大学。从此，他离开了毛泽东。如今，他常常和当年同在中南海的伙伴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在我身上发生的这几件事，如今想来，让我感触很深。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不能让我忘怀的，就是主席对我学习的关心。我刚到他那里半年，他就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就想我刚来不久，主席又很喜欢我这个人，工作也很需要我，但是他能舍下自己，考虑我本人的前途，坚持让我走。这些感人肺腑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令我

终身受用。

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我们合得来。人就怕给你一个独立、平等的待遇，我在毛主席面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么平等，这么平易地对待你，你能不感动吗，你能不怀念他吗？

访问 周福明



毛泽东和周福明在武汉

我接触主席以后，主席觉得我这个人还合得来。主席再次到杭州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小周啊，你愿不愿意到我身边去工作？我十分高兴，当场就一口答应下来……

1959年12月26日，杭州时美理发厅的青年理发员周福明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去给一个特殊人物理发。

说起杭州的汪庄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说起南屏晚钟这个杭州著名景点，大家可能会熟悉一些。南屏晚钟对面就是汪庄招待所，像刘庄招待所一样，汪庄也接待过许多中央领导人。我就在那里的游泳池给毛主席理发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主席。为主席理发之前，一个同志就问我，说你知道晚上给谁理发吗？我说，给谁理发？不是到杭州饭店给外宾理发吗？具体给谁理，王厅长也没说嘛。我不知道给谁理。他笑了，看起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晚上是给毛主席理发。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我上午刚刚给几个首长理了发。我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我知道是领导，并没听说主席来杭州，怎么会是毛主席到我们杭州来了，是不可能的。吃惊之余，我冷静下来，我说，你是不是骗我？他说，不是，真是毛主席，你马上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他加重语气说，你马上能见到毛主席了。

我根据领导事先的安排，就先去了游泳池。游泳池里面呢，用一个屏风隔出了空间，屏风后面放了一张床，还有一个小桌子，都是很普通的物件。就是临时为主席准备了一处换衣服的地方，我就准备好理发工具。主席的卫士封耀松同志还帮我准备了热水什么的。我呆了一会儿，感觉那个地方很热呀，浑身冒汗。这时候呢，主席从对面一个门那儿走了过来。他穿着个睡衣，就是那种普通的棉睡衣。过来以后呢，大老远的，大概离我有一米多将近两米，主席就伸过手来。毛主席身材很魁梧，神采奕奕，在我面前就像一座

山，他那个巨手一伸，我急忙过去握手。在我见主席之前，我曾问过其他同志，我要是见到主席怎么称呼好呢？是叫爷爷好呢，还是叫什么？我怕自己在主席面前出洋相，就向别人请教。问谁好呢？当然要问主席身边的人了。我就先问了封耀松同志，封耀松说，你是去为主席理发，那是工作，叫毛主席就行了。我握着主席的手，就像通电一样，心脏跳得更加快了。我声音颤抖着说，毛主席好。

打过招呼，主席就坐在了那个椅子上。他手这么一扶，并不急着理发，先坐下来聊天。他跟我聊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我的紧张感。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呢？实际上，我的基本情况，他早就了解了。我没给主席理发以前，有关方面搞了一个材料，都送给老人家看了。我说我叫周福明，他说哪三个字啊，我说周总理的那个周，幸福的福，光明的明。主席说，你这个名字很好啊，既有幸福，又有光明前途。

接着，主席又问我结婚了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父母亲在哪里，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等等。我回答说，我刚刚结婚不到一年时间，我的父母都在农村。主席说，噢，那好。交谈了这么几句，我的心情轻松多了。我们就开始理发。理发是我的工作嘛，我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心无旁骛。也可能是我和老人家有缘分，理发很顺利。可到刮胡子的时候，主席嘴里总憋着一口气。如果是给自己刮胡子，憋着气刮起来是容易一些。可理发师给你刮胡子，你憋着气，刮起来就很费劲。另外，主席下巴上不是有一颗痣嘛，他一憋气，那个痣就更突出了，使不好劲很容易出问题。我一看这样呢，我就说主席您千万不要憋着气，您随意，我刮到什么地方，剃刀自然会到那个位置，你放心好了。

此后，毛泽东只要到杭州，就会让周福明来给他理发。

毛泽东提出要周福明到自己身边去，周福明怎么回答呢？

我接触主席以后，主席觉得我这个人还合得来。主席再次到杭州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小周啊，你愿不愿意到我身边去工作？我

十分高兴，当场就一口答应下来。主席却说，你还得跟你夫人商量一下，到我身边工作可不轻松啊，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到我那里工作不可能老让你回家，如果我到杭州来，一个礼拜放你一天假，你回家看一看，是可以的，其他时间就不能回家了。主席的意思是说，我不去北京，身上没有任务，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到了他身边，就不能那么宽松了，有纪律约束了。我说，那好，这个事情我同意，我夫人的事情我能做主。主席说，这样可不行，你还没商量，是耍男子汉大丈夫那种作风。哪有这个道理，一定要和人家商量。如果她同意，我再带你走。我说主席，我回去一定商量。你想嘛，这是好事，我爱人怎么会不同意。这样呢，主席就把我带到北京去了。1960年的10月份，我就上北京来了。

毛泽东看人是很准的，周福明不但理发技术好，而且性情温厚，人也很机灵。到北京不久，周福明便成为毛泽东的专职理发员。毛泽东在理发时，还要看书，或者看文件，这对理发员来说是一个考验，周福明能应付自如吗？

毛主席常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就是说他看他的文件，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其他的同志这并不困难，比如站岗值班的同志照常站岗值班嘛。我要理发，主席要看文件，处理起来就有麻烦，起码不会那么轻松。毛主席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说呢，他对时间抓得很紧。一般情况下，比如中央开什么会呀，他很少刮胡子、理发。主要是会见外宾的时候，他要把仪表修饰一下，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形象，一个是尊重人家。可是，往往在这个时间，主席需要看一些有关国家的材料，就是我们大使馆在国外给他搞的。人家国家有一些什么主要物产啊，或者是人家国家的人口啊。我记得马里的总统来访，主席在会谈时，说到那个国家的人口等等情况。人家总统说，有些方面我都不那么清楚。材料看完了，发也理完了，紧接着就是会见外宾。老人家的头脑似乎有过目不忘的功能，他滤

一遍就可以记住了。所以，我给理发的时候，就不能像平常那样来来回回地慢慢理。主席一会儿得动一动啊，我就根据具体情况掌握理发的进度。由于是这种情况，主席理发很随便，也就没有固定的理发室，从来没有一个理发室。通常是主席走到那儿，我就把工具带到那儿。我问主席是不是刮胡子？主席说行，打开理发工具箱马上就可以工作。什么休息室、会议室，甚至在火车上，我都给主席刮过胡子，理过发。他从不要求理发一定非要坐专用的理发椅，随便普通的椅子就行。但主席不喜欢用电推子，也不喜欢用电吹风，给头发搞个什么花样，只要清爽利落就行。对我来说，也不敢随便说，主席，来个新鲜玩意儿，不敢，都是照原来的样子理。

毕竟理发不是经常性的工作，所以从1962年起，甚得毛泽东喜爱的周福明开始兼做毛泽东的内勤。内勤都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经常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给毛泽东擦澡，二是陪毛泽东吃饭。擦澡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拿湿毛巾在身上擦。除了游泳，这是毛主席的习惯，他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现在说呢，如果城里人都把淋浴改为擦澡，不知道要节约多少水哪。再一个呢，就是陪主席吃饭。我到主席身边的时候，主席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吃饭。这个时候，他就要身边工作的同志一起吃。听老同志说，以前主席是和江青一起吃饭的，可后来两人根本吃不到一块去，就分开了。这样，我们工作人员不但要老人家吃得好，还要老人家吃得高兴。一般呢，主席的菜都是双份。比如说做狮子头，都是做两个一样的。他老人家一动筷子，你得赶快去吃。要不然他就会为你夹菜，要主席夹菜我心里当然过意不去。要不然他就会问你了，这菜是不是不对你的胃口啊？他要跟我这么说，我心里感觉比主席给夹菜还要不舒服。主席吃得都蛮高兴，你不对胃口，什么意思？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要赶快动筷子。

说起来，陪着吃饭好像是既惬意又轻松的事。可有一次晚饭，却出现了惊险的一幕，让我紧张得不行。

毛主席晚上吃东西，总喜欢吃些带骨头的东西。他习惯了，别人想随便改变，那是不行的。有一次是吃炖小鸡，就是那种小乳鸡呀。就是很小的那种，也就半斤来重。鸡腿上的一小块骨头，一下子弄到上颚里面去了。当时，主席已经吃了安眠药，如果在平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吃完了，主席也不说，他就拿着筷子在那儿捅。我想可能有什么东西硌着他了，因为那和往常吃饭的情况不一样。我说，主席你张开嘴，我给你看一看。我一看呢，他用舌头在舔哪，在上颚上横着这么一小块骨头。我急忙用手拿出来，主席已处于迷糊状态，我知道也说不清。好在那骨头很小也不尖利，它并没有弄伤主席，我就把那块小骨头包起来了。第二天起床以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也报告了我们的医生。然后，我就把骨头拿给老人家看。我说主席呀，您，您年龄高了。他不紧不慢地说，你想说什么呀。我说，您以后再吃带骨头的东西，我们把骨头给你剔了行不行啊？他说骨头都剔净了，吃着还能有什么味道。那肉没骨头，吃着都不香嘛。我说晚上你要吃鸡的话，我们先把骨头剔了，您再吃。您看这个骨头昨天就卡在了你嘴里。主席看了一眼说，是吗？我说，这个是我从您嘴里取出来的。主席并不是那么固执的人，我给他商量，您同意不同意？他点点头同意了。

周福明做事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凡事爱动脑筋，搞了很多发明创造，毛泽东对他十分满意。毛泽东曾经风趣地对周福明说过咱们俩分不开。

就说抽烟用的那个小盒子吧。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起眼，可在毛主席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年夏天，主席不是上北戴河，就是上庐山。这两个地方夏天都非常潮湿，甚至潮得连个烟都吸不动。主席吸那个烟哪，是

圆筒包装的，一筒装五十支。也不像现在都是有过滤嘴的，他吸的烟没有过滤嘴。那个圆筒打开以后，吸了潮气就软得很，好不容易点着，可根本就吸不动。尤其是主席吸烟，他喜欢拿在手上看文件。这样一来，等他想起来，烟早灭了。

我就想着，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下去太影响主席思考了。偶尔有一次机会，主席床头灯的灯罩角度不对，影响主席看书，我就去把灯罩调整一下。忽然，我的手指头被烫了一下。这好像触发了我的一种感觉，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吧。我回去就琢磨，我想主席这个烟，烤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怎么做呢？我就找我们那儿的工作人员帮着做了一个小木盒子，又找了电工，在盒子里头装上两个灯泡，一插上电，五分钟不到就能驱走潮气，这个烟烤出来就特别好抽。主席点着烟很高兴，他说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给我想这个事，你一下给我解决了。

冬天，那个烟放在暖气房里，北方冬季非常干燥。打开包装的纸烟，进了热气以后，就变得很干燥。干到主席用手一捻，直掉烟末子。主席有个习惯，喜欢在抽烟之前，把这个烟哪，拿出来看看，放到手里捻一捻。这么一捻，两头不仅往下掉烟末子，而且抽这个烟还呛人。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给他弄那个油菜，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油菜，它有这么一个长杆儿，我把那个烟拽几根出来，把它塞到里头，那个烟就变软了，就绝对不会掉烟丝，也不会呛人。

主席通常坐在床沿上吃饭，原来用的是一个80公分的小藤桌。可主席的那个床，比我们平常睡的床都要高出10公分。因为主席床上放着大量书籍，不垫的话，主席一翻身，书就全倒在身上了。工作人员就特意把床的外面垫高，靠墙的一面不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斜坡，书就往低处去了。书的问题解决了，可床高起来了，主席坐上去，脚却悬在半空，因为这个藤桌没地方搁脚。不光如此，腹部还要窝在桌沿那儿。主席年纪大了，身体胖了，腹部自然也胖了，窝着太难受了。我陪主席吃饭的时候，是面对面坐着的。我看主席的双脚老是在那儿动来动去，没着没落很难受，时间长了有可

能引起浮肿。为了让主席坐得更舒适一些，我就打算重新设计一张饭桌。我趁主席比较高兴的时候，对他说，主席，我给你量一量，给你做一个小桌行不行，就是一个吃饭的桌子。主席说，你还会做桌子？我说我不会，你坐好，我给你量完了以后，我叫木工师傅给你做。当时，我怕师傅做不好，专门做了一个小模型，按我量好的尺寸去做就行了。那个小桌是三面有横的支撑，放在主席的那边没有横支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主席庞大的身躯。同时，根据主席放脚的高度，又做了个放脚的踏板。那个踏板有一个十几度的斜坡，离主席最近的地方最低，往外慢慢升高。这个桌子非常实用，主席如果坐到床边吃饭，饭没来之前，他的脚就可以放在上头休息或者活动。用主席的话说，就叫擂鼓，这下也有地方可踹了。

对于用惯了的东西，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别人是不能随便更换的。

主席的床上这儿打一块补丁，那儿打一个补丁，个别地方棉花都露出来了。有一次周总理来主席这儿开政治局会议，总理这个人心特别细。开完会，他跟我说，小周啊，你看主席那个床，连棉花都露出来了。是不是主席不在家的时候，你们给主席重新绷一绷啊？我当时看主席挺高兴的，就把总理的想法跟主席说了。我记得是在吃饭之前，我说主席您那个床破了，是不是您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给您绷一绷？因为这事，必须要请示老人家同意才能弄。不同意，决不能弄。我想得挺简单，就是弄一块布，新布一包既美观又经济。主席不说话，看了我一眼，我马上晓得这个事情坏了，就是说主席肯定不同意这么做。后来，我找到在一起工作的崔录增，他为主席搞卫生。我事先跟他说好，我说主席的这个床破了，我们得想办法给他补一下，找一块差不多的布，我们自己就可以搞了。在主席出去的时候，比如主席去颐年堂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打补丁。

我们做完了以后，他老人家一看，再看不到棉花露在外面了。

他说，你看既不花钱，又解决了实际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晚年的毛泽东身患多种疾病，身上很多部位经常会疼痛难忍。面对病魔，毛泽东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

人们通常看到的大多是毛主席高大魁梧的形象，一直到晚年，公开的照片也多是英雄形象。我们在主席身边，知道他晚年身体上有多种疾病。但对于种种肉体上的痛苦，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惧怕，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超常的忍耐力。一开始，我们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不适，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主席可能是呼吸上有了问题，导致缺氧，嘴唇发紫，手也都发紫呀。我们一看心里害怕得不行，可他不说话，什么也不说。这在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主席有着怎样顽强的毅力。

主席病情好转的时候，大夫就跟他说，主席，你的病都是常见病，你的身体素质好，你的寿命长着呢。主席说，你们哪，不比过去那个御医高明多少。意思是说，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我能不知道吗？大夫们多数说的都是奉承话，主席长寿啊，身体怎么好啊之类。主席虽然内心很清楚，但他从来不说出来，或者给医生提一些什么要求，比如我哪里疼啊，你们医生去研究吧。即使痛苦得头上冒汗，他也不会像一般病人那样哼哼啊，或者大声喊出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说，叫喊哪能减轻痛苦嘛，只不过是病人在发泄，没有想到这么做的结果，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了别人。主席面对病魔从始至终都是那么勇敢，他从来不说我这个病怎么办哪，你们大夫必须怎么怎么。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走完了他的一生。三个小时后，周福明给毛泽东理了最后一次发。

我给主席理了那么多年发，就是开头和最后困难。为什么说开

头难呢？那是因为不了解主席，比如他习惯理发的时候看书、看文件，开始的时候不了解就很困难。

最后一次理发也非常非常困难，并且非常非常痛苦的。说实话，心里特别难受，因为一般去世的人，都是由殡仪馆的人来化妆、理发。我是看主席病重，三个多月没有理发了，满脸病容一头乱发，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此前，护士们把主席耳朵两边过长的头发都剪掉了，头发遮住耳朵太难看了。我当时请示汪东兴，汪东兴说，这个发还是由你给主席理。那个时候主席病重，我也不敢自作主张，万一出什么事，那可不是小事。主席心脏不好嘛，即使弄出一点事就了不得，所以我就没敢弄。这时候呢，主席是躺在那儿，胡子也很长了。躺着理跟过去坐在那儿又不一样了，怎么理，跪在地下？最后，我就平行，跟老人家躺着一个姿势，先把两边理好，再把后头稍微动一下理掉。刮胡子好说，理后面就特别难。我一边理一边流泪。总理是1月份，1月8日吧，去世了。朱总司令7月份也去世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光了。主席病得那么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我们都不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有一种惧怕，一种手足无措的惧怕。当9月9日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当主席真的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和全国的老百姓一样，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尤其是我们长期在主席身边，不可想象也不愿意相信，老人家怎么也会走了呢？那么多大夫在身边都无法解救，所以这一次给主席理发，心里的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理完了，我就给老人家穿准备好的衣服，这些事先还是有准备的。内衣给主席换上新的，外衣仍然尊重主席的习惯，是旧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留在心头的都是痛苦。

主席逝世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离开主席生活过的地方，我仍像以前一样精心看护着毛主席的故居。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看护下去。我的生命和感情，这一辈子是离不开他老人家了。

访问 吴连登



毛泽东和吴连登合影

我是毛主席家里的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我管的范围……。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毛主席称我为他身边的一盏不灭的灯……

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61年在颐年堂，作为中南海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他留给毛泽东的是什么印象呢？

中南海的颐年堂古色古香，以前傅作义将军曾在这里办过公，解放以后，经过简单修整，成为主席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开会、接见党内外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商谈重要事情等。主席有一个习惯，要开会了，主席就提前到，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主席的这个习惯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主席坐的沙发是马蹄形的，所有来开会的人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都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

一天，主席到颐年堂开会，照例早早就到了。主席坐下来以后，王延平叫我把一杯水端给主席。我照办了，可端着这杯水，我的手有点颤抖。

到了主席跟前，我把水往那一放，主席见我是陌生人，照例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多大年龄。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说你的名字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吗？我说不是，主席说我看也不像。他又问：谁给你取的名字啊？我说是一个老和尚给取的。主席说，啊，这个名字好。接着，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苏盐城的。他说，盐城这个地方我很熟悉，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总部就在江苏盐城嘛。因为紧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如何回答主席。主席说你是盐城的，那也是咸城人哪。主席这么幽默，我

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个时候，其他首长就陆续来开会了，我就离开主席。当时见主席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当时，我就想毛主席见到我们服务员这么亲切和蔼，像慈父慈母那样，主席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个在主席面前表现得很不自然的毛头小子，能给毛主席留下印象。

到了1964年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主动让二十二岁的吴连登到自己家里去工作。可吴连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一天，我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是在外面服务。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就到处找我，她找到我后说：“大登，主席在叫你呢！”当时我就有点发愣，我说主席叫我？她微笑着点点头说，主席现在是检阅休息，你赶快去。我见了主席先问好，主席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我有些惶恐地说：“主席，我不用坐。”主席一再让我坐下来，护士长在一边说：“主席让你坐，你就坐下吧。”我刚坐下，主席就说了，我们见过。他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说是，我叫吴连登。主席说：“那好，我今天跟你商量点儿事，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没有人做，你看，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就很紧张，我就想主席这么谦虚的人，我真没想到，按理说就是其他管主席身边事情的卫士或办公室的领导同志找我就可以了。我就跟主席说了，我说：“主席，好，但是我就怕主席的事我做不好。”主席说没关系，那你就过来吧。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主席家里工作，一直到1976年，把毛主席送到了纪念堂。

那么，吴连登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呢？

开始的时候我在主席家有好多杂务要做，主要是每天到主席房里搞卫生，清理书房等等。毛主席有个习惯，他办公的时候基本上

是在房间里面，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每次搞卫生，最费心的就是主席的床铺，因为主席的睡床上一多半堆满了他看的书，还摞得很高，有的夹着纸条，有的横放，有的竖放。我虽然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规律，但清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乱了位置。换完床单之后，我再把那些书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从没有发生过清理完之后，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

除了清理床铺，还要清理主席抽烟留下的烟蒂、烟灰。主席抽烟很多，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或者是更晚一点，他就到外面换换空气，或者是到中南海游泳池，或者是钓鱼台，或者是大会堂。主席出去后，我就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打扫卫生，给房间通风。主席回来，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休息环境。

我的另一个工作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在毛主席的仓库里，都藏有什么“宝物”呢？

毛主席的仓库就是他院子东边的一个平房，面积也就是十五六米。这个房子已相当破旧了，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六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一个学生桌，是我们用的，里面放一些登记过的账目什么的。还有什么东西呢，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眼泪，主席的这个仓库里有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那边带过来的：主席穿的大棉袄，一些穿旧了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等。不能再穿的，我们也洗好以后叠放在仓库里。当时，也有好东西，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1950年到苏联去的时候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这几件衣服一直在仓库里面放着，主席从苏联回来以后就再也没穿过。还有些毛衣毛裤之类，进城以后主席的身体比以前胖了些，穿过的毛衣毛裤就不能穿了。我们就把它拿到毛衣厂去把它放大一点，毛衣改肥改大，袖子加长一点，裤子再接长一块。现在，我们老百姓都不穿了，毛主席当时就穿那样的衣服。

还有一些毛线头，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好多毛衣都是手工织的。织完以后，剩下的那些线头，还有补衣服的补丁，有两大包裹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扔掉过哪怕是一点。后来，主席就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我们就在这里头翻来翻去寻找合适的，再给他补上。

主席有一个习惯，穿衣服从来是穿长袖的，主席就没有短袖衣服，连袜子都是长袜。这样即使穿坏了，也容易补。实在补不了才进仓库。像主席的袜子，当时的北京袜厂我常去帮主席补袜子，最早的时候是拿布补，这样不好看，后来就拿勾针给他织补。

库房里还有主席的鞋子，以及主席的备用外衣。因为主席的外衣在做的时候都是一样两套，一套留作备用。

每年夏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一晒。

总之，这个仓库里的东西，第一，没有值钱的。第二，没有任何金银首饰等宝贝。第三，没有一件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1968年，吴连登由服务员或者说勤务员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他管的事情更多了，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吴连登全权管理。那时候，毛泽东的工资有多少呢？又是怎么用的呢？

开始时，我每天为主席清扫卫生，还要每天灌一个热水袋，外加管管仓库。慢慢地，江青、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一些生活上的杂事，也都由我管起来了。到了1968年，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主席的管理员，我想这也是主席的意思吧。服务员的工作要单纯得多，完成规定的工作就行了。管理员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管的面要比原来宽得多了，我的担子和任务就越来越



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左五为吴连登）

重，主席的饮食健康等方方面面的事。尤其重要的是，主席和江青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由我领回并保管起来。

主席的工资原来是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就提出来，那个时候他问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回答说是一级工资。主席说：“太高了，不要拿那么多钱嘛。”主席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

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

花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包括在大会堂也一样。花每一分钱都是从我手里出去，支出记有一本账，花钱多少都有明确的去向。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一百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请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等，除了咱们国家正式邀请的那些活动，都是主席自己掏钱。不过，主席请客吃饭也是便饭，很简单的，无非是给多加俩菜。主要就是谈工作交流看法。在我印象当中，主席没有正式请党内人士吃过饭。即使开会开到很晚，主席说今天我请客，吃什么呢，就吃面条。每人一碗炸酱面，够不够就这一碗。这个钱按理说不应该是主席出，但是主席还是照样在他工资里面出。主席到外面视察也是一样，他不请地方上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吃饭，也不要地方上的干部请他吃饭。我觉得，主席这个习惯挺好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既浪费时间，也浪费国家的钱财。

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百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这样加起来，比吃饭的花费都多。

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也都从这里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十五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三十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三十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江青的、孩子的、江青姐姐的，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八十四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三十多元，一共是一百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困难，主席也要给些帮助，他曾经给过我两次钱。这样一来钱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

这时候，我通常会把这个账本带过去。我说主席您看看，最近您开支收支的情况，主席摆摆手说，我不用看了，说你搞的事我放

心,是不是又要用钱,你要多少钱吧?完了以后,我就写个条儿:主席,需要从稿费中支取多少钱,多少不定。主席批个同意从稿费中支出,下面签上名字。只有这样才能从主席稿费中支钱,因为毛主席的稿费,我管不了,是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的。主席讲过:“这个钱,任何人无权动我稿费里的一分钱。这个稿费来自于人民,我还要把这个钱呢,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

在生活中,毛泽东基本上有三样东西是不离手。

第一个是书。毛主席吃饭的时候,桌子旁边有时候摆着书,后面那个沙发上面也摆着书。还有呢,就是到卫生间的时候,他都离不开看书。主席跟我也讲过,他说你这个管理员哪,一天不给我吃饭,他说“我”,他拍拍肚子,这里还有存货,意思是没事儿,我要一天不看书,他说我活在这个世上难受。

第二个是烟。说起来,主席抽烟有这么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战争年代,我听老同志说,主席什么烟都抽,杂拌的也好,卷炮筒的也好,他都抽。进城以后,主席抽过三五,也抽过中华、熊猫。到1969年的时候,他改抽雪茄。主席抽雪茄烟这事,还与李先念有关。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李先念抽的是雪茄烟。主席扭过头来,朝他看了看,李先念心领神会,就给主席递了一根。一般的人没有给主席递烟的,李先念那天却给了主席一根。主席可能觉得自己没抽过这个,接过来就把它点上了。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你不告诉我呀。这就是说,主席喜欢抽这种烟。后来,打听到成都有这种烟。可这种烟夏季很容易反潮,到了冬天又干得厉害,抽着发麻,不好抽。最后决定在北京生产。弄了两间房子,找了两个人,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还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想要保证安全,就不能因为吸烟引起火灾什么的。这个烟

有一个特殊的工艺，你在三十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主席习惯边吸烟边思考，一天要抽掉两包左右。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都劝主席少抽烟，可没有什么效果。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拿剪子把一支烟剪成两截。这样主席抽烟的时候，中间的间歇过程就自然加长了。主席说，我要接见外宾怎么办？主席要给自己抽烟找一点理由。我们工作人员都跟主席说，主席，你看你抽烟抽多了，把牙齿都熏黑了。主席不认同，那跟烟没什么关系。那是我在延安呆的时间太长了，我天天吃黑豆，才把牙齿吃黑了。

主席跟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很随便，实际上是他想抽烟，而且离不开烟。可在1975年下半年，主席就把烟完全戒掉了。主席抽了一辈子烟，烟瘾又大，最后能戒掉，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主席说不抽就一点都不抽了，什么烟缸、火柴都不见了。

第三个是茶。主席爱喝浓茶，主要是杭州的龙井，也喝过南方许多省市的茶。有时候他抽烟多了、工作累了，休息不好，嘴里乏味，他总觉得龙井不够味儿，我们就找了云南的沱茶，还有内蒙古的砖茶，以及江苏、湖南特产茶等，让他尝试。可试了以后，主席觉得还是龙井茶好。所以，他晚年喝的茶都是龙井。龙井茶毕竟是绿茶，绿茶助消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主席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要沏好一杯茶放在那儿，醒了以后，不管放了几个小时，对上开水就喝，全然不顾隔夜茶不能喝这样的说法。因为他抽烟以后睡觉，醒来总觉得嘴里有点苦，马上就可以漱漱口，再喝一点茶。

作为管理员，毛泽东的饮食是吴连登工作中的重要部分。就他的亲来说，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禁忌呢？

我是毛主席家里的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我管的范围。主席家里的工作人员有原则分工，在必要的时候也要

互相协作，每天都有很多事，整天围绕着主席。

主席在饮食上，在我管理这么多年当中，他的餐桌上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主席讲过我现在吃的四菜一汤就挺好的，四菜当中一个是带肉的菜，一个是带鱼的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一个是全素的菜。每天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菜也好汤也好，做的量都不是很大，因为既要保证够吃，也不能够浪费。主席对于饮食可以说没有什么讲究，他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能浪费。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不能把东西随便扔掉的。包括有些菜叶子、菜帮子，掉下来、劈下来之后都要留着，到星期六全家团聚的时候再给他们吃。

主席的餐桌上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菜，四个菜之外还有两个必备的小碟子，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大蒜，这是他常年离不了的东西。主席从来不考虑今天想吃什么，明天想吃什么，一般他都不提，都由身边的工作人员，护士长、主席身边的值班的同志，包括厨师，我们在一起认真研究。主要的依据就是主席吃完后剩下的多少，吃得多的就保留下来，吃得少的就淘汰掉。主席有个习惯，他会把喜欢吃的拿到跟前，马上吃掉。那么，我们下一顿饭就有主菜了，也就好安排了。当然，我们还要考虑主席每天的休息情况、身体情况，什么气候、什么季节应该吃什么，甚至国内外的大事有什么影响等等，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来安排主席的饮食。这个菜谱一直到1976年，每顿菜的安排我都有记录。这个菜谱后来放到韶山纪念馆去了。可惜，到了那儿却遗失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买菜由我负责。我骑辆自行车，一边挂一个铁箱子，是铝皮做的，两边有个铁架子，往上一挂就行了。箱子上有两把锁，把这个菜买好了以后往箱子里一放锁上，保证安全。然后再去买那个菜，拿回来也锁上。菜量看好了，叫厨师做的时候我就在厨房，到主席这里第一口饭厨师尝完了以后，就是我尝。我尝完了以后，才给主席端上去。主席吃完了，最后一口还是我吃，因为我要尝尝咸淡，看看下顿怎么安排。

虽然餐桌上就是鸡鱼肉蛋，平常百姓吃的一些东西，但是做法

上会有许多变化,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比方说,主席常年吃的小鱼、小虾。那个虾就是咱们稻田里的小虾,下锅一炒它是红的。有时候炒,有时候油炸,这个东西有营养,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在桌上出现。还有河沟里的小鱼,主席也特别喜欢吃,像泥鳅、鳝鱼。夏天,我们还给主席采点野菜,他吃到这些东西就特别高兴。

实际上,主席喜欢的就是老百姓的家常便饭,比方说红烧肉、肉皮冻。

主席吃的红烧肉要求块大,一般要在二两左右。大多数人根本接受不了,一块可能就够了。主席呢,我们就给他做四五块。有的时候能吃光,有的时候剩个一两块。一般做红烧肉要用五花肉,使酱油调色。但主席不吃酱油,要说在饮食上有什么禁忌,这勉强算一个。

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谜,后来我们就问主席为什么不吃酱油。主席说,酱油那个东西很脏,我小时候在家,我母亲年年做酱油,酱油里面长了很多蛆虫。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东西太脏,不能吃。

可是主席又喜欢吃红烧肉,那怎么办呢?厨师他们有办法,他们用炒出来的糖色做红烧肉。选最好的五花肉,放到糖色里面边炒,炒的时候放点桂皮、大料、葱、姜,炒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肉的颜色红得发亮,最后一次性地放水文火焖。主席这个红烧肉只要求七分烂,看起来红得发亮,夹到筷子上来有点颤抖,吃到嘴里有咬头,而且五花肉的香味吃到嘴里不腻,真正的是色香味俱全。

主席还喜欢吃肉皮冻,用肉皮做的各种冻子。猪肉皮我们弄得非常干净,完了以后放到锅里蒸,蒸好了以后,再把鸡肉、牛肉放到这个汤里面。吃饭的时候,又爽口又凉快,尤其到主席晚年基本就离不了肉皮冻。就是主席不吃,我们也给他准备着,作为常备菜。

主席在晚年,有时候会想念他早年吃的东西。有一次,主席提起要吃脚板薯,就跟那个酱鸭子一样的。主席那个时候说话就不是很好懂了,跟我说了三遍,我都没听懂。因为我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我就在主席床头的一个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和一支笔,我说主席你跟我写一下,主席就写了“脚板薯”这三个字。我想这个东西哪里有

哇，一个是湖南有，再一个是毛主席在长征路上，在革命年代他吃过这个东西，我就顺藤摸瓜，知道湘西有这个东西。到了第三天，主席就吃上了这个东西。主席当时高兴啊，他觉得小时候吃的东西现在我又吃到了。虽然吃的量不是很大，但是带来的那一种怀旧感，让他非常满足，这让他想起那里的乡亲和人民，以及自己曾经的战斗岁月。

记得有一次，我给主席端了一个香酥鸡，主席说，哦，这是江苏鸡呀，我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主席这是香酥鸡，主席又说这就是江苏鸡嘛，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江苏人。他这是和我们开玩笑，后来就理解了，我就笑了笑。主席说，你就坐那吃吧，我说我还要拿菜呢。主席当时伸手在香酥鸡上抓了块，放到我手里，我当时说谢谢主席。主席对我们工作人员特别亲近，类似这样的小故事特别多。

主席这么关心照顾我们，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尤其是我这个管理员更要尽心尽力。能让主席多吃一口饭，多喝一口汤，多吃一筷子菜，我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主席吃饭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保证一天三顿，有时候十几个小时吃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吃两顿饭，吃三顿饭的时候非常少。早上起来第一顿饭如果要吃的话就是一碗稀饭，或者是一碗麦片，有时候就是两片面包，一个咸菜，酱菜或者是酱豆腐这些东西，有时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中午饭我们就要按照四菜一汤来给他做。晚上的一顿饭，我们特别重视，因为主席通常工作得很晚。

到晚年的时候，主席有时候牙疼。大家都知道牙疼的滋味非常难受，但是主席这个人非常有毅力，牙疼的时候，他照样看书、批文件、开会。疼得实在厉害了，他自己就捂嘴。这时候，我们就考虑怎么样来调整饮食，要做得绵软一点，要更合口一点。主席如果吃不好，我们就对不起人民了。

毛泽东一直不改农民的本色，即使在中南海里，他也不喜欢种花，而喜欢种菜。

主席进城以后，在他的院子里头一直种菜。那时候，菊香书屋住的这一块，在他住的东边的一个院子，他种了一块地。后来到了游泳池南边的一块小院，他也种了一块地。再往后，在颐年堂前面的一块空地也开了一块菜地。这几块菜地，主席经常去看一看、摸一摸、问一问，这是常有的事。这些地里的菜，我们常做给他吃。他自己种的东西有了收获，吃起来就特别高兴。比如说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萝卜，我们挑选一些质量比较好的送给主席。

谁都知道在中南海，主席在世的时候，他不主张种花，他说能种菜就种菜。主席这样一提倡，种菜在中南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在中南海有土地的地方能种菜的地方全种上了菜。包括交通处、秘书局、服务处等单位，都把最好的东西送到主席那里。比方说，他们种的长得很长的象牙白萝卜，还有大南瓜。主席说这样好，种花不如种菜，种菜开花好看又结果。这一点，主席和彭总是相通的，彭总住的地方从来不要种花，只种菜。

1972年，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饮食方面有什么改变吗？

1972年，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以后，得了一场重感冒。当时，大家都紧张，因为不久之后，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就要访华。主席一感冒，大家就很着急，尤其是总理，周总理特别去我们的厨房看看，我们给主席的菜是怎么安排的。我们每做好一道菜，总理就给主席端去，我们看到他的手在抖。总理跟我们讲，你们对主席的饮食一定要精心，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搞好，要保证主席的健康长寿，你们的任务重大，这是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首先一个是在重视程度上的变化，另外一个改变就是主席吃的饭比较软了，吃的菜要稍微烂一点，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注意。尤其到了后期，因为相应的量少了，营养搭配这块我们就更精心了。

到了最后的时候，饮食上最大的改变，就是主席开始用流食

了。我们就更严谨了，也更科学了。请北京医院的营养师周光玉跟我们一起安排这些事，每餐饭里都安排有鱼头冻。因为它好咽又有营养。那个时候，中南海的鱼没有污染，如果他们打到一条大的胖头鱼，就会马上打电话叫我这个管理员拿回去，做给主席吃。在北海公园、颐和园，我们也搞过胖头鱼。最后，就由湖南、湖北、江西一些地方，把冻鱼头送到北京来。主席讲过笑话说，我这辈子吃的鱼太多了，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湖海里头作为一种回报吧。

当时，我还负责办了另外一件事。尼克松访华前后，主席因为病重双腿浮肿，原来的皮鞋没法穿了，可接见人家总统，总不能光脚吧。我就跟主席身边的周福明同志、吴旭君同志、张玉凤同志商量，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千层底的圆口布鞋，是不是给主席定做一双布鞋。最后，这个紧急任务交给了我。我让主席把脚踩在一张白纸上，照着画了一个鞋印。我准备把这个鞋印拿给鞋厂去做，可鞋厂已没有会做这种鞋的工人。要做也可以，但要等较长的时间，在尼克松来访前根本做不好。我问鞋厂的老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说北京市大兴县有个老太太做鞋又快又好，可以找那个老太太试试。我们从城里跑去大兴，一打听老太太将近六十岁了，做活计依然利索。我就要求尽快做成，农村的老太太就是朴实，有人求到门上，也不问做给谁穿，只答应加班加点做。最后三天时间就做完了，那个鞋又肥又大，主席一试，呵，挺合适的。后来，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穿的这双鞋。

1973年，毛泽东的同乡李振翩从美国来到北京。

李振翩是毛主席的忘年交，也是他的同乡。毛主席参加革命以后，李振翩出去到了美国，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我听说，毛岸英出生的时候就是李振翩接生的。主席对这个朋友的感情很深，解放后还打听李振翩到哪里去了。我估计主席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

材料，知道他在美国。那么多年没什么联系了，跟美国的关系变化以后，主席专程把李振翩请了回来。主席说要安排他住最好的地方，当时北京最好的住所就数北京饭店了，就安排住在北京饭店。

李振翩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主席还请李振翩吃了一顿便饭。那一天，我们做的都是湖南菜，就是腊鱼、腊肉、盖菜、苦瓜什么的。李振翩说，哎呀，还是主席的饭好吃，还是家乡的风味好啊。虽然是一顿便饭，但对李振翩来讲，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主席晚年，有几个人能见着他，更何况还在一起吃饭呢！

李振翩回到北京饭店之后，主席又叫我给李振翩送了一些吃的东西，包括几样新鲜蔬菜。其中有湖南腊肉、锅巴鱼、豆豉，还有湖南的盖菜等，我收拾了一个篮子送到北京饭店。李振翩特别感动，当时他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说他没想到毛主席对他那么好，请他吃饭又把家乡特产送过来。我当时告诉北京饭店的大师傅，我说你一定要做给李老先生，让他好好享用。

晚年的毛泽东喜欢上了看电影。那么，他喜欢看的片子是什么呢？

毛主席晚年虽然眼睛不太好，但他仍长时间看书，我们就想办法给他调剂一下。1969年，我国从德国进口了一批彩色电视机，中央常委们一家配了一台。主席有时间可以看看电视了，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实在单调，一打开电视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就不喜欢看了。

主席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以后，他同意看看电影。一开始，电影是由中南海的放映师给他放的。可他知道因为放电影麻烦了很多人之后，主席就问我和周福明同志，你们两个会不会放电影？我说我们不会。主席说，以后我就不看了。

我们当时心领神会，知道主席为什么不看电影了，所以我们赶

快学放电影。有时候机器坏了或者是片子断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叫主席先看书,我们修机器。学习了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总算能放出影来了。可出来的电影居然是上头一半下头一半,主席说怎么上头一半下头一半啊?有时候放着放着,我们倒坐在那儿睡着了。主席一看,片子没放完,怎么停了?就是这样,主席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他就是这样体谅我们!

当时,我和周福明一起给主席放电影,还找了很多片子。我们问主席放什么片子?主席说,放那个羊尾巴夹着一封信。所以,我们给主席放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鸡毛信》。

后来,还放过战争片,比如《南征北战》。可我们发现,毛主席看到战争片的时候,他自己会在那流眼泪,我们就不敢给他放这些片子了,因为看电影本来就是轻松的事嘛。后来,就改放戏曲片了,像《借东风》《斩马谲》等。

有一次,主席提出要看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纪录片。可我们手头没有,就通过中南海服务处,与部队联系,最后终于把这个片子给找来了。当时原子弹爆炸,我们只是从报纸上读到过,从新闻片子上看到过。但是,更详细具体的东西并不知道,我们也想看一看。放这个片子的时候,银幕上出现了很多参与试验的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类口号,以及试验塔、训练架上挂着毛主席语录的镜头。主席说,不看了,搞的是原子弹、氢弹,又不是搞大批判、阶级斗争。主席很不愿意这么搞,像这样的事,我们太有体会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三岁。吴连登和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守灵。

当时在主席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泣不成声。说实在的,尽管我们看着主席慢慢变老,晚年更是备受病魔的折磨,可我们从来没想过

会这样，我想毛主席会永远活下去，他对我们太好了。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没有想过孩子、家庭，所有的时候都在想着全国人民。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泪水就不自觉地涌上我的眼睛，毕竟我在主席身边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十二年时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主席的生日，我就和主席的子女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来纪念毛主席。

访问 熊向晖



熊向晖夫妇在毛泽东旧居前

熊向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1936年加入的是共产党，却一直在国民党阵营从事秘密工作……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期间，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情报。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每一步行动，都被熊向晖提供给了中共秘密机关，并迅速转给中共首脑。延安撤退之后，西北战局很快扭转，熊向晖的功劳不言而喻。1949年以后，熊向晖回归党的怀抱，并先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196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济南、郑州、武汉，他接见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来访者。关于此次接见，毛泽东要熊向晖写一篇消息稿。

这年的五一节到北京来的，外国的妇女，学生，劳工，有七八百人，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招待。在北京过完五一节，这些外国朋友被安排到北京以外的一些地方参观访问。毛主席在济南接见了一批，在郑州分三天接见了三批，然后到武汉又接见了几批。当时，郑州人比较多，由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带队到郑州，在郑州接见的地方是郑州宾馆。毛主席当时就住在火车上，接见时事先打了招呼，就是告诉外国朋友，分三批，第一批见非洲的，非洲人多一点，第二批见拉丁美洲的，第三批见亚洲的。

听到汽车喇叭响，外宾的车到了，毛主席就下楼来，在门口等着。这些人一看到毛主席，就高兴地喊叫起来。有人喊：“毛泽东！”有人喊：“毛，毛，毛！”喊着，就一齐往前拥，主席说这样不行，得维持一下秩序。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了简单的布置。毛主席就站在一个台子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也不要别人陪。他先让外宾提问，



熊向晖在国民党阵营从事秘密工作时与国民党军官的合影（右四为熊向晖）

然后根据外宾提出的要求介绍中国的情况，并答复外宾的问题。

之前的1959年，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并决定在巴黎召开美英苏法四国首脑会议。由此，毛主席说，他赫鲁晓夫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

接见完了以后，他让人把我叫去了。当时，主席在休息室里，正躺在木制的靠椅上吸烟。他说，不握手了，今天让你做秀才发表消息，你起草，要写一些外国朋友的话，写一点我讲的话，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可以了吗？我说我试试吧。

熊向晖写完新闻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提笔就改起来。

我写的新闻稿里，有这么一句“外国人称赞，中国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成就”，毛主席把“中国人”改为“中国人民”，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改为“在自己的工作中”，“伟大成就”改为“成就”。整篇还有其他两处小的修改，我说：“你后边两处改得好，就这处我不理解。”他说：“有什么不理解呢？”我说：“这些外国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他们的原话，你为什么改了呢？我不理解。”毛主席说：“人家可以这么讲，你不能这么写，我们搞了这么些年建设，成就当然有一些，但是到现在还是一穷二白呀，有什么伟大呢？不那么伟大吧？”我说：“即使不算‘伟大’，这个成就也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事实吧！”毛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主席领导的呢？没有毛泽东就取得不了成就吗？这么说是唯心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说：“唯物史观并不排除借助了领袖的作用。”毛主席说：“你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袖、领导跟人民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分开了，他就没有作用了。如果在一起，那么人民的作用，也就是领导人的作用。我讲了，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要突出决定因素，不要突出个人。”主席亲笔修改的稿子，作为一种纪念，我留了下来。

1961年，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到中国访问，熊向晖全程陪同。在这期间，蒙哥马利向熊向晖讲述了他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印象。

蒙哥马利是英国陆军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英国的英雄。他在战后还当过英军参谋长，退出现役后，他晚年研究两大阵营，就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研究在两大阵营对峙下，西方世界怎么办？他看了大量的材料以后，在1959年，访问了苏联。1960年5月，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第一次访问，他是从香港入境的。从罗湖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飞机到北京。在北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了。后来，毛主席在上海会见了。那次谈话令蒙哥马利印象深刻。他当时跟毛主

席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五十年以后，你们大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时候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你们的教育、建筑、城市交通都可以比现在更好，那时候中国的前途是怎么样？”主席说：“你的意思，到那时候中国就会侵略了？”蒙哥马利说：“我希望不会。”毛主席说，你怕中国侵略？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强大以后就很容易侵略。主席就说：“我们是被侵略者，可是我们却被诬蔑为侵略者。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跟侵略者谈话，你跟侵略者谈话你害怕不害怕？”蒙哥马利没有想到主席这么说，他被镇住了。蒙哥马利说，与毛主席谈话常常令人兴奋。所以，他提出了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的9月再到中国来访问。

蒙哥马利第二次来访，在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之后，毛泽东在武汉又会见了。

这次，他要求去不对西方开放的地方看看。这样，我就陪他到各地参观。主席讲，他要看什么就让他看什么。放手让他看，凡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古迹和我们新中国建设的成绩和问题，摆在那，让他看，让他自己做结论。

当时，还派了记者，中央新闻制片厂给他拍电影。飞行途中，飞机飞得不高，下边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三年灾害的时候，到包头看下面的工厂，烟囱大半不冒烟。在延安，他住了三个晚上，但可去的地方很少。延安地委书记跟我讲，是不是缩短一点，我说不要缩短。他又说，是不是指定一些地方，我说不要指定，让他随便看。延安就那么大的地方，他自己挑了几个老百姓家的窑洞，家家缸里有玉米、小米，都是满的。他说，没有饥荒啊。然后到西安，省委书记跟我讲，这些日子有讨饭的，在收容。我说你别收容，看就看呗。可是，在街上并没有看到讨饭的。回来以后，周恩来在准备欢送宴会，毛主席准备在武汉见他。事先，我向周总理汇报，他说你先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我见了毛主席之后，把蒙

哥马利沿途提的一些问题报告给主席。比如说，建国以后，最忧心什么，最担心什么，现在最感觉头疼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等等。在吃饭的时候，这些问题主席都给了答复，蒙哥马利很满意。他说，主席很忙，我希望回去考虑一下，再谈一次。主席说，不行，明天我要去别的地方。所以，蒙哥马利并没有提出毛主席接班人的问题。

可在半夜的时候，浦寿昌打电话来，说主席改变了主意，明天下午再见他一次。下午，主席就让他一块坐船从武昌到汉口。在船上，主席下到江里游泳。到汉口，蒙哥马利下船回饭店。

第一次谈很简单，毛主席说，他今年六十八岁了。蒙哥马利说他七十四。就是这些平常的问候。第二次谈的时候，主席说元帅是特别人物，你能活到一百岁，而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我到七十三岁见上帝了。我的上帝就是马克思。蒙哥马利说，你可不能见上帝，人民需要你，中国需要你。毛主席说，不行，中国有句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就自己去”，我在中国再有四年时间就足够了。蒙哥马利问，如果主席这样的话，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我一无土地，二无银行存款，继承我什么？这个名词不好，这不是无产阶级，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唱的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班人好。蒙哥马利问，那么，你的接班人会是谁？毛主席讲了，就是刘少奇。他是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了。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以后是周恩来吗？毛主席说，刘少奇以后我不管。当时，国外很关注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层纸，一捅就破。当然不是马粪纸，也不是玻璃纸。不是中国人捅，就是外国人捅，既然他是对中国友好，那就让他捅，以后让世界都知道。

这次蒙哥马利见毛主席的时候，送给他一盒烟，二十支，三五牌。毛泽东回送他一幅字，就是《游泳》这首词的手迹。他对蒙哥马利说，你送我一点东西，我也送你一点东西。

事后，蒙哥马利说：“毛泽东极具吸引力，同他谈话是一种享受。”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熊向晖参与了接待。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一直留在熊向晖的记忆里。

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接触，这个过程相当微妙。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中美华沙会谈已经秘密进行了好几年，但在国际舞台上，双方的敌意依然如故。在1971年，美国经过多次试探，最后经过巴基斯坦总统阿依布汗，中美两国互通消息。经过几次秘密的口信转达，决定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访问巴基斯坦时称病，秘密到中国访问。因为如果他访华达不到政治上的目的，尼克松在国内就会遭遇大麻烦。事先，毛主席和周总理给我们组织了一个很精干的班子，工作班子只有二十多个人，也严格保密。预定的方案都定下来了，对尼克松的最主要的方针都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在1970年12月18日，跟斯诺的谈话里，就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带去了一个口信，就是让斯诺告诉尼克松，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总而言之，欢迎他来。这就非常高明，我没有跟您谈任何条件，你来嘛，来我就跟你谈。尼克松一来就好办了，不是我毛泽东周恩来到华盛顿去，是你到中国来。话说得非常幽默，亦庄亦谐，但是一个战略决策已经形成了。尼克松为慎重起见，决定先让基辛格秘密来谈。

基辛格是7月9日秘密坐飞机从巴基斯坦到北京南苑机场。周总理让章文晋、王海容等四个人先到巴基斯坦接，到了北京是叶剑英跟我和黄华，还有韩叙到飞机场去接。基辛格到北京的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周总理就开始跟他会谈了。晚饭后继续谈，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结束。

完了之后，周总理就让王海容打电话问毛主席那里，能不能现在就去汇报。主席讲，可以马上来，让熊向晖也来。当时让我去，就是要我了解一下国际形势。

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嘛，周总理见了主席就说，这么晚了，主席还没休息。主席说我不困。我就跟主席握握手，我说主席好。他说马马虎虎。坐好了以后，总理对主席讲：“基辛格来了，我们谈了一下。”主席就说那个先不忙说，就问我：“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呢？”我和主席有几年不见了，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了。王海容就说：“主席问你还抽不抽烟？”她跟主席就讲：“老熊是个烟鬼。”主席说：“怎么是老熊啊？年纪不大嘛。”茶几上就有烟，他拿起一根，唐闻生给他点了火，主席就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了，只让我抽雪茄。他们都这样讲过，周总理和王海容他们都讲过，他们都不抽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主席给我机会，那我就抽吧。我一看是成都造的一种很短的雪茄。

这时，毛泽东问熊向晖，你现在是总参二部副部长？

熊向晖回答说是。毛泽东又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

我说黄永胜。我当时觉得奇怪，主席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他接着又问，你跟黄永胜熟不熟悉呀？我说我认识他，他也在会上提到过我。他是怎么提到你的？我说当时不是批判陈伯达吗？就是在批陈整风会上。当时，黄永胜作总结的时候说，根据主席的指示，总参系统要写两份批陈发言，主席说其中有一份写得好，就是熊向晖写的。毛主席就说，我说的就是你那份，写得很有水平。毛主席又问，黄永胜在批陈整风总结会上还讲了什么，怎么讲的？我简单地汇报后，毛主席说，他没讲到庐山的事情啊？我说讲了，在另外一次会上，我就讲了怎么讲的。黄永胜讲，庐山开会的时候，他有事没上山。上山以后，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批陈伯达，他也批了。

毛主席听了以后就说，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五个大将在庐山捣鬼，我当时就愣了，怎么是五个大将在庐山捣鬼。我说不知道，他说你看过文件吗？我说没有。你听过传达没有？我说也没有。你嗅出什么来了没有，你伤风了。

中央开了一个九十九人批陈整风汇报会，五大将做的检讨，你看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就问总理，你那个结论发给总参没有？总理说发了，总参、军委发了六十份。主席就生气地拍了一下，他们的检讨是假的，他们还有后台。当时，总理就说他们这五个人都做了检讨了，主席也同意了。我过去也犯错误，经过主席提醒我就改了。给了他们实践的机会，他们也会改的。毛主席说，那不同，他们是搞阴谋。为什么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事还没有完。

最后，主席问我有秘书没有，有事还自己起草吗，等等。

林彪事件之后，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

基辛格11日离开北京，15日就发表了公告，就说明他过来了。尼克松准备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在后来的会谈当中，双方又建立了巴黎渠道。本来这个沟通要经过巴基斯坦，后来在7月商定，由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黄镇，与美国派驻巴黎的武官，这个人是尼克松的亲信，两个人联系。结果就安排了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国。这次是10月20日到25日，这时候林彪已经跑了几个月了。

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谈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骤。他讲，美国不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反对联合国开除台湾。我方的回应是，你不是搞两个中国吗？我们绝不答应。那样我们要驳你的，我们宁愿不去联合国。基辛格说，那可以，我理解，只要你措词不要那么太尖锐就好了。

8月2日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尼克松当年的方针，让中国进入联合国，但是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这和基辛格的承诺有实质的区别，总理就亲自召开会议，予以严词批驳，说我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如果存在这种情况，中国绝对不同联合国发生关系。但是，美国为了维持面子，坚持与台湾的正式关系至少要维持一年。于是，美国就拼命

做其他国家的工作。我记得，当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有六十
六个，比我们建交的还多。当时联合国的会员国一共一百三十二
个。所以，我们国内估计，美国的阴谋可能会在联合国得逞。这样，
我们就不进去。这也是毛主席决定的。等到基辛格10月20日来了，
当天上午，毛主席就找到周总理、叶剑英、姬鹏飞，当时黄华已经
到加拿大当大使去了。当时还有我，去谈。

当时毛主席看到我说，哎哟，你那个副统帅呢，参谋长呢？这
时候，我还不知道林彪已经出事了。主席说，看来现在联合国已经
开始改变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了。当时阿尔及利亚等友好国家提了一个
提案，我们完全进去，驱除台湾。美国当时提了两个问题，开除
台湾必须三分之二通过，再一个就是，两个中国提案。基辛格在辩
论的时候，已经表露出，他在联合国已经稳操胜券。

本来，基辛格是25日走，结果25日来不及，就延迟了一天。
公报以及其他人的回忆中，都是讲25日，那不对。因为我从头到
尾都参加了。基辛格走的时候，礼貌起见，叶帅送到飞机上。姬鹏
飞、我、章文晋送到飞机场。当时，基辛格坐的就是美国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因为他要为尼克松探路嘛，还让我们上去看了看空
军一号。飞机一开，飞机场的人员就跑过来报告，外交部打电话来，
联合国已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开除台湾的决议。就是美
国的三分之二票通过，才能开除台湾的提案被否决了。叶帅就讲，
基辛格大概也知道消息了。

1971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发来邀请电，邀请中国
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因为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
和国，开除台湾的决议。毛泽东说过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
进联合国这句话吗？

形势变化了，晚上六点多钟，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开会。说
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我们派不派代表

团去联合国？就这个问题开始研究，结论是说缓去。会后，总理到了主席那里说：“关于到联合国的事，按照主席的指示……”主席一摆手说：哎呀，那是老皇历了，不算数了。总理说：“我考虑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还是去，但是现在不去，现在等着熟悉情况。我临时想着，让熊向晖先带个班子摸摸情况。去，先不参加会，就了解情况。然后我们派个代表再去。主席说：“那倒不必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来电报吗？去！不熟悉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嘛，加强准备。”

主席说，我们要派代表团，就让乔老爷当团长。我是副代表，开完会以后回来还接待尼克松。于是，我就到联合国去了。

当时，主席已经了解到了投票的情况，外交部已经把投票的情况打出来了。主席说，你看英国，不要说法国了，英国都投我们的票了，欧洲只有一个马耳他，其他都投了赞成票。还有拉丁美洲，我们建交的国家有八个投我们的票。所以，有一种说法，说主席讲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没有这么讲过，主席不可能没有常识。黑人兄弟有多少啊，有些赞成的并不是黑人兄弟嘛，摩洛哥就不是黑人嘛。当时黑人有十几个国家没有赞成我们。如果这么说，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熊向晖也是见证者之一。

尼克松是1972年2月21日到北京。其他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毛主席什么时候接见，谁也不知道。两点三十分，周总理找到基辛格：“主席请你们总统马上到中南海去。”主席说，为了不让美国人民失望，就临时决定了，你四点不是会谈吗？当时，主席正在病中，医生都做好了准备，预备着抢救。主席的病是在当年一月间，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时候加重的。就是在病中，毛主席仍然是会谈的主角。

主席对尼克松说，你当权，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说，主席

你投我的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席说，不是，你们是右派，我喜欢你们右派。英国的保守党希思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尼克松说，的确，那些左派喜欢夸夸其谈。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时候，主席就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尼克松会当选。当时，中美华沙会谈在1968年5月就暂停了。后来，美国提议1968年11月恢复会谈。我国外交部曾发表声明，干脆到1969年，美国总统竞选明朗以后再谈。此后，毛主席指示，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人民日报可以全文发表。所以，毛主席说，我投了你一票，并非戏言。

接着，尼克松说，美国和中国应该联合起来。主席没有接茬，尼克松再提，主席仍没有理睬。因为我们不能跟美国人一起来反对任何霸权哪。

后来，话题转移到蒋介石身上。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他会不高兴了。尼克松问，他们骂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他呢？总理说，有时候也叫匪，有时候叫蒋介石集团。我们彼此叫匪，互相对骂，但是我们和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和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因为当时的报上都说，尼克松是台湾的老朋友，所以总理说了这样的话。

这次会谈，不论美方的尼克松、基辛格，还是我方的周总理，都充分展现了各自的风采，但是，毛主席举重若轻的大家风度和散淡幽默的举止风范是我一生最难忘的。

访问 章含之



1973年，章含之在外交部担任翻译，与毛泽东的合影

我刚刚到外交部，能进中美会谈的班子，在外交部这样论资排辈比较严重的单位，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我能进班子是难以想象的……

章含之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给一个孩子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记得那是1950年，我是1949年从上海到的北京嘛。1950年时，我才十五岁。我记得是在国庆节，那时候的国庆节好像庆祝的范围比较小。我父亲章士钊就被邀请去中南海，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都可以带孩子去。我父亲就把我带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反正就是国庆招待会，地点在怀仁堂。

毛主席主持了这个招待会，在我的印象里，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很轻。

当时，我一个孩子也搞不大清楚伟大领袖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大人物。

那时候，毛主席不是又高又大嘛，我那时候的个子也没现在这么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大人物的个子特别大。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毛主席这个人特别慈祥。他微笑着问我，你原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的北京？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拘束，就觉得这个大人物挺和蔼的。说了几句，他就说，你们小孩子不要跟我们大人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把江青叫过来，说你把这些孩子都带到花园里去玩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那么，再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外语学院教书，距离第一次见主席，已经十几年过

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话，叫我赶快回来，说我父亲要去出席主席七十寿辰的一个家宴。要请几个湖南老乡，要带我去。那个时候我对毛主席已经不是十五岁时的感觉了，就觉得诚惶诚恐。我跟父亲去了，感觉是一个非常轻松场合。

基本上就是他家里人，孩子也挺多的。他的孩子也在，每个老乡都带了一个孩子去，所以就很有家庭气氛。我去了以后，先是在颐年堂。大家先是聊天，聊天也没有我们的份。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那天觉得蛮别扭的。吃饭以前，我父亲跟这几个老乡，一个是叶恭绰，还有一个程潜，还有王季范，这些都是主席的老乡，王季范还是他的表哥。他们有说有笑的，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这些孩子之间好像也特别熟，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跟父亲这些朋友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既不属于我父亲民主人士的圈子，又不属于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这个圈子，我完全是在学校里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遇到这种场合，我往往是非常孤立的，因为民主人士的孩子我不熟，高干的孩子我也不熟。我当时记得，大人们在一块说话，孩子们也好像经常在一起似的，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好像被晾在一边了。当时，可能是主席注意到这一点，他观察挺敏锐的。他可能看我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大人这边我也插不进去嘴，小孩子那边也插不进去嘴。主席就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听说你现在已经当老师了？就找些话跟我说说，可能担心我受冷落。我说是。他说，你教英文呢？我说我教英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然后，主席就说，哎呀，过得真快呀，你都已经教书了，你也来教教我英文吧。我当时感觉他完全是在说笑话，就是找一个话题跟我说话，关心我。我说我哪敢教主席呀！主席说，哎，英文你是可以教我的。这话就说过去了，后来大家就吃饭。没有呆多久，我就回来了。没想到，我以为说说而已的话变成真的了。

就这样，章含之更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主席那边的电话打到学校去了。我知道

消息也很紧张，学校办公室传达说，主席来电话说，已经跟你说好了，让你帮他学学英文，你明天就去吧。

我记得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就告诉我父亲了。我问父亲，怎么办？主席打电话打到学校办公室去了。我父亲倒是挺高兴的，他说你有这个机会，跟主席能够学点东西。第二天我就去见主席，父亲还让我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本书叫《智囊》。平时，他们两个人经常交换书看，上次吃饭的时候，他提到想看这本书，我父亲就让我把这本书带过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我去的时候，是主席的秘书林克接待我的，他说了主席想学点英文，然后就把教材也给我了，主席自个儿选的教材。当时，我还背了一堆教材去，想让主席选一选。主席选的教材是反苏反修的九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近毛主席。

毛泽东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还年轻，我也搞不懂，毛主席为什么要学英文。拿九评的文章学英文，从教学上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我也不敢测呀。我也不敢说，主席你要学英文我先考考你。主席没有要我的教材，也没有要我拿出一个教学计划来。我也只好就稀里糊涂的，他拿给我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我觉得，毛主席对书面的东西能看懂一点点。但是，说英语基本不行，大概会一点词汇。我当时想学英文就是学英文。实际上，学英文有几种目的，我看主席当时是生活里要找一些消遣，换一换脑筋。多少年过去，我回想他的生活也蛮单调的。我现在想，我们常人可以看电影，逛百货公司、逛公园，他不行，公园就是中南海，接触的人也就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我们也会觉得比较沉闷吧。从目前我们所知的材料来看，那段时间，毛主席在思考很多问题。正是在“大跃进”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个时期似乎是主席政治生

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因为主席思考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主席并不是太忙。每个星期和我一起学英文，每次花费两三个钟头。实际上，跟我聊聊天，吃吃饭，差不多半个晚上就过去了。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才结束。我觉得，他并不想把英文学到什么程度，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转换脑筋的办法。另外，他可以看不到他经常见到的人，我就是这种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叫我章老师了，这个章老师的头衔，可能要跟我一辈子了。因为主席叫我章老师以后，别人就跟着叫我章老师了。我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倒是没人叫我章老师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调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我记得，农研中心在京西宾馆开农村会议。我在电梯里碰到了纪登奎同志，他和我打招呼说，哎哟，章老师来了。电梯里的人就很奇怪，纪登奎的年纪比我大，为什么叫我章老师。我初来乍到，电梯里的人就很疑惑地看着我。纪登奎同志说，你们不知道吧，她教过毛主席英文，主席管她叫老师，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叫她章老师。

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章含之第一次吃了肥肉。

冬天的时候，主席喜欢吃火锅，他喜欢把挺肥的猪肉，在里头煮一煮，然后，夹起来蘸着佐料吃。佐料里头有辣椒什么的。主席把肥肉夹给我，我不好意思不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肥的肉，跟吞什么似的，囫囵吞下去，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上海人也是挺喜欢吃红烧肉的，红烧肉必须要带点肥的才好吃。只是，主席喜欢吃的那个肉，肥的太多了点儿。并且不是红烧，而是白煮的，我有些习惯。不过，我跟着主席吃了这个肉以后，觉得肥肉也蛮好吃的。

1964年春节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一起去南方过年，一路上互为老师，可惜……

1964年的春节之前，主席说春节完了以后，他带我坐火车到

南方去。他说，你教我读英文，我教你读历史。你就带一部《史记》。这事对我来说，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年轻的时候，老造家里的反，跟我父亲什么也没学到。如果有机会跟毛主席学学历史，无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主席认真地说，你不要拿你父亲的书，你父亲的书都是值得收藏的好版本，你就去书店去买一部《史记》。我到书店把书买了，就等着什么时候动身了。可到了年初二那一天，他叫秘书来电话，就说去不成了。后来，他又叫我去，他当面跟我说，现在党内的事情比较忙，我们走不了了。这事不能成行，我感觉特别遗憾，但也没有办法。

章含之的教课任务，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呢？

这之后，主席学英文这事，就不像以前那么正规了，但我断断续续的还到他那里去。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的展开，主席又忙碌起来。当时，学校也要搞“四清”。我就问主席，你看我去不去搞“四清”？我要去的话，你的英文就得暂停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希望接着学，我就给学校请个假就不去“四清”了。当时，主席说，不行，你得去，回来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所以，我就去了“小四清”。不是“大四清”，“大四清”一去要一年，我当时去了三个月。搞“四清”回来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地去主席处几次。一见面，主席就问我，去“四清”，你学到什么？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是对见到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疑惑。因为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没说。因为我们下去“四清”以后，有些农民干部自杀什么的，使得我的脑子比较混乱，我就没敢跟主席说我有什么看法，只是说没学到什么东西，可能时间太短了。再往后，大概到这年夏天，1964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主席的时候，主席就说，我们的英文课恐怕就要停了。当时，他跟我说党内出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我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对主席说的事情懵懵懂懂的。我说，那主席什么时候有空了，需要学英文再通知我。这大概是我在“文化大革命”

前最后一次见到他。然后,这一年接下来就是北戴河会议,我记得,主席说不能学了之后不久,我们学校就放暑假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类的话。后来,我就想大概主席说的忙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了,连话剧什么的都开始涉及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就开始了。后来我想这就是说党内出事了。主席开始忙了,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就是这样的。我的英文课也到此为止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章含之几次给毛泽东写信,虽然没有见面,但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毛主席没有时间学英文了,我也再没有打扰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所在的外院也动员起来,教授们都挨斗了,痰桶扣在脑袋上,大牌子挂在脖子上。在1966年6月份的时候,我被调去为亚非国家紧急会议当翻译。参加会议的好多人,不断地被造反派揪出去,弄得人心惶惶。今天揪一个明天揪一个,已经影响了会议,我就给主席写了封信。我在信上写道,主席,现在外面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的内容并不多,对人的摧残挺厉害的。我列举了一些亲眼所见的事实,并说许多知识分子因为爱国才从国外回来,可现在把他们斗得这么厉害,这么做太过分了。我记得,我说了一句满重的话,所有国外爱国的分子能够回来,吃苦并不可怕,就怕受侮辱。而现在的这场运动,就是屈辱了他们的人格,这样做怎么行呢?然后,我说,主席你在中南海里头,可能不了解外头的情况,最近我要见你一次,我要向你汇报汇报,我希望你制止这些行为。

过了一个星期吧,主席让他的秘书给我回了电话,主席说,现在不宜见你,但是带给你一句话,要你经风雨,见世面,还有两句话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

我那时候也稀里糊涂的,我说这什么意思呀,显然就是不大赞成我说的这些东西。现在想来,主席对我还是很宽厚的,没有批评我。

后来，我也没有再惊动他，我就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我在外语学院里挨了斗，什么修正主义苗子呀，黑帮爪牙呀，斗得我神经上出了毛病。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要找主席。可在1968年，我被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原因是那时候我管外国专家，其中有一个英文专家，是英国共产党的一个老党员，他被抓起来了。虽然仅仅是工作关系，但我却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隔离在学生宿舍了。当时里通外国是要坐牢的，我真的急了，又一次写信给主席。我说这样搞真的不行，外院这样搞的话，那么多好人全都给打里头了。还好，主席那边有反应了，说让北京市来解决外院的问题。北京市派人到外语学院来找我谈话，这个问题也没怎么解决。然后，我就和一位同事一起给主席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促使主席下了决心，做了批示。

就在1969年底，1970年初，8341部队派人就进了外语学院。这个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我要挽救我自己的命运的话，恐怕只能是这样做了。其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教师，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8341部队派人一来，它是代表毛主席的，外语学院的局面一下子就翻过来了。因为是我给主席写的信，我跟主席个人接触的关系也就曝光了。他们认为是我给主席写了信，主席支持了这件事，我必然就是群众代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群众代表了，就成了学校里的红人，召开会议我都作为代表参加。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转变，由此也导致了我人生道路、生活道路的转变。我父亲有一次在家里挨斗，我给主席写信，主席把我父亲也保护起来了，但是我跟主席之间并没有再见面。

那么，章含之再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呢？这一次，毛泽东有没有提出新的任务呢？

从那以后，我的命运似乎就不在我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说不清

楚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我,但在其中起着主宰作用的人物是毛主席。但这并不是说毛主席是有意栽培栽培他这个老朋友的女儿,这里面有许多偶然的因素。1970年5月份的时候,我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一所干校。正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周总理下了一道命令。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已经九十岁了,又是主要的统战对象,身边要有人照顾,命令让我不要去湖北了。我说,我留下来可以,但是,学校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留下来干什么呢?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身体健康的都到干校去了,我总不能在学校看门呀。总理说,那你就到8341的工厂去。就这样,我在8341的总厂,当了一段时间的织内衣内裤的工人。

我进工厂还不到两个月,1970年的6月14日,我正值早班。厂办突然通知我,说赶快,主席来电话,叫你立即到主席那里去,他来找你。从1964年的春天,我最后一次见到主席,到1970年的6月,已经整整过了六年。当时,主席还关照我要骑车去,我教他英文的时候他也说,你不要坐你爸爸的车,你自己骑车过来。我一直是骑自行车到中南海去的。有一次下大雪,主席说这次破例用我的车送你回去。这是唯一的一次。

可能是早上八点多,我就到了主席那里,他还没起床。他躺在床上,叫我进去。我进去时,他正靠在床上喝茶。他拿着茶杯说,哎呀,章老师,很久不见了。我说主席,很久不见了,主席好吗?主席说,我很好,你好吗?我特别吃惊的就是,主席问我,章老师,这些年来,你经风雨了没有,见世面了没有?当时,我真的大吃一惊,因为这句话是他1964年留给我的。六年了,他并没有忘记。我当时说,经了一点风雨,见了一点世面,但是不够。然后,主席说,你喝茶,把他的杯子递给我,叫我也喝一口。他又说,今天,我要跟你谈点正经事情,说着披上衣服就到客厅里去了。他说,我觉得现在革命搞得差不多了,应该是学生回到课堂里去的时候了。我听了特别高兴,就说太好了,我希望能再回去教书。主席说,是啊,今天叫你来就是跟你谈一谈外语教改的问题。他说,我想派你去搞

外语教改。我说，好，我愿意去。不过，这学校在沙洋，要搞我不能在北京搞，我父亲由谁照顾呢？主席说，去之前，可以先做一些安排。我问，主席，你对教改还有什么指示？他说，让8341派一个小组跟你一起去。你们研究一下，不能像从前那么教书了。至于方针性的办法，你们去搞一个方案出来，还有，学生要回去读书，然后还要招生。

最后，主席说，教改你们先去办。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这个女同志挺能干，又能说，又能写（我想，他指的就是我老给他写信告状的事）。所以我想，教改完了以后，你就不要留在学校了，你就到外交部去，中国需要女外交官，需要女发言人。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人问我，你当时一定挺兴奋。我说正相反，我特别的不乐意，我又不敢跟主席说我不乐意，因为外交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件事情，最主要的还是我真的喜欢校园。我当时回答主席，先搞教改吧，搞完教改再说，主席说好。

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跟8341的一个小组到了沙洋。教改到底怎么搞，我跟8341的小组之间产生了分歧。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气氛使整个人的思想都比较偏激。具体到教改里头，就是要不要突出阶级斗争的问题。我说，斯大林就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可他们把我说的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了，向上写了报告，说我是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新动向。这样，双方之间的矛盾、分歧很大。他们发了文件，要开展一个运动批判我。我知道，要这么下去，我就走不了了。所以，我就抢先一步提出，我是主席派来的，现在发生这些分歧我得回去汇报。我这么说，他们就没法拦我，我这才回到北京。回北京以后，我没有马上惊动主席，我先跟总理汇报了。开了七次会，并把8341小组从沙洋叫了回来。总理特别了不起，还亲自到北大，叫北大一个班来听课。完了以后，总理做结论说，语文要讲科学性。我跟总理说，我跟他们，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最后，总理提出，语文要讲三要素，语音、语法、词汇，这

是基本功。

那次回来，我没有去见主席，总理向主席汇报了，我在教改的问题上胜利了。此后，我就开始着手编教材，招新生，我又回到沙洋。谁知道，我回到沙洋之后，大概是1971年的3月初，就接到一个通知，主席指示，叫我立即到外交部报到。其实，我真的不愿意离开，但又不能不执行主席的命令。

3月下旬吧，我离开沙洋。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的生活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可能是3月30日吧，我去外交部报到。

到外交部不久，章含之就遇到了基辛格、尼克松访华这样惊动世界的大事件。正是毛泽东使章含之这个外交界的新兵，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到外交部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非常不习惯的。

可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迫使我再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遭际。我是1971年的3月份到外交部，这年的夏天，基辛格就秘密访华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因为那是绝密的嘛，只有很少人参与。基辛格访华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了这件事。

基辛格秘密访华刚刚结束，外交部成立了一个班子，准备接待尼克松，还有尼克松访华之前的基辛格、黑格以及先遣队。这个时候，我就参加了。参加班子的名单，大概也是主席定的。

当时的中美关系，毛主席是亲自掌舵的。每件事情都是经过主席的。我刚刚到外交部，能进中美会谈的班子，在外交部这样论资排辈比较严重的单位，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我能进班子是难以想象的。假如不是这个背景的话，我这个小翻译不知要多少年才能上去的。进去以后，这年的11月，又被主席点名参加联合国大会，当翻译。以后，我参加中美会谈就顺理成章了。在中美会谈的过程中，虽然我没有参加主要的会谈，会谈的主要翻译不是我，会外的翻译

我担任的工作比较多，但毕竟身在其中，你在这个班子里，就能感觉到整个气氛。我作为亲历者，觉得能天天跟这些创造历史的伟人在一起，特别幸运。中国这边是毛泽东、周恩来，美国那边是尼克松、基辛格。他们为这个时代作出的贡献，足以铭记史册。

而毛泽东则是这个外交辉煌时期的最关键人物。

其实，与主席的接触远不如我教他英文的那段时间直接。虽然我能见到他，但都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这也好，我能亲身感受到哪些东西是主席亲自定的。我并不坐在他边上，听他作出什么决定，说出什么话，可当时整个世界的格局，中美的关系，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个撼动按钮的人。

尽管周总理也有这种智慧，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历史，在那个时代，只能是毛主席才能作这个决定。除了他，谁敢说要跟美国发展关系？说不定还会被打成什么什么分子了，所以说，这段历史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创造。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够奠基，所以我想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问，主席的脑子里已经想着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了。这就是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基辛格的秘密访华，是个了不起的决定。把基辛格这个敌对国家的安全顾问，用专机从巴基斯坦接过来，这件事情没有毛主席，他们不可能做到。毛主席亲派飞机，甚至于派什么人，都是他决定的。应该说，都是他这一双大手掌控着命运之门。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也不能决定，美国已经感觉到要跟中国发展关系。但是没有毛泽东作这个决定，美国人根本来不了。他决定邀请尼克松访华，更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当然，对尼克松来说也不容易，他能够来，对毛泽东来说，他有这个魄力。

在这个事情之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1971年的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实际上是拿不定主意的。因为当时中国的政策是比较左一些的，在去不去联合国

这个问题上，基本上倾向于不去。毛主席下了决心说要去，而且马上去。我们代表团最后出发的时候，主席对团长乔冠华的最后嘱托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去和后来的开展国际关系，打开世界的格局和中美关系建立都是非常关键的一条。

尼克松来的当天，毛主席就接见了。可见，主席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而且基辛格来，每一次，主席都亲自会见，这些调子基本上都是主席定下来的。在讨论台湾问题，在最有分歧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向主席汇报。最后达成协议的这部分，也都要经过毛主席，所以毛主席最后说，还是美国人聪明，提出海峡两岸的人民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不是基辛格提出来的吗？

毛泽东的一番话，改善了章含之与父亲章士钊的关系。

196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完英文课，主席问我，你跟我说说，你对行老怎么看，就是我父亲，他的号为行严，好多人就尊称他为行老，主席也这么称呼。我说，我们代表两个阶级，我代表共产党员，他代表剥削阶级，我跟他划清界限了。主席说，哦，你倒挺痛快的。你是共产党员，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说1957年。主席就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哪！我当即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说主席，我哪敢说我是老党员哪？你们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没有这样说。然后，主席说，我跟你说，你参加了共产党，挖了你父亲的墙脚，这一点呢，我欢迎，但是你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倒要问你，你划清什么界限哪？我就说，哎，他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镇压过学生运动。他跟鲁迅吵架，鲁迅骂他落水狗。主席说，就这些呀，他就代表剥削阶级啦。后来，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他说，看人要看全面，你不能从一件事两件事看一个人。你说你父亲当时是这个那个的，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完全是。他说，我还问问你，你还知道你父亲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说我拿出一件，你父亲的苏报案的事情你清不清楚？我当时就糊涂了，我哪知道这

段历史呀。我说什么苏报案哪？主席说你看你，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父亲当时是反清的战士，他跟孙中山，跟黄兴，跟蔡锷，这些人都是特别好的战友，当时的苏报案里头你父亲是主编，被捕入狱，以后好像是蔡锷他们把他营救出来，流亡日本，你知道这段历史吗？我说我不知道。主席说，你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历史，你就批判他，这个不公平。他说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所以，看人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行老也是这样。他说，行老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他开始的一段是非常坚决地反清的，后来帮了共产党很多忙，这些你知道不知道？他还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谈不下去了。当时就广泛听取了党外的意见，这时候我找了父亲。他当时在我手心里头写了一个字，就是走。我问你父亲怎么解，你父亲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马上回延安，老蒋是不会诚心诚意和你谈判的。老蒋是想拖延时间。如果打起来，你就是他的人质，你就回不去延安。所以，我们就撤回延安了。主席说，你知道当时行老的这个意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你倒好，你是他女儿，你跟他划清界限，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你在家里头造他的反。

主席跟我谈完以后，我真的思想斗争蛮激烈的，我觉得无地自容。就是说，对自己家里的事情，我都不了解，一味地斗了十几年，也不回家。听了主席的一席话，我忽然觉得我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和家庭的关系自然缓和了。

毛泽东的性格决定了，他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主席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特别不拘小节的人，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只有他这种性格才能作出这么大的事业。

一次，尼泊尔国王夫妇来访。会见时，国王来了，王后没来。他就有点失望，因为我们跟他讲过这个王后什么的。他就问王后怎

么没来？我们说因为今天是见主席嘛，所以就安排国王来了，没有安排王后来。主席说不行，把王后也请来。在国王已经到场的情况下，再去请王后是非常不合外交规矩的，而且所有的人都等在那照相了。主席突然提出来要见王后，只好派车急忙去接。王后正在友谊商店买东西，她提出要先回钓鱼台换衣服。所有人都等着王后，真是尴尬的一件事，国王一时不知所措，可是主席倒没觉得什么，仍处之泰然。

王后好不容易赶来了，主席高兴地和王后握手。王后当时戴了一个特别大的珍珠戒指，一握手可能硌着主席了。主席就看着人家的手，仔细观察这个戒指。我想，当时他的表情就是他根本忘了这是戴在人家手上的一个东西。他挺好玩的，还问什么东西这么大呀？我们大家在旁边就想笑，毛主席根本就无所谓，我觉得他当时就是注意这个东西，真的感到奇怪。王后当然很窘了，国王在旁边也有点窘。

后来，他看了半天，看清楚了，就把王后的手放回去了。我觉得这些地方，主席就是特别可爱，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后 记

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和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创作了二十集的电视专题片《我眼中的毛泽东》，集中采访了二十多位毛泽东同志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该片在内地十几家电视台和香港阳光卫视播出后，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由于电视剪接的技术要求，许多有价值的被采访者的口述内容未能展示，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们同辽宁人民出版社合作，对原始的采访记录进行了必要的文字整理，核校了部分口述中不甚准确的史实，编成这本书奉献给读者，并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要特别感谢接受采访的毛泽东同志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电视制作的上海新文化广播电视制作有限公司和阳光卫视，他们的大力支持，成就了这部难得的关于毛泽东生平的口述史作品。

2004年12月20日